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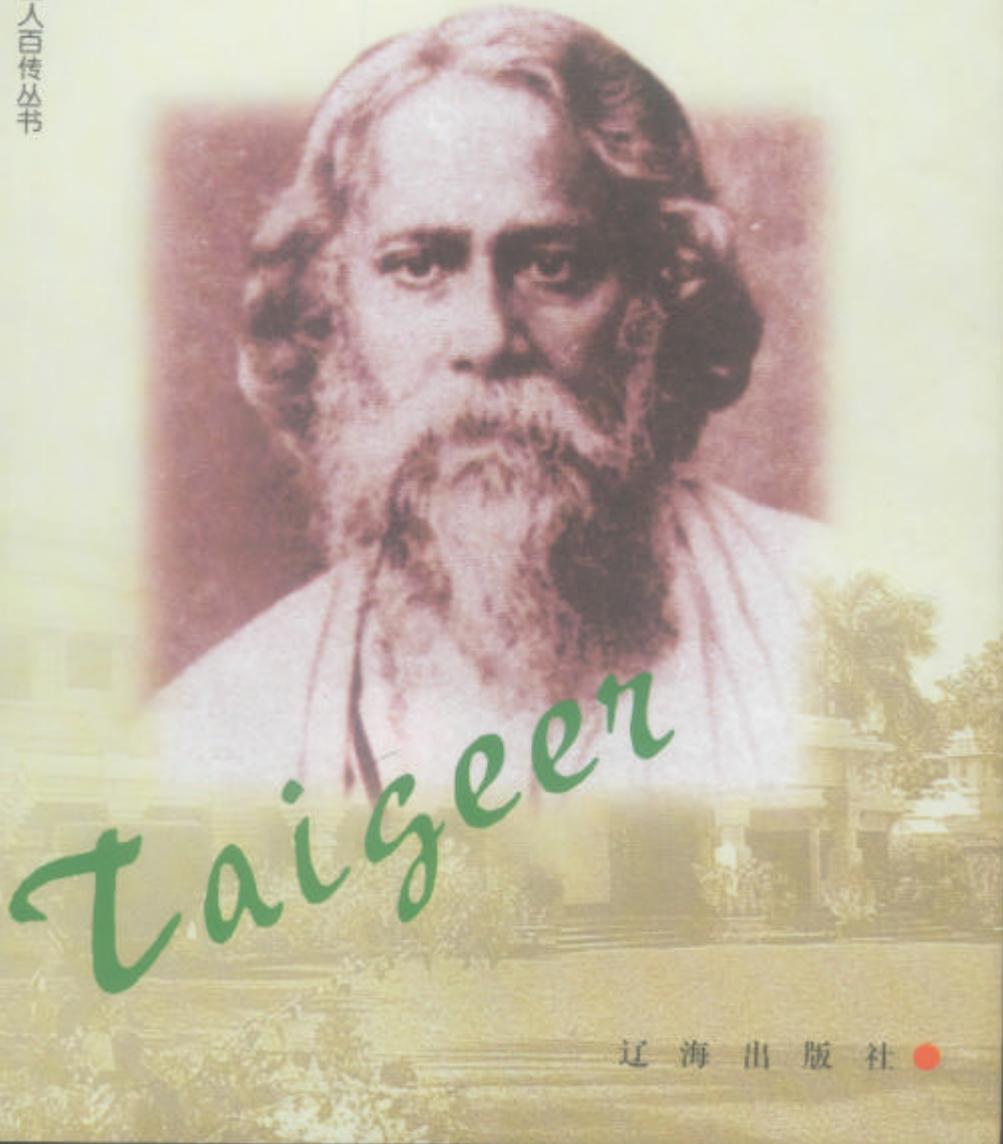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文学艺术家卷

泰戈尔

郎 芳 汉 人 编 著



辽海出版社 ●

引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朋友。他曾在有生之年访问过中国，并做过演讲。他还一直是中国读者最喜欢和最尊敬的外国作家之一。

还是在1881年，刚满20岁的泰戈尔就曾对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罪恶行径发表过书面评论，这就是他在孟加拉文杂志《婆罗蒂》上刊登的有名的论文——《在中国的死亡的贸易》。作者指出英国制造鸦片战争的罪恶，充满正义地讽刺英国商人丧失天良、一味榨取中国的财富的卑鄙行为。

1916年泰戈尔乘船去日本之际，曾途经香港。在日记中他赞美了中国的码头工人，看到他们虽身处烈日之下，但那健壮的身躯依然洋溢着生命的力与美，诗人深深地感动了，他从码头工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欢乐。在抵达日本后所做的演讲中，泰戈尔对日本炫耀暴力的倾向表示不满，并指责日本入侵中国山东的不光彩的举动。他宣传和平、自由、博爱和正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1924年4月到5月，泰戈尔终于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夙愿——到中国旅行访问。4月12日，他应邀来到上海，在参观了龙华寺后，他与上海学术界人士会见并发表演讲。之后，他游览了杭州西湖，参观了南京的明孝陵，还访问了济南，在这三个城市都做了讲演。泰戈尔在抵达北京时受到数百名群众的欢迎，在北京，他在参观北海、法源寺、故宫之余，还多次与北京的文学社团如讲学社、新月社的成员及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并做了演讲，前来听他演讲的人多达数千。5月8日，新月社特地为他举行了生日宴会，席间演出了泰戈尔的著名戏剧《齐德拉》，还为他取了一个动听的中国名字——竺震旦。离开北京后，泰戈尔先后抵达太原和武汉，在那里作了演讲。然后从上海赴日本，结束了对中国长达一个半月的友好访问。

泰戈尔在华期间所做的数十次演讲中，除了向热情的中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生平、讲述他的创作和种种感受与体验之外，诗人还深情地追怀了中印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往来，并以亲切友善的敬意赞誉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表达了他盼望中国的尽快觉醒和富强的美好愿望。他这样说道：

“请允许我同你们一起，对你们这个国家生活的觉醒寄予希望，并能参加你们欢庆胜利的节日。我不是什么哲学家，所以请你们在自己心里给予我位置，而不要在公共舞台上给予我坐毡。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欢快。”

泰戈尔站在中国文化的一边，他在一篇《告别辞》中讲道：

“我记得我总觉得难受，每次我遇见不甚尊敬你们的那些人，他们是无情的，冷酷的，他们来到你们中间任意地侵略、剥削和摧残，他们忘怀你们对文化的贡献，也不曾注意你们伟大的艺术。”

泰戈尔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意识到西欧的物质文明是产生罪恶的原因，故而他也在谈话中明白地表达了如下的见解：

“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而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的丑态，西洋文明

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之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

作为中国文化挚诚的热爱者，泰戈尔致力于中国的研究。1937年，他亲自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为中国学院的成立主持揭幕典礼，并做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公开演讲。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不仅是当时印度第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专门机构，而且从那时至今，一直是印度研究中国的中心。

对于中国之行的美好记忆一直令泰戈尔难以忘怀，1941年他在病榻上还口述过一首诗，追忆他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在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们的祖国，
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
他们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泰戈尔的日本之行使他深深地赞美日本国民的团结、顺从和忍耐的精神，他曾称日本为“亚洲的新日出”。但是在1937年7月7日，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入侵中国时，诗人非常愤怒。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用自己的笔来谴责其侵略行为，并从道义上支援中国人民。

他曾以电报、信件、讲话和诗歌等种种方式表露自己的感情和态度。1937年秋天在病中发电给蔡元培等人，慰问中国人民：

“贵国人民此次对于所加于贵伟大和平国土之非法无理侵略，作英雄勇武之抵抗，余已不胜钦佩，并切祷阁下等之胜利。余之同情及余之国人之同情，实完全寄与贵国。愿正义与人道，由阁下等之凯旋，得以护持。”

泰戈尔同情中国的声音很快地传遍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日印协会”来收买诗人，泰戈尔在给该协会的复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坚定的立场：

“我十分敬重和热爱日本人民。这便是为什么我不能坐视日本政府强以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使命加诸其人民的理由。在我看来，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似乎是一样作了一幕共同的悲剧的牺牲者。……因此在感谢你与你的协

会所给予我的厚礼和友爱时，我甚愿表示明白：我对于日本人民所怀的友爱，并不包含对于其统治者的悲惨政策。”

1938年1月，当诗人听到日本的战争刽子手们竟在佛寺中祈求胜利的消息，他义愤填膺，写下一首题名为《敬礼佛陀的人》的长诗，声讨丧失人性的杀戮者。

更可贵的是，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的抗战，泰戈尔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款。在国际大学，他率领师生们义务演出，为中国人民筹资。1938年4月，他还写了题为《致中国人民书》的长信，祝愿中国人民在英勇的斗争之中诞生出新国家和新民族的生命。

这一年7月，曾在和平之乡受过泰戈尔款待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写来一封信，声称日本在中国的杀人行为是为在亚洲建立新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途径，是“亚洲为亚洲”的战争。泰戈尔阅后满腔怒火，在复信中对这一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除非你能够使中国人民信服，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等成为无家的乞丐——借用你自己的词句，即那些尚未被炸成“泥鱼的残骸”——除非你能使这些牺牲者信服，他们遭受的只是一种仁慈的待遇，此种仁慈的待遇在未了将拯救“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否则，你殊不必再次游说我们相信贵国的高贵。”

在复信的最后，泰戈尔写下这样一句话：“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尔在道义和行动上对中国的支持，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茅盾曾这样说过：“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1956年，周恩来总理也真诚地赞扬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也在中国读者的心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从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就在中国风靡一时。郭沫若、郑振铎、谢冰心、徐志摩等人的早期创作，莫不受到他的有益的影响。

郭沫若追述自己初读泰戈尔作品的感受时说：“我好像探得了我‘生命’，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他还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称作“第一阶段泰戈尔式”，特点是“崇尚清淡、简短”。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作于日本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鹭鸶》和《春愁》等作品，显而易见地受到泰戈尔的影响。他早年的泛神论思想中也有泰戈尔的影子。

1919年，冰心研读了泰戈尔的传略和诗文后，于是“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冰心曾译介过泰戈尔的许多诗作，并在泰戈尔的诗作中觅得了自己心爱的题材——母亲和孩童。泰戈尔的短诗也影响了冰心，使她写出了诗集《繁星》和《春水》。应该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流行的“冰心体”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中，显然也有泰戈尔创作的痕迹。

正如郑振铎在他所译的《飞鸟集》的序言所说的，我国许多写作新诗和短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

1961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为泰戈尔诞辰10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一年，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套共10卷的《泰戈尔作品集》。此外，泰戈尔的作品也被选入我国中学的教科书中，而在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中，泰戈尔的作品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民热爱泰戈尔。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泰弋尔

第一章 泰戈尔家族

在古代印度，随着奴隶制度的出现，印度特有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也逐渐形成。社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其中，婆罗门是以祭司为职业的僧侣集团，是宗教和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是帝王将相，是权力和财富的主宰者；城市平民被归属于吠舍这一种姓；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首陀罗，他们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过着最悲惨的生活。

种姓制度严禁不同等级的人交往与通婚，因此，在这个人人被打上种族烙印的东方文明古国，仅诞生这一偶然因素就可以决定人们一生的地位、职权与生存境遇。于是，每一个家庭，尤其是那些高等种姓都要竭力去维护自己家族的尊严与权威。

泰戈尔出生于怎样一个家族背景呢？查考他的家世是件极为不易的事。据考证，泰戈尔一家虽都是婆罗门，但正统的婆罗门却因为他们被称为“皮雷利”而对他们加以排斥。关于“皮雷利”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说法不一，但据说是在很久以前这一家族违背了教规，接触了异教徒（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因此正统的婆罗门蔑视他们，就像蔑视低种姓的人们一样。

社会的排斥使他们到处流浪。在 17 世纪的最后的 10 年里，一个名叫般伽纳·古夏利的年轻人，离开了他在东孟加拉库尔纳区的家，来到恒河之畔，在距离英国人驻地不远的戈温德普尔村定居。那时候，戈温德普尔（现为加尔各答的一个区）还只是个小小的渔村，村里的人都属于低种姓。居民们见到一家婆罗门竟屈尊来这儿定居，心中的喜悦便油然而生。于是人们便尊敬地称古夏利为“塔克尔”。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克尔”这一尊称变成了这家人的姓。

当年的古夏利家最早和英国商人打交道，并获得了专门负责供应外国船只食品的美差，从此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由于经常和外国商人特别是同英国商人打交道，外国商人便自然而然地以为“塔克尔”是这家人的姓氏。这以后，古夏利家族姓又经历了另一次变异：由于英国人不能掌握印度生僻词的正确发音，所以他们又把“塔克尔”读为“泰戈尔”。年深日久，“泰戈尔”——这“塔克尔”的英文变异就成为这家人的姓氏了。

就像家族姓氏的变迁和英国人密不可分一样，这家人的命运一开始也同在印度的英国势力结合在一起了。随着英国的政治势力和商业贸易在印度国土上的迅猛扩张，这个在昔日不起眼的小渔村也日趋繁荣，最终发展成著名的城市加尔各答，成为印度的新商业中心。泰戈尔家族也分享了这座城市的好运气，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日益兴旺起来，依靠兴隆的商业活动和庞大的庄园作为后盾，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印度的名门望族。到了诗人的祖父德瓦尔伽纳·泰戈尔这一代，这个家族达到富裕昌盛的顶点。

德瓦尔伽纳诞生于 1794 年，他精明能干，家资丰厚，生活豪华，同时又乐善好施，为公益事业投入大量的钱财，因此被人们称作商业界的

“塔克尔”系对孟加拉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意即“圣”或“先生”、“神”、“主人”。

“王子”。在当年的印度社会中，他是位出类拔萃的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享有崇高的荣誉。德瓦尔伽纳不仅拥有许多大庄园，而且所经营的商业遍布于各个行业，如硝石、蓝靛、糖、茶、煤等等。此外，他还有一支船队定期往来于英国和印度的海岸之间。他还开设了第一家以印度资金进行周转的现代银行——“联合银行”，组建了“泰戈尔公司”，妥善管理这些企业。在公益事业上，他总是慷慨大方地捐款资助加尔各答的众多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为创办加尔各答国立大学、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加尔各答第一所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当人们走过加尔各答国立图书馆的台阶前，最先看到的就是德瓦尔伽纳的塑像。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兴趣颇大，与印度的大学和医学院都有交往，并常常参加皇家亚洲学会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德瓦尔伽纳思想进步，对于政治、宗教和科学等领域中的进步改革运动的支持，他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罗摩·摩罕·罗易及当时其他进步人士从事的改革运动，无一不从他那儿得到坚定有力的支持。当年，海上旅行被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叛逆并要遭到惩罚，而他却在 1842 年和 1844 年两次漂洋过海到英国旅行，并访问了英国女王和贵族，会见了许多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第二次旅行未能返回故土，1846 年他在伦敦与世长辞，享年 51 岁。

德瓦尔伽纳共有三个儿子，长子代温德拉纳特便是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的父亲。代温德拉纳特生于 1817 年，他的童年是在颇为豪华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而这种奢华的生活在他青年时期则达到了顶峰。代温德拉纳特在慈祥的祖母、善良的母亲和富有的父亲的三重宠爱下长大。然而这三方面的爱却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祖母生活十分简朴，她只吃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吃多少日子，就斋戒多少日子。平日里她总是不断地为家神编织花环，唱赞神曲。而代温德拉纳特的母亲在苦行和纯朴方面比祖母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甚至远离她的丈夫，不愿意同他接触，视他为“粗野之人”，她甚至觉得和丈夫一起用餐都是一种堕落。

来自祖母和母亲与来自父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爱抚，在代温德拉纳特朦胧的意识中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不仅使他过早地变为一个沉思、持重和性格内向的人，而且还迫使他那颗年轻而又充满疑惑的心，常常去思考自我克制是不是宗教的真正奥秘，去思考自己是选择自我克制还是追求快乐和享受。

在代温德拉纳特 20 岁那年，他无比敬爱的祖母病逝了。在陪伴祖母度过最后日子的时期，代温德拉纳特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感到自己对荣华富贵已经产生一种强烈的漠视。祖母去世后，他回到家中，把财产分给朋友和熟人，放弃家务的管理，开始研究印度宗教经典和西方哲学著作。他在后来写作的《自传》中描写了他当时的精神饥饿：我的内心无限悲哀，我的周围一片黑暗。现世诱惑业已消失，神的实感尚未来到。地上的幸福和天上的幸福，同时离我而去。人生如此荒凉，世界犹如墓地。

1839 年，也就是他 22 岁那年，代温德拉纳特正式创立了一个印度新教团体——“知梵协会”，致力于宗教改革活动。他的协会以印度古代

哲学经典《奥义书》为宗旨，目的是敬奉无形的独一无二的梵天，这个既旧又新的信仰，向当时以偶像崇拜为中心的正统印度教教义与仪式提出了挑战。在正统教派看来，他的思想与基督教同样荒谬，甚至还更坏一些。1843年，他将自己的协会和宗教改革家罗摩·摩罕·罗易的梵会合并，称作“梵社”。后来，梵社内部发生分裂，分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代温德拉纳特系前者的领袖。

代温德拉纳特本人身上兼具三种不同的气质——对宗教的浓厚感情、对艺术的敏锐感受和对实际工作的精明善断。第一种气质反映在他精神上的唯心主义和对神灵的感悟力上；第二种气质表现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中，表现于他的充满着优美而富于诗意的言谈和写作中；第三种气质则体现在他对梵社的组织工作和对财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方面。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结合；此外，他待人温文尔雅，举止尊贵大方。他的才干和为人使他的名望与日俱增，后来人们称他为“玛哈希”，即“大圣人”。

在当年的印度，旅行被认为是一种冒险的事情，需要真正的勇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代温德拉纳特终生喜欢旅行。几乎每年春季或秋季，“大圣人”都要离家出游。他尤其喜欢到白雪皑皑、巍然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旅行。面对着那四季积雪的崇山峻岭，他内心感到无限的快慰。被尘世纷繁的生活困扰的代温德拉纳特，甚至想永久定居于自己热爱的喜马拉雅山，这样他就可以在孤寂和宁静中对着神灵祈祷，度过余生。然而有一次当他面对山泉，思索着溪流源于高山泉水，流向原野，奔向大海，而不惜将清流弄得浑沌以服务于人类时，他的心又感动不已，一种伟大的情感便油然而生，于是他决心将自己所悟所学的真理传播于四方，造福于人类。从此，虽然他也多次去喜马拉雅山旅行，但再没有过隐居遁世的念头。

由此可见，“大圣人”在真诚地思索来世的问题时，并没有规避现世。他对宗教改革的满腔热忱和他积极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家人。由于他的思想是在自由的空气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冲破了教义的束缚，所以，他在家庭中对子女们的态度也十分开明。他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充分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施行严格的家庭教育；一方面培养他们虔诚的宗教情感，另一方面又不限制他们享受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孩子们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可以充分地发挥各自不同的特长。家中还经常展开宗教和哲学问题的讨论，有时还演出剧目，举行诗歌朗诵会和音乐会。常常有许多著名学者、诗人、音乐家和演员慕名而来。

在这样一个充满智慧、才能、激情而又富于自由精神的家庭中无拘无束地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怎么可能没有卓越的天分和才华呢？

代温德拉纳特有一个庞大的家庭。他和妻子夏勒达·黛维一共生育了15个儿女。女儿们长大结婚后，女婿们也长住在这个大家庭里。此外，

梵天，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创造大神，与湿婆、毗湿奴并列为两教崇拜的三大神。

梵社，印度教社团之一。1828年由罗摩·摩罕·罗易创建，奉梵天为惟一真神。主张改革印度教，反对偶像崇拜、清规戒律和敌视异教徒，反对殉葬、重婚和多妻制，主张男女平等，崇奉《奥义书》。罗摩·摩罕·罗易死后，代温德拉纳特任该社首领。

还有不少亲戚和众多仆人与主人同住在一起。

长子德维琼德拉纳特聪颖过人，才华出众，富于创造精神。他是位大学者、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实践，创造出孟加拉速记体来写诗，并有著名长诗和哲学专著传世。

次子萨特因德拉纳特是进入英属印度行政机构的第一个印度人。他通晓多种语言，是一位梵文学家，同时还能流畅地用英文和孟加拉文写作，用孟加拉语翻译过迦梨陀娑的作品《云使》，写过一部关于佛教的著作和一本回忆录。他的女儿英迪拉·黛维后来成为孟加拉文学中受人尊敬的作家。

三子海明德拉纳特承担了教育我们这位传主——少年泰戈尔的重担，他坚持用祖国的语言来教育他的弟妹，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的是，他不到四十岁便去世了。泰戈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满怀感激之情写道：“在四周盛行英语教育的那些日子，我三哥勇敢地教我在孟加拉语言的道路上前进。我把自己的感激虔诚地奉献给升入天堂的哥哥。”

五子乔迪楞德拉纳特多才多艺，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是那个时代促使印度觉醒的重要人物，同时他还是富于激情的诗人、剧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他对比自己小十三岁的弟弟——未来的伟大诗人的诗才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这个家族的其他子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女儿——泰戈尔的两个姐姐：

长女苏达米妮，为帮助母亲分担操持大家庭繁重的家务，以母亲般的慈爱抚育着我们的小诗人，也曾长时期地陪伴和服侍年迈的父亲。

第五个女儿斯瓦尔纳库玛莉是一位名音乐家，同时也是孟加拉第一位女性长篇小说家。

一个家庭能拥有如此之多的优秀子女，已是非常罕见的了。然而当时又有谁能够想到，这个大家庭中即将呱呱坠地的最小的一个孩子日后会成为名扬世界的文化名人和诗歌巨匠呢？

第二章 罗宾的童年

1861年5月7日，一个婴儿诞生在加尔各答市中心的这个既传统又开明的大家庭里，他就是印度近代最负盛名的伟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由于是父母最小的儿子，罗宾德拉纳特——家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罗宾”——便成为整个家庭中所有成员都钟爱的小孩子，可是，大家又从不溺爱他。

孩子出生时，总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在多子女的印度家庭中，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家庭会对第十四个出生的孩子表示特殊的欢迎和优待。而泰戈尔家族的这个大家庭，居住在加尔各答的乔拉桑戈府邸中，各个兄弟姊妹及其亲属各自都带有一大群子女。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得到“小皇帝”般的待遇几乎是不可能的。罗宾的母亲管理着这个大家庭，整日被没完没了的家务缠得无法脱身，根本腾不出时间来关照最小的儿子，所以罗宾在童年时代并未享受到多少母爱，倒是他的大姐苏达米妮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母亲，给予小罗宾以无限的疼爱和温存。

罗宾是父母的第十四个孩子，第八个儿子。他刚出生时，容貌端正，身体强壮，不过他似乎还没有哥哥姐姐们那么白皙、漂亮。担负抚育罗宾的大姐苏达米妮在给他洗澡时，总爱开玩笑说道：“我的罗宾长得黑，不如大家白净，可将来有一天他比谁都要更了不起的。”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既然罗宾德拉纳特生在富贵人家，那他一定是在相当优越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其实不然。总的说来，泰戈尔家庭是比较富裕的，孩子们在花钱方面一般也没有什么限制。可是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简朴的，在饮食方面的要求是卫生和营养，绝不去追求美味佳肴。孩子们的穿着也不比一般中等家庭的孩子更讲究，并非都是绫罗绸缎。所以，泰戈尔家中的孩子远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公子和小姐。而且按照传统，鞋子和袜子要等孩子长到10岁时才依照宗教法规批准穿用。况且，到了罗宾出世时，由于父亲代温德拉纳特整日耽于思索，无心过问家政，家中已不像从前那么殷实了。诗人在他迟暮之年回忆起他的童年时，曾经这样的写道：“我在童年几乎不知奢侈为何物，总的说来，那时的生活比现在简单得多。同时，我们家里的孩子，有完全不受过分照顾的自由。……我们的膳食没有什么美味的，我们所穿的那些衣服只能引起现代儿童的嘲笑。在我们满十岁以前，无论如何也穿不上鞋袜。冷天就在布衣上加一件棉布外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就算寒伧。”

“我们家的情形那时已经很像穷人了。什么马呀、车呀，只是在名义上存在罢了。院子外的一角，皂角树下的铅皮顶马房里，只有一辆马车和一匹老马。那时我们穿的衣服也极其简单。脚上穿袜子是以后很久的事。当我们可以超过布拉节西瓦尔的菜单的规定，早餐吃面包和香蕉叶子包的黄油的时候，那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登了天。在旧时豪华已日趋败落的情况下，我们被训练得很容易安于一切了。”

当罗宾稍大一些，他也像他的侄子和侄女们一样，在仆人的照料管理下过日子。年迈的父亲像隐士一样，在家中深居简出，而且他总是忙于自己的改良主义事业，要不然就是坐禅默祷，或者四处旅行。因此，年幼的罗宾不仅得不到操劳不已的母亲的多少照顾，甚至也很少见到父亲的面，除了父亲从喜马拉雅山区漫游归来偶尔会与孩子短暂相处之外。每当这样的时候来临时，小罗宾的心便欢喜跳跃，感受到无穷的乐趣。然而这种时刻太少了！

然而，这种来自双亲的关心和爱抚的缺乏，使得这颗幼小的心灵在童年时代对母爱的不倦的向往，一次又一次地化为对女性的关怀与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所发出的令人难以忘却的余音与回响，在他成人之后所创作的儿童诗中仍可觅到痕迹。每当小罗宾被人们撇下一人独处时，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凭栏眺望，一连好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遥望着远处的花园和池塘、来来往往的人群……生活就这样不经意地造就了一颗善感多思的心灵。

泰戈尔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谈起自己的童年时，这位伟大的诗人对他幼时的孤独丝毫也没有半点顾影自怜的感觉和抱怨之心，相反，他还庆幸自己的命运，正是因为父母的忙碌使他避免了由于长辈关怀备至的爱而带来的任性和各种不良习气。诗人清醒而又理智地写道：“尽管大人从照顾小孩之中感到无比欢愉，然而小孩的不幸也从那儿引出。”

罗宾的童年时代是在仆人的照料中度过的，在总结这段早年生活时，他说，印度历史上的奴隶时代是不幸的，而他的这段生活也是同样的不幸。他回忆起在家奴看管下度过的不愉快的童年，不无厌恶地称那是“仆人统治”时期，因为总有一些心地不正的仆人让他必须遵守种种清规戒律，让他时时处在十分烦恼的精神状态之中。他写道：“我们是处在奴仆的统治之下的。为着省他们的事，他们几乎压制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不受娇惯的自由，补偿了这个约束的粗暴，我们的心灵没有受到不断的娇养、奢侈和盛饰的迷惑，因此始终是清明的。”

在另一处他还这样写道：“我就非常喜爱自然”，毕生“渴望着遥远的道路”。但在童年时代，他却被束缚在乔拉桑戈家中的几间房子里，徒然地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向往着外面的人们。这种足不出户的生活是由一个仆人的诡计造成的：为了让好奇好动的小罗宾老老实实地呆着不动，以便他自己可以开怀畅饮，诡计多端的仆人将小罗宾安放在屋中的一个地方，用粉笔在他的周围画一个圆圈，然后以恐吓的口吻警告他，如果他胆敢越出这个圈子，就会引起可怕的灾祸。可怜的小孩很早就听过《罗摩衍那》的故事，熟知女主人悉多越过圆圈之后所遭受的种种可怕的灾难。所以他只有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当仆人离开之后也不敢走出那可怕的白线。所幸的是，这个地方靠近窗台，从那儿可以眺望外面的世界：窗前是一个广场，那里有供人们斋戒和沐浴的水池，水池的一边是郁郁葱葱的椰树林，另一边是一棵枝叶繁

泰戈尔曾著有两部《回忆录》，一部是他中年时写的，后来译成英文，于1917年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他年近80高龄时写的。

《罗摩衍那》，印度古典史诗，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4世纪到公元2世纪，主要内容是写罗摩衍那与妻子悉多的故事。

茂的高大的榕树。小罗宾常常凝望着水池边的沉静榕树，默默地欣赏着榕树下的地面上的阳光与树影的变幻无穷的嬉戏。后来，当诗人再次回忆起那棵曾陪伴他度过快乐时光的老榕树——这童年的伙伴时，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多汁的根从你的枝上垂挂下来，啊，古老的榕树，
你昼夜凝立着，像一个苦行僧在忏悔，
你还记得那个幻想和你的影子游戏的孩子吗？

喂，你站在池边的蓬头的小榕树，你可曾忘记了那个小孩，就像那在你的枝上
筑巢又离开了你的鸟儿似的孩子？

你不记得他怎样坐在窗内，诧异地望着你深入地下的纠缠的树根么？

妇人们常到池边，汲了满罐的水去，你的大黑影便在水面上摇动，好像睡着的
人挣扎着要醒来似的。

目光在微波上跳舞，好像不停不息的小梭在织着金色的花毯。

两只鸭子挨着芦苇，在芦苇的影子上游来游去。孩子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

他想做风，吹过你的萧萧的树杈；想做你的影子，在水面上随阳光俱长；想做
一只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还想做那两只鸭，在芦苇与阴影中间游来游去。

——《新月集·榕树》

诗人还追忆起，在那时他自己是不许走出家门的，而事实上他也没有走出全部屋子的自由，幼小的他只能从围栏里面去窥视自己仰慕不已的大自然。那时，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它的名字就叫做“外面”。“它”总是用它的闪光、它的香气、它的声音，从它的空隙里来触摸小小的他。在他看来。这个被他称之为“外面”的东西是非常顽皮的，它总能在围栏之外作出种种想与他玩耍的样子。然而它是自由的，而他自己受约束的，不能去与它相会、嬉戏，因此，“外面”对他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这是一颗怎样善感而又真实的小男孩的心啊！它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难以忍受的束缚啊！

不过，从那时起，这颗幼小的心中就孕育着一种天才的观察力和敏锐多思的气质。如果说小罗宾之所以能够默默地忍受着那近乎残忍的管辖，那也不全是因为他生性温和驯良，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是他在任何时候都对周围的一切永远怀有无限的兴趣和好奇心，能够从一些极为细小的事物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富于天才的心灵与普通的心灵的区别哪怕是在孩童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了。

正如诗人后来所说的一样：“今天，当我回顾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一次次地想起：我总觉得生活和世界充满着一种神秘。我感到，每一个地方都隐藏着这种神秘。每天，我的心里产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时

候能够揭开这些秘密。我仿佛感到，大自然捏紧自己的拳头，微笑地问道：‘请猜猜，这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些日子，我感到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

在这个还很稚嫩的头脑中，竟有着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纵使被圈在那个粉笔圈里，也禁不住这未来的天才诗人的想象的翅膀在天空中翱翔，也窒息不了那充满活力的好奇心神游四方。

小罗宾身边的仆人自然不全是刁滑的，不过在小罗宾的身边确有一个贪嘴的仆人，他从来都不勉强小主人的进食，每次开饭时，他总是手拿着盛放主食的木盘，挨个问孩子们是否还再添一点，而他自己对牛奶则是来者不拒。在买点心时他总是挑最便宜的买。善良的小罗宾总是为了不让这个仆人吃亏，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以至诗人后来这样说：“这样我从幼年时就很容易忍受少吃东西。”

比起受骗和挨饿的经历，儿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就算不了什么。泰戈尔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除了对上述的两个仆人仍保留有清晰的印象外，“对于我们童年时代的大多数暴君，我只记得他们的拳打脚踢，此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不过无论怎样，儿童天真善良的心总是不会记仇的。更何况小罗宾的童年也并非没有丝毫童趣。照管他的仆人中也不乏多才多艺的好心人：名叫卡拉什的老会计是个大滑稽家，为了讨好小主人，他总是对着小罗宾高声唱着自己编写的滑稽诗，而诗句一旦吟出，便滔滔不绝，韵脚也铿锵有力，令小罗宾乐不可支；有的仆人则可以背诵和演唱全部由民歌体写成的《罗摩衍那》；还有个仆人擅长绘声绘色地讲强盗故事。所有这些幼时听到的生动故事都深深镌刻在未来诗人的头脑中，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印度民间文学创作。祖国人民的故事对罗宾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对他日后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也播下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种子。

第三章 第一首诗

罗宾很快地就成为民间文学的爱好者了。开始，他还只是对一些神怪故事、趣闻和谚语感兴趣，后来他在了一本儿童初级课本里读到这样两句催眠曲的韵文：

雨儿滴沥着
叶儿颤动着

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首诗。当时，罗宾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快乐。这是一个儿童对诗歌神奇力量的“第一印象”，这是一颗对诗歌有着一种天然的领悟力和鉴赏力的心灵的直觉。后来，诗人追忆起他当时的感觉时写道：“直到今天，那些日子的欢乐图景还铭刻在我的心上。我明白了，诗歌为什么要有韵脚。由于有韵，诗词似乎结束，但又似乎没有完结；倾诉结束，但它的回响犹存；心灵和耳朵互相不断玩着押韵的游戏。这样，我在自己生活的漫长日子里，在我的知觉中，一次次地谛听到雨水的淅沥声和树叶的婆娑声。”

可是文学给予他的初次愉悦以及相对自由无羁的生活，逐渐被繁重的学习重担所代替，幼小的罗宾也不得不开始面对新的烦恼。

起初，罗宾接受的是家庭教师的教育。当罗宾看到自己的兄长和大姐的儿子乘着车子去上学，并且在回来后总是向他炫耀他们在途中所见所闻时，罗宾也大哭大闹着要去上学。家庭教师给了他一个耳光，厉声说道：“你现在哭闹着要去上学，将来你恐怕更要哭闹着想离开学校呢！”可倔强的孩子不断地哭着闹着，家人们不得不把他送进了“东方学校”。然而不久以后，罗宾便发现他已不幸被家庭教师的话言中。

在东方学校这所小学里究竟学到些什么呢？罗宾后来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他却记得那里为惩罚功课不好的学生所用的五花八门的办法：背不好书的可怜的孩子们，被罚站在凳子上，两臂伸开，手掌向上，上面叠放着几块石板。粗暴冷酷的学校教育很快就在单纯的小罗宾身上发生影响，当他从学校回到家中，便开始模仿冷酷无情的教师，拿着藤条，敲打着院中的栅栏，并把自己的玩具，当做自己的学生加以训斥。后来，当他忆起自己这段经历时曾这样写道：“现在我懂得了，与内容相比，风格的掌握是容易的。我毫不费劲地学到了教师的全部粗暴脾气、烦躁易怒的感情和偏袒的态度，却把老师讲述的内容抛在一边。好在自己并不是生性残虐的人，不能对有生命力的人发泄，更不会虐待别人。”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小罗宾7岁那年，他转入一所典型的英国式的师范学校。当时，这所学校被认为是依照英吉利王国的教育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模范学校。所谓模范学校对未来诗人的成长起了怎样的作用呢？在罗宾的记忆中，这种所谓正规教育似乎也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两件事情令他终生难忘：

一是在上课之前，所有的学生都被强制在走廊上坐成一排，集体吟唱英文歌曲。校方似乎是想以此来激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根本不知其意的拗口的英文发音，加上异国奇怪的音乐曲调，使小罗宾一点也不明白大家共同练习的、重复的是什么古怪的咒语。而

在单调枯燥、没有意义的表演中他的心中丝毫也感受不到任何快乐。

第二件事也是小罗宾难于忍受的一件事：一个给他上课的教师满口脏话，小罗宾对这个人十分厌恶，拒绝回答他提出的任何问题，这样便引起这个教师的报复，他把这个蔑视他的小孩长年安置在教室最后一个座位上。在别人都在忙忙碌碌地做功课的时候，小罗宾却被晾在一边，独自默默地思考解决学习中的难题。一年过去了，在年终考试中，小罗宾的孟加拉语的成绩名列榜首，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结果。那个喜欢骂人的老师向校方提出异议，怀疑主考老师徇私作弊。结果校长又让小罗宾重考一次，并亲自与考官一道主考，但是真金不怕火炼，小罗宾再次取得最高分。

在将小罗宾送到学校读书的同时，家人又给孩子安排了各种各样科目的教育，盼望他能早日成材。虽说家庭学习的效果要比学校好，但对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来说，负担也太重了。

功课填满了他一天的光阴。早晨天还不亮，他就必须起床，跟随城里一位有名的独眼拳师练摔跤。操练结束，小罗宾带着满身的泥土归来后，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立刻给他讲习“骨骼知识”的课程：一幅人体骨骼图挂在墙上，小孩子要努力地背诵、记住各种骨头的拉丁文名称，到了晚上，这幅骨骼图又被挂在他卧室的墙上，便于他随时温习；7点钟到了，数学老师准时出现，小罗宾手拿书本和演算石板，在老师的指导下解习算术、代数和几何习题，直到9时30分；接着，仆人照例送来午餐盘子，盛有米饭、咖喱鱼和豆汤，这样的食谱从来都不会变换一下。被一上午的活动和学习弄得筋疲力竭的孩子，对这份一成不变的午餐早已腻味透顶，例行公事般地草草吃了几口完事。上午10点整，疲惫的小罗宾又被送到学校，在学校里一直要关到下午4点。

下午4点30分，孩子终于从学校中解脱出来，回到家中，体操教师已在等待着他。老师先让他做一个小时的双杠练习，于是他得在木头杠子上面上下不断翻动。还未等到体操课结束，图画教师又已经来了。傍晚时分，刚刚吃过晚饭，英文课又开始了……由于一天过分地紧张，小孩子已是困不可当，以至在昏黄的油灯下念书时，便禁不住瞌睡频频，时而进入梦乡，时而又猛然惊醒，课本上的内容大都遗失在睡梦中了。

沉重的学业负担使得小罗宾很少感到童年的欢乐。西方一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小孩子的工作就是游戏。”可是小罗宾却被过早地投入到繁重的课业中去了。尽管家庭教育比起学校教育更为有效，为小罗宾日后多面的兴趣和才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孩子却失去了许多童年应该有的乐趣。因此，罗宾终生厌恶无趣的教育，称之为“残酷的折磨”。他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令人读来心酸的话：“书本告诉我们，火的发现是人类最大的发现之一。我不想反驳这个。但是我忍不住想到，小鸟是多么幸福，因为他们的父母晚上不能点灯，它们在清早上语言课，你一定注意到它们诵读的时候是如何地高兴。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它们是不必学英语的。”泰戈尔后来之所以持续不断地探索教育问题，与他童年时代所经受的这种“残酷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不过，在儿童时代中，有一件事给小罗宾带来过极大的快乐——那就是8岁时他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比他大8岁的堂兄乔迪要他写诗玩，依乔迪的说法，世上没有比写诗更容易的事了，

只要有一个个的字填入十四个音节的模式里，一首诗就成了。于是小罗宾也就依法炮制，果然他的第一首诗就诞生了。诗人后来追忆道：“立刻一朵十四音诗句的莲花就开放了，而且有蜜蜂飞了上来。诗人与我之间的距离开始消失了，从那时起就一直消失下去。”

就在经历过这次偶然的“游戏”之后，罗宾感到生活中有一扇快乐之门向他打开了。写诗简直使罗宾着了迷：他找到一个蓝色的笔记本，在上面写满了自己的诗句，拿着自己的诗不断地找人请教，“就像一只小鹿以新生的嫩角到处乱磨，我也以萌芽的诗歌到处去麻烦人。”罗宾很快地被人们视为一个小诗人，他在家中常常朗诵自己的诗作，家人们都以年仅6岁的小诗人感到骄傲。有一回，罗宾写了一首诗，大意是这样的：在水面上漂浮着一朵可爱的莲花，有人为了采摘它，跳进河中游泳过去，可是莲花却被他激起的波浪越推越远，无奈的人永远不能得到那美丽的莲花。诗作表现了一种悲哀的感情。长辈们听了这首诗后，脸上都露出喜悦和笑容，一致夸奖这小孩有着与生俱来的诗才。

罗宾热爱生活，热衷于幻想，对大自然和周围的人类社会充满了挚爱之情和好奇之心，他这样写道：

回忆童年的光阴，最常想到的是那充满在生活和世界中的神秘。梦想不到的事到处潜伏着，每天最先浮上心头的疑问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碰上它呢？就像自然把这些东西握在拳头里，微笑地询问我们：“你猜这里面有什么？”我们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她是拿不到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种多思善感、热爱周围的一切的美好心灵，才孕育出如此细腻敏锐的诗才。

后来，罗宾会写诗这件事传到了老师的耳中。一天，老师唤来罗宾，要他以一句名言为题材作诗。第二天，罗宾拿出了诗稿并遵照老师的意见当场朗读给同学们听。不幸的是这首诗并没有成为罗宾确有天才的明证，反而令所有在场的学生嫉妒或猜疑，大家认定这是抄袭之作。诗人日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幽默地说：“关于这首道德教诲诗，惟一值得赞扬的是，它很快就消失了。这首诗留下的道德影响，离开道德教诲十万八千里。”

相比较学业中的其他课程而言，罗宾更喜欢音乐这门课，因为在音乐课中更少一些清规戒律。这也与罗宾整个家庭都热爱音乐有关。泰戈尔家可以说是一个“音乐之家”，家庭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音乐方面有一定的造诣：有的善于歌唱，有的善于演奏，小罗宾的嗓音也十分甜美，对美妙的乐曲，他可以做到过耳不忘。这个家庭的声望和全家人对音乐的热爱，常常吸引一些知名的音乐家前来拜访，有的甚至长期寄居在他们家里。于是，小罗宾常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音乐的氛围中，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熏陶，这对他的艺术感受力和想象力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在罗宾的童年逸事中，给予他不可忘怀的影响的事情还有一件，那就是在1872年和1873年之交的冬季，父亲从喜马拉雅山云游归来，以祭司的身份在家中为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举行了授圣线的仪式。罗宾当

时只有 11 岁零 9 个月。三个孩子的头发被剃光，然后把金耳环带在他们的耳朵上，再把他们三个关在 3 层楼的一个房间里祈祷，时间长达 3 天之久，目的是让他们在苦思冥想中感受生活和世界的奥秘。3 天的时间在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互相的戏闹中度过了，他们个个都感到自由而欢欣。然而当时让他们诵读的《吠陀》中的圣歌的优美韵律和婉转音调，却深深震撼和慑服了罗宾的心，尽管他那时对圣歌中深奥的象征和隐喻并不十分了解。

说到童年时代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便是他第一次去喜马拉雅山的经历了。那是在举行授圣线仪式之后不久，一天，父亲忽然把罗宾叫到跟前，问罗宾是否想和他一道去喜马拉雅山。罗宾听了欣喜若狂，倘若父亲不在跟前，他一定会手舞足蹈、跳跃欢歌的。因为在他美好的心灵里，喜马拉雅山是神奇的大自然的杰作，是他心中的神圣之地，他老早就盼望着这一天，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第四章 喜马拉雅山之行

昔日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远不像现在这样，是可以轻易参观游览的旅游胜地。它坐落于世界最高屋脊——青藏高原的边沿，终年白雪皑皑，人迹罕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它充满神秘诱人的魅力，有着无数优美奇诡的传说。这是一个除却圣人英雄之外凡人难以企及的“仙境”。而如今，未满12岁的罗宾就要去那里作一次拜访了，而且是同他的受人尊敬的威严的父亲一道前行，怎么不令他心花怒放呢？

在准备出游的那两三天日子里，小罗宾的兴奋和快乐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同时缝制五套新衣新帽的待遇，此外，还有许多“第一次”也同时降临到他的头上。出发的时候终于来到了，穿戴着新衣新帽的罗宾随父亲一道，踏上了生平第一次长途旅行的征程。

旅途开始后的第一站是桑地尼克坦，这里离加尔各答西部不远。罗宾的父亲大圣因喜欢这四周的风景而买下这块地，修建了花园和住宅，并为它取了一个吉祥、动听的名字。当少年罗宾初次来到这个恬静的住所时，他说什么也不会想到日后这里会成为一所有国际影响的学府，也绝对想不到今后他自己的创作生涯和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也要在这里度过。

在桑地尼克坦的数日里，罗宾第一次可以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四处游荡了，一种无限的欢欣涌上他的心头。后来回忆起对这里的初次印象时，他这样写道：

“我们抵达浦尔普尔（桑地尼克坦附近的车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坐进轿子，眼就闭上了。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象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前。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破坏。”

父亲从不对小罗宾的四处走动加以限制。没有“仆人统治”的约束，罗宾就像一只刚飞出鸟笼的自由的小鸟。白天，他或是在空旷的原野上那些被雨水冲开的深沟附近游玩，收集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石子；或是在花园中试图挖一个水塘终于又半途而废；或者在峡谷中寻找奔涌的清泉，观看鱼儿在水中游戏。他简直感觉不到疲倦。桑地尼克坦附近的广袤荒野那时是不毛之地，然而罗宾总感到他和它是那么亲近，他后来在一首诗中称桑地尼克坦是他的“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

父亲给他自由活动的权利，但并不完全放任他。他之所以想在这次旅行中将罗宾带在身边，是为了把孩童的心灵引入到正确的轨道。白天，他帮罗宾选读梵语、孟加拉语和英语的文学作品，而夜晚，他便要罗宾坐在他的身边，吟唱颂神的赞美歌；常常，父亲还指着星空给罗宾讲解天文知识。为了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和勤俭的生活习惯，父亲还给罗宾一些零钱，让他管理，同时还要他计算每日的开销并记录账目。此外，父亲还让他负责开他的金表。每天清晨父子一道出去散步时，父亲总让儿子把钱施舍给路上遇见的乞丐。尽管小孩子在计算钱币上并不总是正确无误，甚至把他的金表发条上得过紧以至要拿到店里去修理，但父亲从

意即“和平之乡”。

未斥责过罗宾。

大圣人自己喜欢读书，随身也带着不少书籍。他还让从未接触过梵文的小儿子一开始就学梵文读本第二册，让他自己边读边掌握词尾的变化。不仅如此，大圣人还鼓励幼子练习用梵文写作。后来，泰戈尔想起自己当时“用从梵文学来的词汇，构成夸张的复合字句，带着许许多多响亮的 M 音和 N 音，造成一种妖魔般混杂的神仙语言。但父亲从来没有嘲笑我的鲁莽。”与此同时，小罗宾也开始读《普通大文学》这本书，父亲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过之后，罗宾自己就用孟加拉文记录下来。

也是在桑地尼克坦，未来的诗人趴在一棵小枣树下，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剧，内容是有关民间传说中纳兰什·帕勒塔维这个伟大的印度君王的故事。剧本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后来这个本子却遗失了。

离开了装载着美好回忆的桑地尼克坦，父子俩在途中又在许多地方小作停留，然后在阿姆利则（或译阿默尔特萨尔）这个大城市停下了。阿姆利则的金庙给罗宾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好几个早晨，罗宾陪着父亲到一个有名的寺庙中去听经或唱赞颂歌。而到了夜晚，罗宾则被父亲唤来唱各种曲调的歌曲。

在阿姆利则逗留了一个来月的时间，阳春四月，他们终于开始了前往喜马拉雅山的最后一段行程。此行的最后的目的地是德尔豪杰，它位于海拔约两千米的高地，在喜马拉雅山的东坡，那儿是一个避暑别墅集中的市镇。

在平原地区已是初夏季节，但在山间夏日还未来临，正是一片大好春光。每天清晨，罗宾都随父亲一道起身，当他们坐着轿子上山时，罗宾只觉得在那高台一般的山坡上，都被春花的绚丽色彩照亮了。从未见过如此景色的罗宾的眼睛“整天都不休息，唯恐漏掉什么东西”。长大以后的罗宾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用优美生动的笔调写道：“山路转入一个山峡，林深树密，树荫下流出涓涓的清泉，就像茅庵中的小女儿，在沉思的白发隐士脚边游戏着，从黝黑的覆满青苔的岩石上喃喃走过。”

大圣人父子所居住的房子建在最高的山顶上，当他们抵达时，尽管已近 5 月，可山顶上依然寒冷，山坡朝北的一面，连冰雪都还未消融。

小罗宾的房间在房子的顶头，晚上，当他躺在床上，透过窗户就可以望见遥远的雪峰在星光中朦胧地显现。白天，罗宾可以任意漫游，欣赏着那冰雪皑皑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悬崖峡谷、茂密高大的树林、山顶高悬的瀑布和山中喧闹的流泉。

房子下面不远，是一座长着苍翠的喜马拉雅山雪松的悬崖，罗宾后来回忆这座山林时写道：“我总是拿着一根镶着铁头的棍子，独自走进这山林里去。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他们度过了多么美妙的生活啊！而在几天之间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它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像有一只凝冷的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落在地上的斑状的光和影，就像它的鳞甲。”

金庙，即锡克教寺庙，是锡克教第五世祖师阿尔琼·代夫建造的，后来，兰季特·辛格在位时，为寺庙加上一个用金箔包盖的顶，故被称作“金庙”。

德尔豪杰，是以东印度公司任命的印度前总督的名字命名的山间避暑之地。

神秘的喜马拉雅山是一个奇妙的所在。一路所见的绮丽的风光，还有第一次置身于庄严雄伟的世界屋脊的情景，深深震撼着罗宾的心灵。

在每日漫游之余，罗宾还要遵从父亲的严格安排，清晨背诵梵文，早祷后一起喝牛奶，听父亲诵读《奥义书》经文，然后父亲和仆人一道去散步，接下来是读一小时英文，之后是冰凉的冷水浴。午饭后和晚上还要做一定时间的功课。

与父亲外出旅行、同行同住的日子里，罗宾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父亲，听父亲讲述他的经历，讲他步行和骑马漫游的险遇，讲他怎样洗那让人难耐的冷水浴，讲他青年时代的笑话。后来，泰戈尔满怀着深情这样追念和赞扬自己的父亲：“当我拿着棍子从这峰跑到那峰，父亲并不反对。我觉察到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妨碍过我的自主。有好几次我的言行都不合乎他的口味和判断，他只用一句话就可以阻止我，但他宁愿等待我的自制的提醒。他不满足于我们驯服地接受正确的规范；他愿意我们全心全意地喜爱真理，他晓得只有顺从而没有爱是空虚的。他也晓得，真理如果丢掉了，还可以找到，但是勉强或是盲目地从外面接受了真理，实际上是把进入的门路拦住了。”

“同他允许我们在山上随意漫游一样，在寻求真理上也让我自己选择道路。他并没有为我有做错事的危险而踌躇，他也不为我有遇到忧苦的可能而恐惧。他举起的是一个标准，而不是一根训练人的棍子。”

这是用真挚而又充满理性的心灵和感情所做的回顾和评价，也是对这种教育方法的一种赞同。事实上，罗宾幼年时在父亲的教育下所受的磨练和所养成的不少习惯，让他终生受益。

在喜马拉雅山上一住就是几个月，终于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父亲派了一个仆人将小儿子送回到加尔各答的家乡。然而逃脱了学校枯燥无味的生活的这几个月，不仅使罗宾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更使他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锻炼，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增长了许多知识。在罗宾的心目中，喜马拉雅山之行是他童年时代一段最幸福最完美的日子。这段美好的时光给了正在成长的少年罗宾以深刻的印象，是他真正的启蒙教育，并成为他创作的丰富源泉。

第五章 温馨的家

从喜马拉雅山旅行归来之后，对于罗宾来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在家庭中的地位立即提高了。因为他已经出去见过大世面了，而且，还是与远近闻名的父亲大圣人一道出去的。家里的孩子、大人及仆人们都很羡慕他，罗宾一下子便成了整个家庭中引人注目的焦点，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少年。他初次尝到了受人尊敬与宠爱的滋味。小诗人以往受到的“仆人统治”的严厉的绳索不见了，以往所没有的自主权现在也增多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个有尊严、说话算数的孩子了。这个昔日在学校和家中备受管制和束缚的学童，转眼之间就成了凯旋的少年英雄。诗人后来这样说：“当我到家的时候，不但是旅行归来，而且是从下房的流放，回到我内院应有的地位上去。当内院的家人聚集在母亲房里的时候，现在也有了我的一个很高的座位。”

内院是印度传统家庭里妇女们居住与活动的场所，相当于中国的闺阁绣楼，女眷们常常拥到这悠闲而又深幽的地方，做着令不得入内的男孩子们无从了解的交谈，享受自己的身为女子的快乐而不必去向任何人汇报。

“内院离我还很遥远的日子里，它是我想象的乐土。内院，从外面看去是个草地，对于我却是一个自由之家。”以前罗宾一直非常羡慕自己的姊妹可以不必因功课不好而遭到家庭教师的惩罚，而在男孩子们必须去学校上课时，她们却能径直走到内院里去。因此，在罗宾的想象中，内院是个安静而又快乐的避风港，充满着神秘的气氛。

喜马拉雅山之行仿佛为罗宾镀了金，他向往已久的内院也开始对他开放了。而他也就像古代故事中的骄傲的小孔雀，成为内院露天会议中重要的主讲人了。想表现自己和想得到母亲和女眷们的欢心的愿望，使得小罗宾的演讲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背诵孟加拉文法书中的诗句，讲解天文学中的一些知识，例如太阳比地球大得多的理由，并在只懂孟加拉文的妇女们中间，高声朗读梵文的《罗摩衍那》，尽管他自己有时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时罗宾简直像一个无所不知的大学者了！善良的母亲深以小儿子自豪，常常让罗宾给大家朗诵梵文诗句。

来自内院的众口一辞的赞扬使得这只美丽的小孔雀兴奋不已，同时，尝过自由滋味的少年对教育的种种禁锢和束缚也更加难以忍受了。教他梵语和孟加拉语的家庭教师也发现了一个真理：行马河边易，追马喝水难。于是他就改变以往的教学方法，一边领小罗宾读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一边翻译出来；他还给小罗宾读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麦克白》，并在用孟加拉语解释诗剧后，把罗宾关到教室里，直到罗宾把每天所读的内容全部用孟加拉文诗句翻译出来为止。如今，这个译本大部分已经遗失了，从残存的部分看，已经显示出翻译者对于习惯用语和韵律的把握达到相当的水平，而这竟出自一个未满14岁的少年之手，不能不令人惊讶不已。

从喜马拉雅山归来之后，罗宾从英国普通学校转到孟加拉中学读书。此时的罗宾，对学校教育已感到无法忍受，他想尽一切方法来逃避学校生活。后来，家人便把他送到圣泽维尔中学，这已是罗宾就读的第四所学校了。可是，这里的空气同别处一样凝滞乏味，并且还固守宗教

习俗。泰戈尔后来回忆起这里的教育时称它为“机器推动的磨石式的”教育，他说：“这个教育机器是无情而有力，再加上宗教的外面形式的石磨，年轻的心就真正地被碾干了。”

但是他还记得这所学校里有一位西班牙神父，他那沉静的心灵，宽容的态度，令罗宾对他抱以深深的同情。有一次，这位神父温和地询问他是不是有些不舒服时，罗宾感到心中有一股被人关心的温暖，并且，他对此终生不忘。

1875年，14岁的罗宾终于不愿意上学了。家人们对他作了一段时间的劝说后，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于是便不再责备他。若干年以后，泰戈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我的大姐说：‘我们都希望罗宾会长大成人，他使得我们大大地失望了。’我感到我的价值在社会上显著地下降了。但是我不能下定决心去被拴在学校磨坊的无尽折磨上。这和一切生活永远分离的学校磨坊，就像是一个可恨的残酷的医院和监狱的混合物。”

摆脱学校教育的樊笼以后，罗宾并没有停止学习，他天性中爱读书和写作的才华逐渐显示出来。

1873年，他写了他自己的第一部长诗《心愿》，刊登在他们家里办的《哲学教育》杂志上，不过作品并未署作者的名字，只是由编辑加了一个小注：12岁少年的作品。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少年罗宾并没有虚度自己的光阴，这个钟情于艺术的孩子，读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他贪婪地如痴如醉地阅读所有能得到的各种文学作品：孟加拉古典文学著作，英国文学和梵文文学作品，传奇文学，民间神话故事，社会科学书籍，历史著作，自然科学读物，此外，还有反映思想和文化最新时尚的英语和孟加拉语杂志。

在罗宾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受到父亲的影响外，几个哥哥也给他以不少良好的教益。大哥德维琼德拉纳特那时正在动笔写他的传世诗作《梦游记》，并且喜爱解数学难题，钻研玄学；二哥萨特因德拉纳特在孟买的英国驻印政府中做官，他勇于破除旧俗，带着妻子一同上任，并且准许妻子的房间不用帘幕，出门不戴面纱，还让她设计好出门的衣服，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之举；五哥乔迪愣德拉纳特是罗宾少年时代主要的教育者，他在工作之余创作戏剧，弹奏钢琴，作曲唱歌，为整个家庭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他还带着自己最小的弟弟一同到孟加拉东北部的庄园里旅行，在那里他教罗宾骑术，并一起骑着大象到密林中去打猎，其间有两次捕虎的经历深深地印在罗宾的心中。罗宾长大后忆起这位敬爱的兄长时，总是满怀着感激之情。

泰戈尔家庭中的妇女中，母亲和大姐给了罗宾许多关怀和爱，不过，罗宾对几位嫂嫂怀有的感激之情，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对母亲和姐姐的那份情感。在英国求学时，罗宾住在二哥家，可以说与二嫂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与家中任何一位女性的时间都要长。不过，罗宾心中最喜爱的嫂嫂是三哥的妻子伽登帕莉。他们年龄相近，从目睹三嫂进入家门作新嫁娘，到后来常常品尝三嫂所做的美味佳肴，再加上他们对文学和艺术的共同爱好，这些都使得罗宾对三嫂十分眷恋。伽登帕莉姿容姣好，性情宽厚仁慈，而且十分优雅娴静，是她给了罗宾友善的关怀，鼓励他的天才的发展，驯化他的骄傲和散漫的缺点，消除他的孤独和羞怯，并在

他这个小弟弟身上倾注了她全部的爱。她既像他的母亲，又是他的真正的朋友。正因为如此，罗宾一直把她视为自己理想中的美好女性的化身。1875年3月8日，即罗宾还只有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与世长辞。倘若这时候没有三嫂伽登帕莉的爱抚，那么就很难想象，这种落在一个少年头上的痛苦会给他带来多么深重的不良影响。三嫂把家庭营造得舒适、优雅而又温馨，这使罗宾觉得，和三嫂在一起的那些美好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愉悦、最安宁的时光。因此当她在25岁那年不幸去世时，罗宾感到格外的悲痛。

第六章 初展诗才

罗宾德拉纳特诞生在弥漫着东方与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精神文明的家庭气氛里，在他们家位于戈温德普尔的那所住宅里，似乎永远聚集着喧闹欢快的各方来宾。人们围坐着，不停地唱歌，并且探索神学、宗教、文学、美术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还写诗诵诗，构思小说。因此，尽管他离开了未曾毕业的学校，实际上，这种自由的文化氛围更催生了他天才的花朵。

不仅如此，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几乎个个都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或艺术爱好者。他们中有学者，有音乐家、哲学家，还有诗人、作家，他们自己编演戏剧，自己编辑出版文学读物，还常召开小型的家庭音乐会。在富有天分的兄长姊妹们、爱好文艺的嫂嫂，以及其他家人的亲切呵护与鼓舞之下，原来只是远远观望客厅里的文艺表演、静静聆听别人谈笑风生的少年罗宾，此时心中的诗歌也含苞欲放。

19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正值孟加拉文学开始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时代，而泰戈尔家作为思想开明而又洋溢着艺术气息和爱国精神的大家庭，率先倡导了服装、文学、音乐、美术和戏曲上的民族精神。他们全家热爱民族传统文化，因而这个家庭很快就成为当时孟加拉文艺复兴时代的先行者和倡导者的集散之地，也成为当时社团活动和集会的中心。热心社会改革的人们常聚会在那里，商讨国家大事。

那时的印度，早已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尽管来自西方的异国风物业已传至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但是泰戈尔的家庭中却永远充满着无可动摇的民族自豪感。泰戈尔追忆说：

“我父亲在他一生的革命浮沉之中，从来没有舍弃过他对于国家的衷心热爱；这种对国家的衷心热爱在他的子孙中就形成强烈的爱国感情。……我的哥哥们总在培养孟加拉文学。”

1876 年 2 月，加尔各答一年一度的“印度节”开始了。在年会中，少年泰戈尔朗诵着自己创作的一篇凝聚着赤诚爱国情感的诗作，这首诗被刊载在以孟加拉语和英语双语出版的周刊上。

不久，14 岁的少年，又在《知识幼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叙事长诗《野花》，全诗共分 8 章，有 1600 行诗句。长诗讲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名叫卡姆拉的女孩自幼在喜马拉雅山中由父亲抚养，她在山野中嬉戏长大，也是大自然哺育的女儿。父亲的去世使女孩子成了孤儿。有一天，过路的青年遇见美丽的卡姆拉，便把她带回家里并与她成婚。然而早已倾心于群山密林的卡姆拉，并不喜欢喧嚣的世俗社会，而且还偷偷地爱上了丈夫的一位诗人朋友，并天真坦诚地倾诉了自己的爱情。可是诗人虽也暗中思恋着她，却震惊于她不见容于世俗的率真，责怪了她。即使如此，疑忌的丈夫还是杀害了年轻的诗人。卡姆拉的心碎了，她离开了丈夫和阴暗的社会，终于回到了心仪已久的喜马拉雅山区，然而，已经谙知人世间爱情的卡姆拉却再也不能在孤独的林居生活中寻回昔日的乐趣，她只有投身于山谷间奔腾的激流，舍弃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波浪就宛如母亲的臂膀，将姑娘拥抱在自己的怀中。这朵生长于山

林的纯洁美好的野花，被人采摘之后，她的生命就永远地枯萎了。

文思如泉的泰戈尔在 1877 年取得了更多的创作果实。

“印度教协会”这个年会是由泰戈尔家协助创办的。历次年会总要朗诵爱国诗篇，高唱赞美祖国的歌曲，与此同时还展览自己民族特有的手工艺品。在 1887 年的那次年会中，泰戈尔朗诵了一篇讽刺诗——《献给印度教庙会》，陈述印度全国饥荒、饿殍遍野的惨状，对比王宫中的印度新总督举办的豪华宴会，抨击了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

此外，泰戈尔还在大哥创办的《婆罗蒂》文学月刊中先后刊登了不少的作品：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女乞丐》、未最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怜悯》、自由格律的历史诗剧《罗帕尔琼德》和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还有一组摹仿古典风格的《太阳组歌》，以及其他诗歌、论文、西方文学的译文和评论等。

在这些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长诗《诗人的故事》，它与《野花》的题材相近。诗中讲述名叫雪莱的诗人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他乐于研究自然的种种奥妙，然而成长的烦恼终于来了，他希望与人交往，因为“人心一直在探索人心”。他邂逅了少女纳莉妮，并与她生活在一起。爱情的游戏并不能让雪莱长时间的沉醉，他又深感不安地离开了爱人，四处漂泊，寻求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在何方的幸福。后来，他双手空空地绝望而归，发现纳莉妮已被离愁折磨得气若游丝，雪莱恍然明白自己费尽千辛万苦寻觅的幸福正是纳莉妮的爱，可是为时已晚。少女死了，只剩下诗人沉湎于对人类与爱的思索之中。毫无疑问，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对雪莱和济慈的学习，使得泰戈尔的这部长诗带有深厚的英国浪漫派特色。而在罗宾化名帕奴辛赫写的摹仿 15 世纪风格而创作的《帕奴辛赫诗选》中，可以看出中世纪毗湿奴宗派虔诚诗对少年诗人的影响印痕。尽管泰戈尔对这个中古时代崇拜偶像的宗教并无多么深入的了解，但是在诗歌中洋溢着的那些丰富与美好的感情，再加上奔放大胆的韵律，使这本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虽然泰戈尔后来感到《诗人的故事》所表达的情感带有夸张的意味，但他却独钟情于早年作品中的这组《帕奴辛赫诗选》，并将其收入自己的作品集。

综观泰戈尔少年时代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努力学习中世纪的毗湿奴诗歌、梵文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作品的时候，也正在稚拙地探索着自己未来文学创作的风格与形式。在那个时代，文学创作并不被大家当做一种职业。为了让罗宾有再发展的机会，经父亲允许，罗宾的二哥萨特因德拉纳萨决定带罗宾一起去英国，让他在那里学习法律。

罗宾先同二哥一起前往阿赫默德巴德——他的二哥在那里任地区法官。哥哥每日工作，孤独的罗宾就在兄长的书房里，坚持通读了用英语撰写的英国文学作品和欧洲名著，并伏案为《婆罗蒂》杂志写过为数不少的评论文章。

为了让罗宾尽早熟悉西方社会生活中的英语口语，兄长又把罗宾送到一位朋友的家中，请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少女爱娜作他的英语教师。两个月的学习过程中，两人之间萌发了真挚的友好情谊。应爱娜的要求，罗宾为她取了别名“纳莉妮”，爱娜被这位英俊的少年诗人所吸引，向纯朴的罗宾暗示了自己的好感。泰戈尔在与爱娜分手后漫长的人生中，

也一直怀念着她那令人心醉的迷人形象，并且在他后来写的《我的童年》中，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我们那棵大榕树上，有几年忽然有些不知名的远方鸟儿前来做巢。等到我们刚刚认清它们翅膀的舞蹈时，它们却又飞走了。它们从远方的森林里给我们携来了一些不知名的新鲜曲调。像这样，我们在生命的旅程中，往往有从不知名的地上王宫中自愿前来的使者，使我们心胸扩大了以后，它又走到别处去。它来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我们的邀请，到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呼唤它时，却又找不到它的踪影了。它走了，却在我们生命的被单上留下了银色的绣花边，使我们的昼和夜都因此而永远格外丰富起来。”

在阿赫默德巴德的六个月飞逝而过，1878年9月22日，泰戈尔辞别了亲人与故土，和兄长萨特因德拉纳特一同乘轮船前往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国度——英国。

第七章 求学英伦

轮船启程前，罗宾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旅途中的见闻与感受更令年轻的诗人耳目一新。尽管航行的前6天他晕船十分厉害，只能无望地躺在船舱中，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许多国家的港口风情，无不给诗人以新鲜的感受。少年诗人先从意大利坐火车到巴黎，然后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伦敦。

初次到国外旅行和求学，在少年诗人的情怀中激起了种种感受。罗宾将万千思绪与感慨写入家信，这些家书连载在《婆罗蒂》杂志上，以后又以《旅欧信札》为题出版。罗宾对伦敦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觉得他从未见过那么烟雾弥漫、潮湿阴沉的城市，也从未见过那么拥挤匆忙的人群。匆匆与伦敦这座城市会面后，罗宾就来到了布赖顿，住在二哥的家中。

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由于嫂嫂善意热心的款待减轻了不少，而在将临的冬天中与6岁和5岁的侄儿侄女平生第一次看雪、喧闹嬉戏的时光中，罗宾感到日子过得很快乐。为了学习法律，罗宾进入布赖顿公立学校学习。初次见面时校长夸赞他的面容十分漂亮，那些友好的学生们常把桔子和苹果塞在这个外国少年的口袋中就跑开。这一切无不给身处异乡的罗宾带来了温馨的感受。

然而快乐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泰戈尔被送到伦敦，先是住在摄政公园对面的一家公寓里，随后又住在一个性格怪僻的家庭教师的家中。开始独立生活的泰戈尔在伦敦寒冷的冬天里感到异乡人的孤单和寂寞，他是如此描述那时的伦敦的冬景的：

“对于一个新到的异乡人来说，再没有比冬天的伦敦更冷酷的地方了。附近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不认得路。……它的面容是颧蹙的；天空是浑浊的；灯光像死人的眼睛一样没有光彩；地平线缩做一团，因为这广大友好的世界从来没有给它一个招呼的微笑。”

因此当二嫂从戴维营的道尔盖写信来让他前来与全家一起度假时，罗宾简直是快乐极了，欢天喜地的他在游玩之余，还写了一首诗《沉舟》。

从道尔盖归来，罗宾进入了伦敦大学，并且寄宿在一个待他十分友好的英国家庭——司各特教授的家中，夫妇俩和他们的三个女儿都设法款待这个印度少年，把他当做家庭中的一员，其中三女儿对罗宾的感情更为深厚。在伦敦大学读书的近3个月期间，罗宾听老师讲解精彩的英国文学课，学习之余，他还参观了英国议会。

就在一切似乎都很圆满的时候，由于二哥全家即将回国，而恪守传统的父亲决定不让罗宾一人独自留在英国，令他中断学业与兄嫂一起回来。于是1880年2月，罗宾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司各特一家人，结束了他近一年半的异国生活，回到了故土印度。在《我的童年》中，泰戈尔这样总结了她的海外求学生涯：

“我在大学只念了三个月，我对外国的知识差不多全是靠同人们的接触得来的。……这却不是学校式的读书。这是一面了解文学一面又接触了人心。我去了外国，却并没有成为律师。”

在英吉利的时候，罗宾就开始写作一部长篇抒情诗剧《破碎的心》，直到回家以后才完成。18岁的诗人将它献给自己的三嫂伽登帕莉。这部

作品的内容与他以前的两首故事诗《野花》、《诗人的故事》很相似，然而那优美流畅的诗句却依然闪现着天才的光辉，为他在孟加拉诗坛赢得了声誉。

受着胸中澎湃诗情的驱使，罗宾又在 1881 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音乐剧《瓦尔米基天才》，剧情是依据古代印度第一部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瓦尔米基的传说展开的：瓦尔米基原本是个强盗，同伙抓来了一个女孩子想祭祀女神，他被女孩的哀号声所感动把她救了出来。原来这个女孩是艺术女神的化身，为了唤起他的“人性”而来，女神最终赋予了瓦尔米基歌唱的才能。这部剧作的意义在于它音乐上的创新，罗宾尝试着把印度的古典音乐、孟加拉的民歌和西方歌剧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并且获得了成功。罗宾在演出中曾亲自扮演过瓦尔米基，他的侄女则扮作剧中少女。

完成了《瓦尔米基》的创作之后，罗宾还写过一部也是取材于《罗摩衍那》的音乐剧——《不祥的狩猎》。日后回忆起当时写作这两部音乐剧的情景时，他觉得当时火一般的写作热情是以后再也没有感受到的。

罗宾一生写了多少诗作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的作品实在是浩如烟海。罗宾第一次尝试作诗是在 1868 年，那时他还不满 7 岁。但对于他早年的诗歌创作，泰戈尔认为那些在《黄昏之歌》之前的作品都应当弃之不算。

《黄昏之歌》写成于 1882 年。那年，乔迪楞德拉纳特和他的妻子离开了故乡去作长途旅行。五哥五嫂的远行使罗宾感到缺少了精神上的知音，沮丧而孤独的他也开始了第一次面对自我，在独自反省、自顾内心的这段日子里，他日夜奋笔疾书，写成了诗集《黄昏之歌》。

诗集的开篇中，罗宾将傍晚想象成一位美丽而神秘的女子，她若隐若现地弯下腰，用她那墨玉般秀美的长辫去触摸大地，诗人对她怀有亲近感，痴痴地听她歌唱，却不懂得歌词也不懂那旋律：

我精神上承受着痛苦的重负，
来吧，夜幕，轻轻地向我走来，
近一点，再近一点——我寂寞的心
渴望把自己深埋在你的怀抱里。

诗集中回荡着感伤哀婉的感情。应当说，当时罗宾正在度过一个把“甜蜜的悲哀”作为主要创作源泉的时期，这也是许多著名的诗人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这部作品得到了当时孟加拉最有名的小说家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赞赏，他把罗宾称作印度文学太空中正在升起的太阳。关于这部诗集，诗人后来曾这样说：

“在《黄昏之歌》中寻求表现的忧愁与痛苦，在我存在的深处生根。就像一个人昏睡中的意识，和梦魇搏斗想要挣扎醒来一样，那个沉陷的内心的我也是这样地挣扎着，要从它的错综复杂中解脱到空旷处来。”

尽管有许多人称赞泰戈尔写诗的才华，然而在当时的世俗的社会看来，他只是一个中学没有毕业，没有学位与职业的凡夫俗子。罗宾为世

人的观点感到苦闷与失落，于是 1881 年 4 月，他与自己的一个侄子一同启程赴英国，希望再度学习。可是他的这个年岁稍长的侄儿新婚不久，中途又决定要回家去，因此罗宾第二次英国之旅未能实现。罗宾先前往西部的喜马拉雅山，向父亲说明了这个情况，之后便来到了五哥一家位于恒河畔的别墅，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在这个名叫“莫兰花园”的风景宜人的地方，罗宾写下了他第一部完整的长篇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王后市场》，尽管小说的创作形式并无多少值得赞赏之处，但其中许多情节和人物，成了他日后剧本创作的雏形。

与此同时，罗宾也在河畔写了一些散文，后来当他与兄嫂一起返回加尔各答苏达街的另一处房子时，他仍然继续着这一创作，直到有一天他有了一些彻悟：

“早晨我偶然站在凉台上往那边看，太阳正从这些树上的密叶上升起。在我不停地凝望中，忽然间似乎有一层帘子从我眼上落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世界沐浴在奇妙的光辉中，美和欢乐的浪潮，在周围涌溢着。这光辉立刻穿透积压在我心上的重重叠叠的愁闷和萧索，以宇宙的光明注满了我的心。”

持续了 4 天的这种感受令罗宾笔底奔涌出一首名为《瀑布的觉醒》的诗作，诗中表达了他感到生命醒来以后的无比欣悦。诗篇的结尾是这样的：

谁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心灵觉醒了，
我似乎听见遥远的大海的歌声，
啊，我的四周啊，怎样的一所暗牢！
不断地，不断地撞击呀！
啊！今天鸟雀欢唱，
阳光照进洞窟来了！

在历经长时期思想与感情倍受压抑的痛苦阶段之后，罗宾第一次获得了深刻的精神体验。随后他又写了几首诗，集成一册《晨歌》于 1883 年出版。其中《永恒的生命》与《永恒的死亡》两篇阐明了他所获得的新的思想——发展就是生活，生活不断运动和更新，死亡也是为了帮助生命获得重现与再生。这部诗集标志着年轻诗人开始走向成熟。

自从《晨歌集》问世以后，诗歌、散文、剧本和歌曲新作在罗宾笔下如瀑布般倾泻而出。而且，他还在五哥的支持下发起了一次筹建孟加拉文学学院的活动，但这件事在中途便不幸夭折了。

1883 年 4 月 8 日，罗宾又随同家人移居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加勒瓦尔港，他的二哥被派驻在这里担任法官。

在这弥漫着檀香和豆蔻香气的地方，终日面对椰树和大海，生活在自己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泰戈尔胸中的诗情也涨潮了。他在这里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诗剧——《大自然的报复》，并在第二年付梓。

《大自然的报复》一剧的主人公是一个隐居于山洞中的苦修多年的修道士，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摒绝了一切世俗杂念，但当他遇到一名父母双亡、孤立无援的孤女时，怜悯与爱恋却涌上心头，他惊慌失措地跑开

了。然而爱又使他最终放弃了修道士的苦行，重返尘世，并四处寻找这可怜的孤女。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姑娘去世的消息。修道士那时才明白，原来死亡可以使人“在低微中见到伟大，在形象的有限中见到了无限，灵魂在爱中找到了永恒的解脱”。这一观点是泰戈尔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重视人的本性与情感的反响。

罗宾自己亦很重视这部作品，他说：

“《大自然的报复》可以看作是我以后的全部文学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所有作品都详述的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

这年秋天，泰戈尔全家人返回了加尔各答，未来的艺术家仍在不停地磨砺自己：凭窗凝望着工人住宅区里的日常生活和那里玩耍的孩子们，他写下了许多诗篇，这些充满动人诗情的作品最后结集为《画与歌》。

泰戈尔自己觉得，这部《画与歌》是《晨歌》与两年后的另一本诗集《刚与柔》之间的过渡。因为以前的他，提笔创作之际总是主要受自己主观情感的驱使，而如今外面世界的生活走进了他的创作视野。在吟咏诗歌的同时，泰戈尔还不懈地继续写作散文，以表达自己对文学和哲学的思索，并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议论和抨击，这些文章后来集为《评论》。

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尽情挥洒诗才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父亲和家里的人们就为泰戈尔找到了新娘。

第八章 死之痛楚与生之欢乐

1883年，22岁的泰戈尔听从家人之命成婚了，他的婚姻是按照传统的印度社会习俗而缔结的。新娘由家中的两位嫂嫂帮助选定，她的父亲在泰戈尔家的不动产管理公司供职，女孩的门第比泰戈尔家低。当时的印度依然流行着童婚的风俗，这个幼小的新娘那时才11岁，并无漂亮的容貌，亦只读过一年的孟加拉课程，不识多少字。热情浪漫、年轻英俊的诗人最后接受了这样的一门亲事，不仅表明了他归根结蒂是个孝顺的孩子，也证实了他能够安于平凡的生活。婚后，罗宾把妻子原来旧式的名字改为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默勒纳利妮。

大约在罗宾结婚一年之后，他的父亲让他担当了自己早年创立的宗教改革组织——“梵社”的秘书，以锻炼他的工作才能。罗宾在梵社推行了一种在那时可谓非常大的改革：他请来非婆罗门的传道士在为婆罗门所独霸的讲坛上讲道。这一勇敢无畏的举动，正是他内心深处坚决反对在人与人之间人为地制造隔阂这种观念的表现，而且这也预示了他在将来面临的社会及政治问题上必会选择人道和正义的道路。

一生从未对宗教产生多少兴趣和研究热望的罗宾，默默地遵从着父亲的嘱托，以严肃的态度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并写出了许多文章来宣传父亲的宗教信仰。

然而世间的事总是难于预料，1884年4月，成婚不久的罗宾一生中亲密的朋友，宛如慈母般的嫂子伽登帕莉不知为何悄然自尽了，年仅25岁。这是罗宾第一次感受到了死神的可怕力量，也是他第一次深刻体味到丧失亲人的巨大悲痛。这不幸的事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

若干年前，当母亲辞世之际，罗宾还十分年幼，并未懂得生离死别的无比悲哀。而且也正是在那时，伽登帕莉，他的三嫂，给了他母亲般的关心与爱。从那时起，以后的16年岁月里，年龄只是稍长些的三嫂成了他的庇护人，她鼓励罗宾写作，是罗宾知心的朋友，也是罗宾心中最圣洁、最珍重的女性。嫂嫂的骤然谢世令罗宾五内俱焚，而没过几个星期，在罗宾童年时期曾照管他学习的三哥海明德拉纳特又被死神带走了。再度丧失亲人的无法言传的悲哀令他心痛欲绝。即便是多年以后，罗宾仍然这样充满伤感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还没有想过，在生活的悲观的完整行列中会出现裂缝。因此我看不见未来的东西，我所接受的目前的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了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但那个确实存在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与我的生活与身心有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我到底怎样才能使这种存在与消失相协调呢？

“当然时间不停地过去，这个豁口对我显露的可怖的黑暗却继续日夜吸引着我。我不时回来站在那里向它凝视，想知道在那离去的地方还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空虚：不存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而虚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想在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地方去寻找什么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幼小植物踮着脚摸索着伸向光明一样，当死神突然之间把否定的黑暗投在我心灵的周围时，我也尽力要伸向肯定的光明。在黑暗阻止我们寻找道路走出黑暗时，有哪种悲痛能与之相比呢？”

在独对空壁、品尝凄凉的那些日子里，泰戈尔的心中也在持续不断地思索和探究着无法预知的生命。

正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段黑暗的日子需要自己去单独面对、独自承受一样，死亡的阴云掠过了罗宾的心灵，给他的情感上刻下了无比酸楚悲伤的记忆，然而过去毕竟过去了，生命毕竟还需要向前。当悲痛的记忆被时间冲洗得淡而又淡之后，痛定思痛的罗宾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他惊奇地发现，亲人永远离他而去的事实渐渐远去以后，自己仿佛有了某种领悟：

“到处弥漫的人世间生存的压力以生死的均衡使自己保持平衡，因此才没有把我们压垮。不可反抗的生命力的可怕的重量的重量不是我们必须忍受的——这一真理那天像奇妙的上天的启示那样突然在我心里出现。

“由于对人世生活的吸引力的淡漠，自然美对我有了更深的意义。死神给了我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使我得以理解世界在它极美时的情况，因此当我看见以死神为背景的宇宙之画时，我感到了它的魅力。

“在夜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在凉台上摸索着，像一个瞎子似的想在死神的黑色石门上找到一个图案或记号。当曙光落在我那张挂帐子的床上使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我觉得四周的云雾散开了：雾霭消失，山河林木的景色历历在目，于是露水湿润的人世生活的图画在我面前展开，仿佛变成新的，十分美丽。”

痛失亲人的经历并未使诗人消沉下去，反而使罗宾的心灵锻炼得更更为坚强有力，他坚持不懈地写作，作品如泉涌般源源不绝。他以达观的态度去面对亲人的死亡，并没有在作品中流露出任何病态的悲哀情绪。罗宾写了一些关于历史和宗教题材的论文。在阐明印度文化方面，他在当时的辩论中认真地站在了勇敢接受新事物、新进步的上进者行列中，针对那些一味赞颂古代的复古主义者们的论调发表了讽刺性的文章，申述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泰戈尔的一生中，每逢遇到新与旧的斗争，他总是情不自禁地采取犹豫不定的调和态度，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和天性中的人道主义因素使他对双方的所思所想都能认识和理解。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那就是每当他觉察到人道与正义被弃之不顾时，他就会勇敢地站出来，加入到斗争的行列里。

两位亲人去世以后的几年时光中，罗宾除了给家里已创办的《婆罗蒂》文学杂志写稿之外，还常在家中又增办的《儿童》月刊中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泰戈尔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起步的。尽管各方面的责任繁多，泰戈尔依然不懈地坚持自己的文学笔耕。1884年他写了散文剧本《诺丽妮》，次年完成短篇历史小说《王冠》，而取材于传说的小说《贤王》和音乐喜剧《幻影的游戏》则写成于1887年。相比较而言，在这几年中所写成的作品里，1886年的诗集《刚与柔》更能体现他那诗人的情感。

《刚与柔》这部诗集收集了多种体裁的诗作，其中有儿童诗歌、宗教圣歌、情歌和一些翻译的外国诗歌。诗集主要抒发了对生活的迷恋，以及生活和生命的欢乐，也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炽热的赤子之爱。在《刚与柔》开篇第一首诗中，诗人吐露了这样的情感：

我不想在这可爱的世界上死去，
我留恋那灿烂的阳光，盛开的鲜花，
我要像一个人一样在人群中生活。
人世间的生活像游戏一样纷繁多彩，
生活中充满了悲欢离合，喜笑怒骂！
啊！让我歌唱人们心中的悲哀和欢乐，
让那优美动听的曲调千秋传播。

是啊，正是因为经历了深刻的痛苦之后，罗宾才更加珍惜生命与爱的欢乐。

于是，在《刚与柔》这部诗集中，罗宾就否定了人生的禁欲主义观点。诗人热情地表达着他不仅热爱这树繁叶茂的美好自然，也珍惜世界赋予他的种种生活体验。可以说在这本诗集里，诗人罗宾那种追求欢乐的青春热情，已经由往日对自然的爱过渡到对女性美的爱。《刚与柔》中有几首诗的描绘相当坦率，在当时社会习俗尚十分保守的环境里已经算是异常大胆之作。这一点从有些诗篇的题目里就可以体味得到，比如《胳膊》、《吻》、《身体》、《没有衣饰的美女》和《乳房》等。那个时代的不少持保守态度的人几乎被这些诗篇吓得晕死过去。但是，公正地说，罗宾所写的这些诗歌的内容并无一点色情的味道，他在诗中只是将女性的身体当做宇宙间美的原理的最完美的表现，并为之讴歌。

罗宾在追忆往事时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他自己对这些诗作在他的世界观发生转变时所起作用的自我评价：

“人往往站在人生的宫殿之外，从大路上望了望里面燃烧着的灯火而又回头走开了！他听见了笛子的声音，从宫殿里传出的贝罗维乐曲，飘进了他的耳里；可是，他没有进去……《刚与柔》就是站在人生圣殿大门外的人类唱的歌——这支歌不仅要求允许他们进入那神秘的宫殿，而且还要求在其中占有一席荣誉的座位。”

罗宾在这些诗集中的另外一些诗歌中还告诫人们不应当迷恋爱情的生理基础。例如在《囚徒》这首诗中，他将心爱的人的手臂喻作监禁灵魂的枷锁，而《纯粹的爱》一诗则又将纵欲视做服用了慢性毒药而造成的毫无痛苦的死亡。很显然，诗人在体验到感官的欢愉之时，亦表现出渴望精神得以寄托的心情，他热切渴望将这两个层面融合为深沉而无私的完美之爱。诗人罗宾的灵魂对爱情的美好思索与追寻是永远无止无息的。因此，在《刚与柔》最后一首诗《最后的话》中，他依然感到尚有不少的思绪和情怀未能表达：我模糊地感到我心中有许多思想渴望表述，

而且那最后的一句话将能够概括我想要说的一切，等到这句话说出口之后我将会永远地沉默了，决不会再拨动我琵琶上的琴弦。

我相信在这最后的一句话里我终于会得到满足，并且可以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内心世界。

情思满怀的诗人此刻刚刚开始吟唱爱情，在他以后的生命里，爱情也一直是他歌咏的重要主题之一，而且这对爱的歌颂不仅在他生命里延续着，也伸展到了每一位仰慕与热爱泰戈尔诗歌的读者的心里。

第九章 天生的小说家

1890 年底，父亲让罗宾接替大哥去照管祖传的庄园产业。父亲认为，作为大家庭中的儿子，罗宾应当承担他应有的责任。

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起初，罗宾并不非常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后来他才发现庄园生活不仅为他提供了观察孟加拉农村生活的机会，还使他变换了一种生活节奏，并且让他得到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

泰戈尔家的庄园共有三处。罗宾负责管理的是位于帕德玛河边的西来达。因为那里的田产分布在多处，所以，罗宾多数时间居住在船上，沿帕德玛河四处漫游。在孟加拉乡村的中心地带所度过的这 7 年的时光，既增强了诗人对自己终生热爱的大自然的亲近之情，又使他饱览了祖国农村水乡秀丽旖旎的风光。充满诗情的他，无限喜悦地观赏到了大自然中的广阔空间与奔流不息的河水。河上生活的持续感和流动性，使他能够摆脱一切束缚和牵制，让自己的心也如同河上漂流的船儿似的，自由地去思索，集中精力去创作。

而且尤为重要的，激发出泰戈尔创作热情的是普通农民的乡村生活，耳闻目睹他们艰辛的日常劳作，在社会习俗与外国统治压抑之下的艰难境遇与他们执着的斗争，罗宾才感到自己真正了解了人民的生活。罗宾还搜集了不少民歌民谣，并且对民间口头创作也情有独钟。

罗宾热爱这些勤奋朴实的人们，并且深情地关心着他们的生活。为着帮助农民们，他鼓励农民自立，帮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树立信心。起先，罗宾在自己家的领地里实施一个开发计划，后来又在“和平之乡”附近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场所。他利用自己有限的财力与物力，进行各种有益于农民的改革：譬如建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修筑道路和水利工程以方便生产、生活，此外还设置自治组织，并严禁高利贷。

西来达的庄园生活，使罗宾的创作激情喷发而出，他的文思宛如水流倾泻而下：从 1894 年到 1900 年的 7 年中，他创作了几个剧本、为数不少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散文；此外，他还出版了几部比较重要的诗集。

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泰戈尔并无前人可资借鉴，因此可以说他的创作完全是他自己努力发掘传统、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不能不承认，短篇小说是泰戈尔对印度现代文学的一项巨大贡献。

泰戈尔大部分的短篇小说是他在帕德玛河上四处巡视父亲的庄园时所写就的。在乡村期间，他遇到了一些成年人和幼稚的孩童们，正是这些心地单纯善良的普通人，为他的心灵带去无限的感动，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泰戈尔曾在当时的一封信中，如此表述自己那时的情怀：

“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写短篇小说，那我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愉快。而假如写得卓有成效，小说也能使为数不少的读者获得快感。愉快的主要原因是，我的人物成了我的伴侣，成了我那颗孤独之心的朋友。在阴霾的雨天里我关在屋内，他们和我一起解闷消愁；在阳光普照的日子里，他们与我一块在帕德玛河畔徜徉。”

丰富缤纷的生活画卷触动了泰戈尔的灵感之源，使他创作出不少堪

称一流水准的短篇小说佳作。比如《邮政局长》就是根据作者所闻所感构思出来的：一个受过教育的、城市里长大的青年，被安排在孟加拉一个疟疾猖獗的小村庄里担任邮政局长，小村子里名叫罗丹的孤女帮他做饭。漫漫的夏季长夜里，为了打发时光，他常唤这个孤女做伴，给他讲自己心神向往的大城市的快乐生活，还教她读书写字。孤女罗丹在心底里深切地爱上了年轻的主人，并在邮政局长身患疟疾时昼夜服侍，使他恢复了健康。然而，青年并未领会到孤女的情感，他病刚痊愈就准备辞职返回加尔各答。可怜的孤女请他带走自己，他没有同意，想给她一些钱，孤女罗丹痛苦地拒绝了，然后就跑得无影无踪。单纯的女孩子以为她的爱情应当有所回报，可是这个美丽的梦想却被变幻莫测的生活无情地碾碎了。

泰戈尔在他的一生里始终关注着妇女的命运。他在两次旅英期间都曾撰文宣传西方女性自尊和独立的生活信念，并且鼓励印度妇女也来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走向自强的新生。而且，在写于1878年的一篇随笔中，诗人还曾充满智慧地巧妙反驳了当时传统习俗轻视妇女的倾向。那些人认为妇女的作用等于“0”，而罗宾则机智地作了三个位置的移动，他说，将“0”放在代表男人的“1”字的后面，男人就有了十倍于自身的力量；而倘若把“0”置于相反的位置，“1”就被女人变作了微乎其微，势力单薄的“0.1”。

在那时的印度，妇女仍然没能得到解放，她们的生活和遭遇往往十分不幸。《河边的台阶》里的女主人公古苏姆就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而那静静地躺在河畔的石级便成为她苦难一生的忠实见证人。7岁时，天真烂漫的古苏姆被迫出嫁，一年之中仅和丈夫见过一两次面的她，随后就做了寡妇。回到故乡10年之后，她渐渐出落成如花般的少女。这时村中来了一位苦行僧，有人议论他酷似古苏姆那个出走了的夫君。古苏姆每日谛听苦行僧的讲道，然而有一段时间她一直未在庙中露面。后来苦行僧派人来找她，在再三询问之下，古苏姆承认自己爱上了苦行僧。僧人茫然若失，恳求古苏姆将他忘记，然后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村落。可怜的古苏姆选择了投水：在月夜中她缓缓走下河边的石阶，静立之后就举身直赴清流，将她从童年起就深爱的河水作为收容她苦难生命的最后一处归宿。

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宽广博大的胸怀里，一直藏有对孟加拉妇女的无限同情与关心。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那些寂然无声地忍受着社会与命运捉弄的平凡的女性身上，也潜藏着强烈的反抗的个性。

《摩诃摩耶》就是这样一则故事。青春美貌的少女摩诃摩耶因为偷偷与情人相会被哥哥察觉，竟遭受到灭绝人性的处罚：她被无情的哥哥带到火葬场，即刻与一个濒死的人结婚，婚礼的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还要与死去的人一同火葬。似乎上天亦有恻隐之心，葬礼中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刮灭了火堆，摩诃摩耶逃得了一条生命，然而脸上却永远地留下了火烧的伤痕。她逃到原来的情人家中，请他收留自己一起生活，只是要那男子发誓永远不揭开她的面纱。情人许下了诺言之后，摩诃摩耶便住在了那里。好像命运故意作弄可怜的少女，情人渴望见到面纱后的摩诃摩耶，于是趁一个月明的夜晚，悄悄来到少女的房间，掀起了她的面

纱，看到那可怕的烧伤。惊醒了摩诃摩耶不顾情人请求宽恕的忏悔，毅然一言不发地永远离开了情人的住所，再也没有回来。孤立无援、在情人面前也不能摘去面纱的摩诃摩耶就这样决然地出走了，从此给她的情人留下了终生痛苦的追忆，恰似一道长长的伤疤。

泰戈尔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令人同情的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形象，同时他也描写了不少善良、忍辱负重的农民的形象。罗宾满怀深沉的人道情感和对社会残忍与不义的激愤，以敏锐的艺术感受，观察和描绘他身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性格与命运。诗人为那受挫的理想和未及开花就先凋谢的青春而悲悯，也对人间的自私、冷酷和人为的不平等加以藐视和讽刺。罗宾心中充盈着对贫苦人们深刻的眷恋和无私的爱，正是在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感驱使之下创作出这么多不朽的杰作。正如一位中国现代诗人在诗作中所写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在短篇小说中，罗宾那诗人的天才亦时时透露出来：深入细致的情感与心理描写，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的情节结构，以及带有浓郁抒情意味的景物描绘，这些都使得他的作品像一首首打动人心的美妙的抒情诗章。

第十章 神秘的“金帆船”

泰戈尔的心中，永远奔涌着诗的激情，他是个天生的歌手。他热爱写诗，视诗若生命。他曾充满感情地写道：我写一首诗的乐趣超过写好几篇散文，如果我能每天写一首诗，那该有多好。

他努力地坚持着这样去做，不息地创作着。因此，他的辛苦凝聚成一首首心血之作。这位伟大的诗人仅在 1894 年到 1900 年就出版了四本诗集，它们是——《金帆船》《微思集》《缤纷集》和《收获集》。

泰戈尔作品的那些细心的研究者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当泰戈尔走近现实生活，关心农民的苦难时，他头脑之中的神秘主义思想也开始“萌发”了。诗人在 1894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种对于自己内心深处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的知觉，使我不知所措。对于这种知觉我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我不知它会在什么地方征服我，或我在什么地方征服它。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我不明白，同时也没有人询问我，什么东西在我的心中汹涌，什么东西在我的血管中流动，什么东西在我的头脑里悸动。真不知道有多少事瞒着我而发生，我既无法见到它，也无法同它商量，然而我带着它像创造者一样耷拉着脑袋冥思苦想站立着，好像我就是我。……我就像一架里面装着复杂的金属弦和零件的活钢琴，什么时候由谁来演奏？为什么？我一概无知。然而我知道，此刻在演奏什么？表达的是喜悦或悲戚？风格是刚健或轻柔？乐声是高亢或低沉？乐曲协调或不协调？我都了如指掌……但是且慢，难道我真得了解这一切吗？”

这是一个敏感的诗人面对缪斯的真实表白：诗人在冥冥之中不知灵感何时袭来，亦不明了自己的创作是怎样一个过程。泰戈尔真诚地希望能够确切地了解自己内心深处是怎样被触动，自己笔下的诗行怎样像被无形的手操纵着，似小河般涓涓流淌出来？他渴求认知这神秘的诗神。

不妨这样去看：世界上每一个曾像罗宾那样真诚地探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感受与感情，而又真诚表达自己思绪的诗人，都曾有过同样的困惑。正如每一个敏思善诘的真正思想着的人，也都会捫心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这些永恒的人生困惑一样：有时苦思冥想、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而灵感却拒不出现；而有时，不知从何处突然降临的诗神却神奇地差遣着他头脑中突如其来的感受与言辞，令他诗情不绝，妙笔生花。罗宾真诚地思索着，也在真实地剖白着自己。四部诗集中的第一部《金帆船》就是这样神秘而真实地诞生了。

庄稼的收割已经结束，农夫在河边等待着，天空密布着汹涌的层层阴云，然而那河面上却没有一条渡船。乌云在天空中轰响着，雨点也开始落下，忧郁的农民在田埂上俯视着茫茫河水。这时，他茫然发现，远处，从雨幕中一艘金色的帆船缓缓驶来，上面模模糊糊像有位船夫在掌舵。粮食被装进了船舱，“还有粮食吗？”神秘的船夫问。

“没有了，田野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我所收获的粮食也统统装上了船，现在请让我也上船吧。”农民回答。

然而船儿太小了，不能使农夫立足。农夫只得留下来，在荒凉河岸边孤独地坐着，而那载着他辛苦劳动与血汗的收成却被金帆船运走了。那船行驶着，行驶着，没有人知道它将要航向何方。

这就是《金帆船》诗集中的第一首诗，诗的标题与诗的题目相同，其中还有为数不少的诗句成了人们最爱引用的泰戈尔的名句。

《金帆船》这首诗作的中心寓意是值得人们认真思索的，它包含着深厚的含义。那愁云凝集的天空、茫茫奔涌的河流、丰收的庄稼被带往不可知的去处，而辛苦的农夫却被孤单地留下来，惟有目送自己的丰收成果远去。所有这些形象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画，诉说着人生的变幻莫测与神秘。

一段时间内，孟加拉文学界曾经围绕着这首诗的真实含义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金帆船”代表什么，它的舵手是谁？诗人自己曾作过解释：他以为船象征着人生，它装载着我们的收获，在时间这条长河中行驶，将我们遥遥地抛在后面。有的学者则进一步阐释说，这首诗说明的是这样一个真理——人类想减轻重负，渡往彼岸世界的渴望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象。金帆船就是生命本身的象征体，它在时间的河流里朝着未知的目的漂流，在生命这座金色圣殿里，人们献上自己的一切，也想献上自己，然而他们的财产已经十分沉重，等到他想摆脱自己这个沉重的包袱之时，生命已片刻都不肯停留地从他身边驶过，并且永不回头。

在开篇的第一首诗中，我们即目睹了金帆船徐徐驶来，运走所有刚刚收获完毕的庄稼之后，将农夫（或者可以说是诗人）孤零零地留在岸边。而“金帆船”的意象又在诗集的最后一首诗中重现了。卷末的那首诗题名为《漫无目的的旅行》，此刻的诗人已被接到船上，并且找到了一席之地，而船舵旁边站着一个有些面熟的人：那就是使他创造出诗歌的女神，他的缪斯，亦是他理想的梦中情人，他的守护女神。诗人惊奇地注视着这位似曾相识而又并不真正相识的仙女，不明白她将船儿驶向何方。于是，他一次次地问那操船而行的仙女：

有多远？你还要把我送多远，
呵，可爱的女神，
告诉我，它将在什么地方靠岸——
这艘金色的船？

然而，这仙女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面带着微笑遥指着那远方的地平线，那里，夕阳正在沉落：

默默地你用手指着
那汹涌澎湃的海面。
在天空的一角
土星渐渐逝去。
你要我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对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萌发于这一时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情感与思想，印度著名的泰戈尔研究专家克里希耶·克里巴拉尼曾这样加以评论：

“这种神秘主义既不是他有意识接受一种信条或一种哲学，也不是

他对自己感触颇深的迷乱现实的一种规避。罗宾从来不是哲学家，他觉得再没有比他那种用以说明一切事物的闭塞的公式化思想信条，更加令人厌恶和作茧自缚了。对于一成不变的教条，他更是毫无敬意可言。他如此酷爱大地，酷爱生活，让他离开它们是永远不可能的，生活的奥秘永远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所遭受的痛苦，目睹的残酷与污浊，没有使他厌世；相反，他更加热爱人类生活。‘我们的善恶观念是何等造作与虚假啊！’他在1894年3月2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感到，最优秀的宗教应同情一切生物，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

“罗宾的神秘主义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对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亲近感，是他对那条把一切有生物联结在一起，同时又把生物与无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联结在一起的链环的先知先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神秘的知觉从他儿童时代起就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灵魂之中。这种神秘主义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动荡不安。在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神秘主义在他的诗中‘萌发’，它仅仅意味着，他对自己生命中这条链环的探索，他对自己天才与命运的创造力量的追求，他对存在于他自己人格深处同时又超乎其外的最高人格的探寻变得更加有意识了。”

从诗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如果说在《黄昏之歌》中，泰戈尔还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之中，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词强说愁”的成长必经阶段，那么《晨歌集》中诗人则已经告别那种过于执着于自己小天地中悲欢哀喜的感伤，开始以崭新的乐观态度来对待人生了。到了《金帆船》这一诗集的创作时期，已入而立之年的罗宾已经学会了用平和安详的心去思考人类自身、自然界、宇宙和社会。在那纷纭多彩的种种现象背面，他执拗地追寻着、严肃而又充满理性地思考着一种真实的力量。由于人类根本不可能完全了解或预知世间与宇宙的一切自然或精神法则，于是在诗人泰戈尔的心中，渴望了解一切的心灵的探求，便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中开始掺入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因素。

实际上，把这个“神秘主义”概念加在泰戈尔身上，未免过于沉重了。必须承认，每个个体的人都会觉得，在自己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星球及广漠的宇宙里，甚至人类自身之中都有着不可以明确解答的千古之谜，而诗人那敏感、多思的心无疑会捕捉到这一点。诗人泰戈尔只不过是诗的形式真实地道出了心中的疑惑，这表明了人类的求知欲望在诗人罗宾身上，是以灵魂求索经历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所以，倘若简单地用“神秘主义”一言以蔽之，便会有忽略诗人心灵历程的真实感的缺憾和过于主观臆断之嫌。

第十一章 诗剧《齐德拉》

泰戈尔不仅是写作短篇小说的圣手、天才的诗人，他还是印度文学史上出类拔萃的剧作家和散文大师。

除了短篇小说和诗歌之外，罗宾在这一时期，在戏剧上亦硕果累累。他写作的那些充满幽默之感的社会讽刺剧中，《老人的手稿》和《独身汉的俱乐部》这两部作品，至今在孟加拉舞台上仍长演不衰。

以无韵诗形式写作的抒情剧《齐德拉》是罗宾以这种形式创作的最后一部戏剧。该剧出版于1892年，是罗宾的名剧之一。剧中，作者以浓郁的诗情画意和剧情所展示的真理给与了人们独特的美感。这部戏剧曾被译介到西方，并以话剧、舞剧形式出现在欧洲舞台上。

《齐德拉》是根据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情节演绎出来的：曼尼普尔王的女儿齐德拉从小被当做男孩子抚养长大，她会武艺，具有一个男子的力量和女子的心肠，但她平淡、粗犷，缺乏女孩子特有的魅力。一天，公主扮做猎人在森林中猎鹿，遇见了传闻中四处漫游的英雄阿顺那。齐德拉爱上了阿顺那，却在表白时遭到拒绝。公主于是恳请爱神赋予她一天的美貌，并且最终以苦行感动了爱神和春神。两位女神决心满足齐德拉的愿望，赐给了她完美的容貌——不是一天，而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公主凭借神力变成美伦美奂的佳人，阿顺那见到她之后，真是一见倾心，遂忘却了自己独身的誓言，向她求爱。接下来的几个月时光，两个情人忘情地享受着爱情带来的欢乐，陶醉在两人世界里。然而齐德拉并未感到完美的幸福，她觉得自己以借来的美来征服爱恋的人是那么的虚伪和令人羞愧，她也深深地感到阿顺那迷恋的只是自己的身体，如今自己的身体成了自己的情敌。内心痛苦而又矛盾的齐德拉请求爱神收回她的美貌。爱神宽慰她说：等到阿顺那厌倦了肉体享乐之后，就会在她身上发现真正的女性美。

果然，阿顺那慢慢开始悟出自己心灵的空虚与失落。作为勇士和英雄的他再次渴望行动和战斗的生活，也渴望见到森林居民们讲述的那兼有男人勇敢与女人柔情的公主齐德拉，盼望得到天长地久的精神之爱。他请求齐德拉让他与公主相见，并请求看到齐德拉的真实容貌。此时，齐德拉乞求神收回了她伪装的美貌，出现在阿顺那面前的是那个勇武的公主，她说：

“我就是齐德拉，曼尼普尔的公主——我既不是情人所顶礼膜拜的女神，又不是为了取悦于男子而任人摆布的那种女子。如果你在危险的道路上，愿把我作为你的妻室，留在你身边；如果你让我分担你生活中实践的重担，那时你才会真正了解我。”

阿顺那发觉面前朴素的女子就是齐德拉时，他欢呼着：“爱人，我的生命圆满了。”

齐德拉与阿顺那最终获得了圆满的爱情。

《齐德拉》这个作品是罗宾所有创作中哲理性比较强的一部，剧情展示出什么是美、什么是永久的爱这样的问题。而且作为诗人，泰戈尔剧中的对白亦充满着诗的独特韵味。譬如，当阿顺那请求见到自己情人的真实容貌时，他这样对齐德拉说道：

“我似乎永远不能正确地了解你。你对于我就像是一位隐藏在金像里的女神。我摸不到你，我不能以报酬来答谢你无价的礼物。这样，我的爱是不完美的。有时候在你的忧愁眼光的谜一般的深处，在你嘲笑着本身的含义的游戏言辞里，我得到一瞥的感受：就是你要努力冲破你那疲倦优美的躯体，穿过微笑的空幻的面纱，在痛苦的火的洗礼中显现。幻像是真理的最初的面貌，她在伪装下走向她的情人。但是时候到了，她就丢开装饰和面纱，穿着朴素的庄严的衣服站了起来。我探索那个最终的‘你’，那个赤裸的单纯的真理。”

罗宾通过这段话，揭示出促使生命永恒流动的，是追寻真、善、美的生活并且永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动力。他以《齐德拉》提出一种圆满完美的爱的理想：这种理想承受感官的享受，但指明生命中的精神之爱与精神之美才会占有最重要和最长久的地位。

在《齐德拉》这部自由诗体的抒情剧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892年，泰戈尔的第一部以散文体写作的社会喜剧《第一个错误》完成了。剧本描写了三个青年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夫人之间想入非非的爱情幻想和婚姻危机。剧中嘲弄了印度教顽固的保守自负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浪漫幻想，其中闪烁着机智而又风趣的火花，真可以与同时期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喜剧相媲美。

也是在这段时期里，泰戈尔又将《摩诃婆罗多》这部古代史诗中的一件简单的轶事，写成了一个展示忠于职守和知识与渴望爱情之间心理冲突的剧本，这就是1894年，罗宾第一次采用有韵律双行抒情诗体创作的那个独幕抒情剧——《临别的诅咒》。剧本的情节是围绕神魔之战展开的：巨人族的领袖修库拉知道不死的秘方，众神为了偷学到这个长生不老的秘密，就让克乔到修库拉那里去做学徒。修库拉的女儿德布雅妮对克乔一见钟情，想方设法说服了父亲收下克乔作为门徒。克乔学到了不死的秘方之后，到德布雅妮那里告别。剧情即由此展开：德布雅妮在交谈中向克乔表白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克乔心中也爱着这个女子，然而为了服从责任和命令，他只有拒绝这份爱情。于是德布雅妮在临别前诅咒克乔学到的秘方永远不能发挥作用。

1896年，罗宾发表了第二部有韵诗剧《玛丽妮》，这个剧的结构更为严谨，情节也更富戏剧性。美丽的玛丽妮公主，出生在信仰印度教的国家，然而这位圣洁的公主却信仰佛陀思想，认为真理与爱情是宗教的身体和灵魂，并且还要将这信仰传遍全国。对印度教疯狂信仰的克曼客企图强迫国王放逐玛丽妮，先是鼓噪群众，之后竟然勾结外国军队，妄想用鲜血维护信仰，只是由于他的一个朋友突然醒悟，将这一阴谋报告给了国王，充满血腥气味的混战才没有发生。

泰戈尔虽然出身于婆罗门家庭，他的父亲又是一个伟大的印度教改革家，但是他对印度教的感情却是不那么虔信的，只局限于对梵语文学遗产和对《奥义书》中深刻哲理的赞许。他不满婆罗门主义一味宣扬自己的权威，更不满种族制度人为地将生来平等的人们分作不同等级的几类人，允许上层对下层的不公平的野蛮待遇的存在。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一直对佛陀十分崇敬，因为泰戈尔觉得佛陀宣扬了婆罗门及正统

印度教中所没有的普遍同情与平等的人类之爱。因此，可以说，《玛丽妮》这部戏剧也正是戏剧性地表达了他思想感情上对佛陀的倾向。作为拥有一颗热爱祖国人民及全人类的诗人之心的罗宾，后来还曾经在有关佛陀身世传说以及佛陀思想的基础上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歌和戏剧。

在这一时期，泰戈尔除了进行短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之外，在帕德玛河上巡视父亲的庄园之际，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这些散文囊括众多的主题，包括政治、教育、社会、宗教、语言学和科学等领域，它们充分地证明了罗宾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真正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

而除开论证性的散文创作之外，一部独特的、人格化的《五元素日记》成了他写作至此最具风格与特色的散文集。在这部散文集中，罗宾把组成宇宙的五元素——风、地、水、火、空，加以人格化，让它们以戏剧人物的形式出现，其中水和火象征女性，她们感情丰富，渴望知识与情感；而另外的三个——风、地、空是男子。三者相比：地，反应迟钝，是愤怒的机会主义者；空，观点模糊；风是个奢谈梦想的理想主义者。这五个人物互相讨论，争辩生活和文学之中的许多问题，而作者扮作仲裁者与调解员，不仅介绍他们各自的观点，还加以认真的阐述。全书的笔调极为风趣，幽默与争论，知识与笑话相互交织，彼此相映成趣，是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佳作，深受孟加拉人的喜爱。此外，1899年还出版了泰戈尔的一部格言集《碎片》，他采用的是传统的诗体格式、警句和寓言形式，这些充满机敏与睿智的格言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孟加拉人民现代语言中一个富有极强生命力的组成部分。

总之，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罗宾正走上他早期创作的巅峰，他长于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而且对语言、韵律运用自如，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而且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也开始逐渐贴近普通人民的生活。作为诗人，泰戈尔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譬如对自然、生命、艺术和宗教的深入思索也从这阶段起开始走向成熟，显示出泰戈尔自己的思想特色。

第十二章 “和平之乡”

印度近现代文学与当时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印度是亚洲众多国家中最早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入侵的一个。溯本穷源，早在16世纪初，欧洲列强，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就先后侵入印度。自此，曾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恒河流域文明的东方古国，开始沦落于受人白眼、被异邦颐指气使的悲惨境地。而在这些侵入国中，最猖狂的尤属英国。1757年，英国人就凭武力和强权，取得了对印度的绝对统治，并在这片国土上蚕食鲸吞，巧取豪夺。这样，到1849年终于将掠夺的阴影盖满了整个印度全境，印度彻底地变成了它在东方的殖民地。

英国残酷地压榨着这个当时尚处于落后的封建时代的国家，视印度为本国工业的廉价原材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例如将上好的印度羊毛和棉花运回英国供应毛纺织业，又将成品运回，垄断印度市场，从中赚取印度的钱财。自从1900年英国在印度设置了东印度公司之后，对印度人民的经济压榨愈演愈烈，而英国女王亦堂而皇之地成了印度人的女王。印度丧失了自由自主的国家主权，成了英属殖民地。印度国土上随处可见的是金发碧眼的英国政府派驻的官员、英国传教士和商人，他们让印度人抬着轿子，摆出一副高贵的派头。

广大的受奴役的印度人民，终于喷发出了满腔郁结的怒火。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有血性、有骨气的人民不断地掀起反英的斗争，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以迎头打击。

19世纪的下半叶，印度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队伍终于诞生了，从此，民族解放运动步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进程。印度的民族意识觉醒了，沉睡的民族巨人在自己国土上崛起。英国当局为此终日神经紧张，惟恐巨人早早就会成长壮大而后痛击自己，于是便显露出侵略者的凶残面目。

为扼杀印度国土上的民族主义情绪，1899年2月，英政府逮捕了伟大学者、爱国者，民族运动“激进派”的领导人提拉克，并且在接下来的2月18日，通过了镇压民族运动的《治安维持法案》。

衷心热爱祖国的诗人泰戈尔，面对此情此景，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斗争的洪流。当时，孟加拉人民被英国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万丈怒火，在加尔各答，群众自发进行集会，愤怒声讨侵略者。《治安维持法案》通过的前一天，即2月17日，泰戈尔满怀爱国热情，在加尔各答的一个群众集会上，登台发表演说，宣读了著名的文章《无声的抗议》，发出了反对英国镇压政策的有力声音。会后，他还热心参与到援救提拉克的募捐活动中去。随后，加尔各答鼠疫流行，泰戈尔又积极支持修女建立的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和救济的组织。诗人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证明了他不愧为群众爱国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和参加者。

1898年，泰戈尔结束了对庄园家乡的管理和漫游，携全家来到了父亲在什拉依德赫的家。这时的罗宾已经37岁，是五个孩子——三女两子的父亲。身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他在印度已颇有声望。

巴尔·更伽塔尔·提拉克（1856—1920），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此外，他还是音乐家，谱写了大量的歌曲。

暂时告别了帕德玛河上的漫游岁月，泰戈尔开始担当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虽然他为孩子们请来了一位英国家庭教师，但他自己却是孩子们最主要的老师。因为在童年时曾深深地感受到学校机械教育的苦处，所以他便努力探索传授知识的最佳途径。他还著文对教育的基本原理、最终目的与教育方式等做了有意义的挖掘。但最终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写一些文章来研讨教育，而是亲身投入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泰戈尔自己的学校生活无丝毫幸福可言，当他面临着子女的教育问题，面对当时一般学校所实施的教育制度的弊病时，他思想中一些新颖的教育方法渐渐成型了。诗人渴望将这些新思维亲身付诸于实践中去。

1901年，正是新世纪的开端，泰戈尔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尝试，不过并非在诗歌领域，而是在教育领域。作为一位教育改革家的泰戈尔，希望创办一所由自己来管理的学校。校址选在何处？加尔各答那繁华的街市，嘈杂的人声，使得泰戈尔不愿将学校建在那里。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定居之处和未来的学校均应选在有着安静幽雅的环境，并且十分贴近大自然美好景色的所在。诗人看中了桑地尼克坦这个“和平之乡”。

还是在1836年，罗宾的父亲大圣人，在距加尔各答不太远的鲍尔普尔购买了一大块土地，并名之曰“桑地尼克坦”，意即和平之乡，大圣人有时会隐居在那里沉思默想。当罗宾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曾在追随父亲到喜马拉雅山游历之际居住在那里，而且他也和父亲一样，被桑地尼克坦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苍茫的红土荒原迷住了。

于是，泰戈尔选中了心中这块圣地，想在桑地尼克坦这“和平之乡”建立起一所学校。1901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遂将新学校的校址定于此，建立起后来扩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学府“和平之院”。

这一年的12月22日，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为自己办的学校揭了幕。当时，这所学校仅有包括他的长子在内的五名学生和五名老师。

在泰戈尔的头脑中，古代印度人们在森林静修的理想画面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他：在古木参天、深幽宁静的树林里，那些圣贤和自己的门徒同住在一起，教学生们过简朴的生活，并教诲他们以崇高伟大的理想。古代印度的经典之作《奥义书》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形成文字的。泰戈尔自己热爱简朴的生活和美丽神奇的大自然，他希望把学校也办成理想中修身养性的学园，让学生和教师都享受到传授知识的快乐，从而一改自己小时候所受到的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移植到印度国土上来的那种机械死板、毫无生机的教育方式，将古典理想与现代教育环境完美地结合起来。

在古印度，文人们并不像欧洲的文人墨客那样居住在城市里，而是住在乡村，很多人还隐居在森林中，过着遁世的隐士生活。泰戈尔信仰世间万物的和谐统一，于是将他的学校建于景色宜人的自然环境之中。学校设备十分简单，生活亦非常俭朴，不设教室和桌椅。上课时师生就围坐在大树之下，让学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首先通过四肢五官来认识世界，永远同世间万物保持一种完整而又连绵不绝的和谐。泰戈尔盼望以和平宁静的大自然给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以清新的陶冶，从而使他们既能愉快而又简单地通过自己的种种感受去认识周围世界，又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自己动手生活的能力。

除了以上的设想之外，通过某些劳作或工业活动进行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最早也都发端于桑地尼克坦。较之加尔各答舒适的城市生活条件，桑地尼克坦的生活相当艰苦，学生们必须自力更生，做一些体力劳动以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饮食也是以素食为主。

学校的五名教师中，三人是基督徒，还有一个英国人。这样大胆的安排和聘任，在当时社会舆论界和保守派的眼中，实在是出格妄为。然而泰戈尔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所聘请的教师，多是艺术家或富于艺术气质的人，他将教师和学生的住处安排在一起，在师生的共同生活中，老师自身的美好情操可以感染和熏陶学生。泰戈尔还时常让学生们为周围群众服务，以培养他们的爱心。

在教学过程中，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学习，不仅教给孩子们文化、科学知识，还注重音乐、戏剧、美术的教育，从而使学生们各方面得到健康成长。泰戈尔讲究快乐、自由学习的气氛，他先让孩子们自由学习母语，并不一开始便强使他们机械地背记外国语。

当泰戈尔在为自己祖国教育制度的完善进行创造性的拓荒之时，社会舆论却经常对他猛烈地指责和冷嘲热讽：保守主义者认为他妄改祖先教育体式，而请信仰异教的人做教师，更是对印度教教规的亵渎；激进的改革派也觉得泰戈尔竟敢遵照古制教育现在的学生，实乃思想保守、僵化顽固的典型；其实即便是那些怀有良好祝愿的人们，亦认为建好这所学校只不过是诗人的白日梦想。

由于缺乏社会各界的支持，很长一个时期里，学校的资金和人手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况且学校的吃、住几乎是免费供应的。为了维持开支，泰戈尔艰难地筹措资金，还把自己的部分房产和藏书变卖掉；他忠实温良的妻子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也献出自己的珠宝首饰，并慈爱地关怀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常为他们烹制可口的饭食。

虽然在那个时代，教育者是印度被歧视、被凌辱的低种姓之一，但泰戈尔义无反顾地从事着教育事业，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理想的实践之中去。

他事必躬亲，不仅参加学校的管理和建设，还亲自执教。他热爱儿童，真心真意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当他发现在孟加拉没有合适的初级读物和教科书时，便亲自编写了四册孟加拉文《初等课本》，入选的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后来课本也被孟加拉的其他一些学校所采用。此外，泰戈尔还坚持写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有诗歌、故事、戏剧和童话等体裁，内容分外充实，迄今仍受到孟加拉和世界各国儿童的喜爱。

泰戈尔的辛劳是有价值的。他所首倡并实施的学生应进行劳动的主张，后来被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甘地归纳到今天印度称之为“基础教育”的制度之中。他废除了一切体罚学生的制度，后来还实行男女同校。虽说这些措施在今天已经是相当普及了，但他作为创始者，却功不可没。

泰戈尔早年深受野蛮、机械的教育制度之苦，故而 he 痛恨压抑和束缚儿童的天性。的确，就像我国现代文学巨擘鲁迅曾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桎梏儿童身心的教育制度表示不满一样，泰戈尔也终生对强制儿童学习的教育方式深恶痛绝。他衷心地热爱孩子们，因此，能在他的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兢兢业业、费尽心力而又充满热爱之情建立的这所学校，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一所国际大

学。这所“和平之院”的学生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带着健康的身心步入社会之后，纷纷撰写了对母校美好生活的追忆文章，后来集成书出版。从这本记载着当时流行的无数趣闻轶事的作品之中，我们可以体味到泰戈尔创业的艰辛。

第十三章 长篇小说和《沉船》

1901年，泰戈尔先后为自己的两个女儿——14岁的长女玛吐莉勒达（即贝拉）和11岁的次女莱努迦（即拉妮）完婚，而且两次婚礼相隔时间不到一个月。

罗宾往日曾非常明确地表述过童婚应当受到谴责的想法，可是如今他为什么做出了言不由衷的举动？

在泰戈尔生活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在他所属的婆罗门这一阶层里，一直恪守着这样一种传统：女孩子在青春期应当成婚，如果过了青春期尚未出嫁，那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还会辱没家族的声望。此外，由于泰戈尔家族祖上曾经受到过玷污，所以对罗宾来说，如果能够和极富传统观念、视维护种族纯洁如生命的其他婆罗门家庭建立起婚姻关系，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在两个女儿的婚事上所表现出的前后言行不一致的态度，说明尽管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泰戈尔反对童婚制度，然而作为生活于世俗社会的人，他还是不得已采取了与传统同流的做法。习俗的力量毕竟是强大的。

即便如此，泰戈尔的心中仍存在着矛盾和疑惑。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妇女的命运问题及她们的爱情悲剧上。在他将两女嫁出的1901年，他以连载的方式写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破裂的家庭》，刊于他编辑的《婆罗门》杂志上，另一部《小沙子》，发表在他当时开始负责编辑的《孟加拉观察》杂志上。泰戈尔的研究者认为，他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奠定了印度文学中现代长篇小说的基础。

《破裂的家庭》写了一个名叫查芦的姑娘的爱情悲剧。查芦是个年轻、聪明而喜欢梦想的女子，然而她却得不到丈夫卜帕迪的关心和体贴。卜帕迪是一位忙于日报的编辑，他有极强的事业心，并对自己的办报成就引以为荣。因为工作繁忙，他无暇照顾和考虑年轻妻子的兴趣与向往，而更令查芦难过的是，丈夫认为自己对他的爱恋是理所应当而且不应更改的。可是随着丈夫一位堂兄弟阿玛尔的到来，查芦的感情也逐渐发生变化。年轻的阿玛尔热情、活泼，查芦为他所吸引，发觉有他做伴自己很兴奋。阿玛尔是个年轻的作家，他鼓励查芦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感想，两人互相勉励着创作，不久都成为文坛的新人。

不过，他们在文学上的友情也开始转换为一种微妙的爱恋，查芦由此发现了生活的新意义。然而，当青年阿玛尔要去伦敦进一步深造时，查芦万分不安。阿玛尔去了英国，查芦的快乐也随之消逝，她的生活显得十分寂寞，她还为阿玛尔对她没有特别的恋情而感到烦躁与难过。丈夫发觉妻子精神沮丧，闷闷不乐，误以为是因为自己体贴不够，妻子才会不开心。所以他尽力对查芦关怀备至。可是此时丈夫的态度对查芦已没有任何意义，当卜帕迪获知让人痛苦和难堪的真情之后，为时已晚，她离开他远去了。他们幸福的小巢已然倾覆，爱情鸟已一去不复回。

在印度社会中，妻子往往比丈夫年轻很多，她们缺乏经验而富于梦想，常被年长成熟的丈夫视作附属品。因此感情的不稳固经常导致嫂子

又译《毁了的鸟巢》。

泰戈尔将《小沙子》译成英文后，改名为《比诺迪妮》。

与年龄相近、爱好相投的小叔子之间的暧昧关系，这种情况在印度的大家庭里尤其突出。在印度语言中，小叔子 Derera 这个词在梵语里即 Dvivara，意思即第二个丈夫，这个词义里或许就保留着印度原始社会风俗的些许痕迹。

长篇小说《小沙子》写于 1901 年，两年后出版。它也是以孟加拉中产阶层的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不过内容更加充实，结构更为紧凑完整，描写亦非常细腻，小说细致地分析了复杂环境中的情感问题。

《破裂的家庭》与《小沙子》虽为同代作品，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差异。《破裂的家庭》中女主人公的感情不幸是由于她丈夫一个人的缘故，而长篇小说《小沙子》的女主角比诺迪妮的爱情受挫则是因为社会上旧习俗的阻碍。在《小沙子》中，泰戈尔以一个革新者的身份出现，旨在将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曝光。这部作品在当时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比诺迪妮大概也能够称得上是现代印度小说中反抗道德成规的第一位女性。

聪慧秀美、品行端庄的比诺迪妮受过极好的教育，慈爱的父亲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把本来就不多的钱全部用光了，没有留下一点做嫁妆。女儿到了应成婚的年龄，可一连几年过去，却并无一个慷慨的男子，愿娶一位没有嫁妆的姑娘。结果比诺迪妮只好与一个贫困多病的男人成婚，然而不久那人就死了。她只好在这个缺乏爱与同情的世俗社会里面对着做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以了却余生的悲惨命运。然而她不甘心，坚信自己拥有追求幸福爱情的权利。

比诺迪妮没有收入来源，惟有寄居在姨母拉兹洛希家。虔信宗教的姨母终日生活在宗教仪式的狭窄天地里，她极为宠爱独子莫汉德罗，使他十分任性。而他新婚妻子阿莎天真烂漫，不善辞令也不会家务。比诺迪妮的闯入，立即给这对沉浸于恋爱美梦的年轻情侣的生活带来波澜。

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并未使性格热情又勇敢的比诺迪妮消沉下去，她仍决心向不幸的命运抗争，她为自己取名为“小沙子”，这个新名字即象征着她对美好爱情的追寻，亦展现出她独立的性格：寡妇的身份，使她的美貌与才智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而不可能带去幸福。“比诺迪妮像一只被激怒了的黄蜂，要蜇刺所有的人，她准备烧毁整个世界”。

开始她以为莫汉德罗值得追求，便以自己的火热情感毁坏了她新婚的小家庭。然而后来她发现莫汉德罗对自己的恋慕是盲目的，他无法理解自己，又不能成为自己的依靠，而且，“她拒绝他的时候，他还会甘心受她支配，可是一旦她对他俯首帖耳，他就要开始寻找自由了。”

比诺迪妮要寻求更好的伴侣，她逐渐感到莫汉德罗的朋友比哈里才是自己真正的知己，他可以成为“一个女人所需要的，毫不动摇、可以信赖的保护者”，于是便大胆执著地追求他，比哈里内心的青春活力苏醒了，他宣布要娶比诺迪妮。

然而在这勇敢的抗争中强大的守旧势力令比诺迪妮无法与之抗衡。因为依照印度社会传统，有身份的比哈里倘若与一个寡妇成婚就会降低自己的种姓，并且丧失所有权利，而且法律也不会承认他们的婚姻。比

诺迪妮也清醒地意识到两人婚姻是不可能实现的。心地虽正直但懦弱的比哈里终于向习俗让步，甚至拒绝她想一同工作的要求。这些事实证明，比哈里并非可以完全信赖的保护人。比诺迪妮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她惟有被迫去贝拿勒斯苦修。

比诺迪妮的生活与情感之路是如此坎坷，可是拼尽全力反抗不公平命运与社会旧习俗的她，却得不到人们的一丝支持与同情。她曾这样倾诉心曲：“我使人们受了很多痛苦，我自己也受了不少苦楚。”而在她所承受的那无边的痛苦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舆论对于寡妇的歧视与无形或有形的禁锢。尽管她顽强的抗争最后失败了，然而她的追求和斗争精神却激励着读者。

在泰戈尔创作的小说中，有为数众多的女性形象，而比诺迪妮即是其中最真实也最感人的一个。泰戈尔在小说中以十分同情的笔调来记述她的坎坷遭遇，并对爱情这个千古话题进行了理智的思索和诗意的描绘。可以这样说，《小沙子》是泰戈尔创作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超越了当时孟加拉小说的一般水平，从而将孟加拉小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什么得出如此结论？因为，当时孟加拉的长篇小说，不是对历史传说的铺叙，就是夸张地描述上流社会生活中的趣闻轶事。而泰戈尔这部《小沙子》却不仅精确地展现了社会生活，而且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因此，《小沙子》这部作品成为孟加拉乃至印度文学中具有严格意义的三种类型的近代长篇小说——即现实小说、问题小说、心理小说——的始创。

1902年，泰戈尔又创作了一部名为《沉船》的长篇小说，并在第二年起连载于报章之上，后于1906年出版。这是泰戈尔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作品之一。作品的情节富于传奇色彩：性情柔顺、为人颖慧的小伙子罗梅西与城市女孩汉娜丽妮彼此爱慕，他们希望结为终身伴侣，却遭到罗梅西父亲的坚决反对。怯懦的罗梅西只得屈从于长辈们的意愿，答应与一个乡村孤女结婚。成亲后的他们，尚未认清对方容貌，便立即乘船游览，然而途中船遇暴风，他们与船上另一对新婚夫妇同时离散。船被风暴击沉了。清醒后的罗梅西发觉自己被船抛到了荒凉的河畔，而离他不远有一位姑娘，她还完全是个孩子。罗梅西错把这个女孩当做未曾谋面的妻子，他把这个名叫卡玛娜的女孩子带回自己的家，并精心照看她。可是，罗梅西也因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他不敢肯定这个卡玛娜就是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妻子，所以他既不能将女孩子留在身边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无法将她交给别的人；同时，由于这女孩的存在，他更不可能与心上人汉娜丽妮终成眷属。

无法可想的罗梅西只好带着小卡玛娜走了。刚开始，名叫卡玛娜的这个女孩把他当成自己的丈夫，因为她也同样未曾见过自己丈夫的容颜。然而当她终于明白事实真相以后，便毅然离开了罗梅西，独自寻找自己的丈夫。与此同时，卡玛娜真正的丈夫纳里纳克夏又与罗梅西的昔日恋人汉娜丽妮相识，并且由于双方父母的撮合，准备成婚。

故事发展到此，错综复杂的情节最终有了一个悲喜交加的结局：卡玛娜历千辛尽万苦终于找到自己的丈夫，两位情人终缔良缘，可是罗梅西和汉娜丽妮两人却难以破镜重圆。罗梅西去往加尔各答，希望重新赢

得汉娜丽妮的爱情，可是女方的哥哥回绝了他，因为汉娜丽妮为罗梅西的所作所为感到异常忧闷和绝望。罗梅西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命运将两个女孩子带到罗梅西的生活中来，可他却失掉了这两个女性的爱，他惟有独自去承受着第二次沉船——希望之船沉没的打击。在小说的结尾，善良而不幸的他对自己暗暗地说道：“现在除了我自己谁也不需要我，让我到茫茫的世界中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吧。”

其实，除了由于父母代他包办婚姻以及错认人这两方面的原因外，罗梅西自身的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自己的悲惨境遇。父母强迫他和一个他从未认识的女孩结婚时，他虽满心不快，却也仅只说了几句话，而在这些话被顶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反抗长辈们为他一手操办的婚事，只是幻想会有一个偶然事件能够阻止这件自己根本不情愿的婚事。当船沉以后，他既不愿意向卡玛娜讲明他的真实处境，又不敢对汉娜丽妮说明事实的真相，只是一味地拖延，直至最终他不仅使得别人受到痛苦的折磨，自己也受到了伤害，并且最后失去了个人幸福。因此也不能不承认，罗梅西自我希望之船的毁灭与他自身亦有很大关系，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1902年这一年，是泰戈尔历经死亡与痛苦的不幸的一年。一个接一个的生离死别造成的巨大痛苦，纷纷降临在他的头上。命运的巨轮飞速而又无情地转动着，碾过诗人的心。

第十四章 家国之痛

1901年，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梦想，罗宾·泰戈尔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建立起一所学校，自己也将家庭迁到那里。在和平之乡仅仅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罗宾的妻子默勒纳利妮就身染重病，他把她送到加尔各答就医，可是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02年11月23日这一天，默勒纳利妮在加尔各答去世了。巨大的悲痛降临在泰戈尔和他的儿女们身上。

默勒纳利妮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嫁到了泰戈尔家。由于他们的婚姻是家人一手包办的，因此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感情基础。年幼而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她当时只有11岁，而泰戈尔已经是一位22岁的俊美热情的青年，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与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可是，默勒纳利妮在结婚以后的岁月里默默地、坚持不懈地逐渐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心地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她，20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和帮助丈夫的事业，她以纯朴而又勤恳的行动、真诚善良而又温存慈爱的心灵关怀着自己的五个儿女，热情地用她操持家务的非凡才干和精通烹调的手艺接待每一位来访的客人。生活中的她也极为朴素，几乎从没有戴过珠宝首饰。她以自身美好的心灵和爱心展现出她所特有的动人魅力。

默勒纳利妮还通过努力的学习，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而且学会了英文和梵文，并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之下，以孟加拉语改写了梵文简易读本——《罗摩衍那》。此外，她还曾登台演出了丈夫编写的戏剧《国王和王后》，由于她对角色的深入分析与准确把握，演出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她以她的努力和才干赢得了丈夫的爱。

也正因为如此，泰戈尔在妻子弥留人世的最后两个月里，不分昼夜地亲自看护她，不肯让专职护士代替自己来照料妻子。那时还没有电风扇，有人曾亲眼目睹到这样的情景：泰戈尔一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为她摇着扇子。妻子辞世后，泰戈尔内心痛苦难当，他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通宵达旦地独自一人在阳台上踱来踱去。

妻子的故去，使泰戈尔异常悲痛，二十年来相依相守、相伴相知又相濡以沫的往事无不历历在目。年轻的妻子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他却还没来得及报答她的恩情。他的心中埋藏着数不清的遗憾、追悔和思念。他用诗人的笔抒写着心中情感，接连创作了27首诗歌，集为一册《追忆》，于1903年出版。诗集充溢着温柔深厚的情感，令人感慨不已。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失去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把我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吧。

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温馨的接触吧。

妻子去世后没有几个月，诗人的二女儿、童年时代就成婚的莱努迦也身患重病，医生劝她到高原地区疗养，换换空气。于是，1903年，诗人带着二女儿、三女儿米拉和小儿子萨明德拉，先后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哈扎利公园和阿尔莫拉。他不仅要照顾生病的莱努迦，还得照看两个失去了母爱的最小的孩子。为了给失去母爱的孩子们以欢乐，他不得不强忍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痛楚与哀伤，同他们一起嬉戏，注意地倾听孩子们幼稚而又充满童趣的言语。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诗人从孩子们的天真可爱而又浪漫的话语里汲取了许多乐趣，并受到启发，创作了很多美好纯真的儿童诗，这些动人的儿童诗后来集为一册，定名为《孩子们》，其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收进了英文诗集《新月集》之中。

1903年，在自己的母亲去世九个月以后，13岁的莱努迦也因病告别了人世。生性活泼敏慧的莱努迦，是个很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姑娘，她富有才华，很得父亲的器重和喜爱，认为她将来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非凡的女孩。如今，莱努迦小小的年纪便夭折了，做父亲的心中那份伤悲与惋惜是可想而知的。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泰戈尔连连痛失亲人，可这些接连而来的打击并没有能够摧垮他的精神，他并没有将心中无限的悲痛表现在脸上，而是埋头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停地扩充自己编辑的《孟加拉观察》这一杂志的内容，增加其篇幅。同时，新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他笔底流淌出来。

或许也就是在闭门创作、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泰戈尔学会了以真正宽容平和的心态来接受死亡，他明白了死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他之所以愈发努力地劳作着，则是为了将死去的亲人们未尽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些。此时，泰戈尔似乎在精神上与死神达成了和解，并从死的悲痛中看到生命那和谐的运动规律。

女儿去世后仅4个月，泰戈尔又面临着另一个悲痛的死别。他非常喜爱的萨迪什·拉易，一位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诗人，突然染上了天花，不幸死去。萨迪什·拉易在桑地尼克坦学校教书，在思想上他和泰戈尔有许多共同之处，泰戈尔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而且还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够成为自己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可如今，命运却夺去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由于担心学校里其他师生也会受到天花的传染，所以泰戈尔便决定将桑地尼克坦的整个学校都一起搬迁到什拉依德赫父亲的家附近。过了一些日子，学校的经济再度面临拮据的境况。为了继续将学校维持下去，泰戈尔不得不被迫以2000卢比的低廉价格，把自己所有作品的有限版权拍卖给了利益出版社。

生活一再地将不幸与悲痛带给诗人，仿佛是有意在考验他的心理忍耐和承受能力，锤锻与磨炼他的意志。可是这噩梦并未就此终结，在痛失爱妻及爱女之后不到3年，1905年1月19日，又一个不幸降到了泰戈尔的头上，他尊敬和热爱的父亲——大圣人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在88岁的高龄上逝世了。对于罗宾来说，他既是慈父，又是严师。也正是这位卓绝非凡的人——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为印度的社会生活设定了新的道德与思想的美好理想，他还用自己实际的改革行动，为印度历史带

来了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复兴时代，从而指明了印度政治觉醒的道路。这个伟人的逝世给整个印度造成了不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失。

同一年，在大圣人去世的前后，孟加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均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发生了自治运动。这一运动最初仅起于对寇松勋爵分割孟加拉阴谋的抗议，但到后来则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

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历史：在 20 世纪初，印度和自己的殖民主国——英国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日趋激化了，这表明印度民族独立意识在觉醒，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也已走向成熟。

当时，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是一个狂妄顽固的殖民主义分子。他在任英国驻印度殖民属国总督的期间，丝毫不顾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肆意采取一系列严厉举措来加强对印度国家和人民的压制与欺压，不遗余力地推行殖民主义的剥削政策。在他任职期间的最后一年，即 1905 年，他竟然一手遮天地颁布了全孟加拉分治的法律。

原来的孟加拉邦囊括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三个邦，统有人口 7800 万，其中约有 4100 万是孟加拉人。而在这些孟加拉人中，一半信仰印度教，另一半则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中的伊斯兰教徒大多居住于东孟加拉，而印度教徒则主要分布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可现在，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却有意将东孟加拉加上阿萨姆邦划分成为新的一帮——名为东孟加拉与阿萨姆邦，让其余部分仍保持原称——孟加拉邦。这样一来，新成立的一帮中有三分之二强为伊斯兰教徒；同时，重新划分的孟加拉邦中的孟加拉人比以往严重下降，还不足三分之一。十分明显，宣告孟加拉分治的新法律的目的，就在于分裂孟加拉民族，煽动宗教仇恨，从而造成民族分裂，削弱印度民族解放的战斗力量。

险恶的寇松勋爵颁布的这一分治法律，立即引起印度举国上下的愤怒与强烈的反对。也正是因为这一阴谋最终得逞，印度国内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派之间真的出现了裂痕，而恰是这个裂痕最后导致了 1942 年之后国家的分裂，并且造成了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行动及大肆屠杀的惨剧。诗人泰戈尔在很早以前，就曾以他的如炬慧眼预见到了这一切，并在那时候就向同胞们发出了警惕这一凶险阴谋的号召。

压迫必然引起反抗。全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沸腾了。这场自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政治运动，目的在于反对英国政府有意违背民族意愿、分割孟加拉以削弱其力量的阴谋；而与此同时，这场自治运动在某种层面上又带有经济运动的性质，人们希望藉此振兴印度民族工业，以抵制英国及其他外国的产品。

英国政府万万没有料到，分治的法律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引起孟加拉和全印度各阶层人民的义愤，更加速了印度民族觉醒的进程。印度第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终于来临了。

怒火燃着了整个印度的国土，悲愤交加的孟加拉人将 1905 年 10 月 16 日这一天，即分治决议生效的那天，定名为志哀日。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清晨，在加尔各答街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大游行、大示威发生了。情绪激昂的人民高声呼喊爱国口号，大声齐唱着爱国的歌曲，毫无惧色地向恒河之畔挺进。与此同时，为着配合这场大游行，加尔各答全城的市民们也同心协力，商店一致歇业，居民们也不生烟火。

到了傍晚时分，还召开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抗议自治法律的颁布，当时的与会者多达数万人，声势颇为浩大，情景蔚为壮观。

加尔各答的率先行动带动了全国各地的人民。自此以后，反抗运动的地域范围逐渐拓宽，并迅速波至全国。而且随着自治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开展，运动提倡的口号亦由原先的“重新合并孟加拉”，逐渐转至提出“民族自治”与“提倡国货”。于是，社会上便掀起了抵制英货运动。此时，运动的表现方式也从起先的和平游行示威发展到采取罢工等比较激烈的措施和手段。

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已经四起，面对祖国母亲的和平团结受到严重威胁的这一情势，在书斋中辛勤创作的诗人泰戈尔在做些什么呢？

第十五章 进与退

应当说，诗人泰戈尔并不是一个天性激烈的政治活动家，他不喜欢过于极端的言行。他毕生在社会生活里所追寻的基本宗旨，正如同他在创作事业中所追寻的美学理想一样，它，就是和谐。

也正因为如此，直到自治运动风起云涌之前，泰戈尔在政治上还只是采取和恪守着一种有节制的态度：他有时可能在集会中演讲，并且会撰写文章以抗议英国对本民族和国家的压制与侮辱，想方设法地去维护印度的民族自尊心；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政治运动的积极的参与者。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全国的政治活动尚缺乏民族意识，而且他还觉得，那些政治运动的领袖们对自己国家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与现实处境仍没有足够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领导者也只是热衷于政治上的你争我夺，而对祖国的发展事业非常冷漠。

不过，在诗人那洋溢着热烈情感的心胸里，爱国的热望与激情却始终汹涌澎湃，从未消退半分。诗人以他比常人更细腻的情感，更炽热的情怀，盼望着祖国母亲的独立与富强。他永远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者。

因此，当自治运动中举国上下都行动起来，证明了全印度的民族意识已不再沉睡的时候，泰戈尔也以满腔赤子之情，自觉地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并且成为自治运动的先锋战士。

诗人在许多公开集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热情洋溢的演说，并组织规模巨大的反对分裂祖国的游行示威。此外，他还展示了他的音乐家的天赋，写下了大量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经他之手谱写的这些爱国乐曲，在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的队列中被广泛传唱，并迅速传遍了整个孟加拉。他还倡导了一种名叫“拉希班德汉”的仪式。在每年的志哀日里，孟加拉人民就在这一仪式中，在手腕上互相系上一根红线，并且发誓统一祖国。

泰戈尔所创作的那些歌曲中，并没有鼓动狂热民族情绪的言辞，也无空洞重复的豪迈话语。他写下的那些歌词，真切地表达出他灵魂深处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对祖国明天的美好期盼，实实在在地抒发了他的动人心声。因此，人们特别喜爱他的歌曲，因为其中有着可以给他们以鼓励、赋予他们以热情的感人篇章，并且真正倾诉出了他们自己的感情。

诗为言志，歌为心声。在诗人挥就的那些歌曲的歌词里，既充满着火一般热烈的爱国感情，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运气去爱她，我是有福的。

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活财富对我就够宝贵的了。

对我的心的最好的芬芳礼物就是从她自己的花朵中来，我也不知道还有何处的目光能用这样的美妙来泛滥我的心身。

呈现在我眼中的第一道光輝是从她自己的天空中来的，让这光輝在我眼睛永闭之前再亲吻它们。

诗人那满胸襟对祖国的爱情也化作他对未来祖国母亲新貌的浓墨重彩的描绘和热切的企盼：

哦！上帝，愿我祖国的山山水水，
空气和果实都变得甜蜜。
哦！上帝，愿我故土的屋宇和市场，
森林和田野都变得丰富。
哦！上帝，愿我的人民的希望和誓言，
事业和诺言都付诸实现。
哦！上帝，愿我民族的儿女们，
生命和心灵都融为一体！

诗人还曾将歌曲唱给那些为印度民族独立英勇奋斗的勇士们，他以音乐鼓励着这些奋不顾身的人们：

如果所有的人都因害怕而离开了你，
那么，你，一个不幸的人，
就敞开心扉，孤军前进！
如果无人在狂风暴雨的茫茫黑夜里高举火把，
那么，你，一个不幸的人，
让痛苦点燃你心中的明灯，
让它成为你惟一的光明。

这支歌曲后来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圣雄甘地最喜爱的歌曲中的一首，他常在做晚祷的时候唱起这首歌。

在泰戈尔写作的歌曲中，由于他认为在爱国的同时不应当排外，故而在歌词中并没有直接地批驳殖民主义的罪恶，不过，贯穿他所创作的全部爱国歌曲中的那种对祖国的深深依恋，以及为她前途、命运执着探求的可贵精神，理所应当引起后代人们的注意。

在当年，有些学生仅仅是因为演唱了爱国歌曲，就被所就读的学院扫地出门。泰戈尔认为不能让这些爱国学子的学业被无理中断。为了组织他们继续完成学业，他和其他一些教育专家们共同制定了一项有关民族教育的计划，并特意为此项计划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即国民教育协会。泰戈尔在这个国民教育协会的历次集会上连续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的讲演，题目分别有《美与文学》、《美感》、《世界文学》和《文学创造》等。这些讲稿后来以《文学论》为名成书，并于1907年出版。

泰戈尔不是一个只空喊爱国主义口号的、不务实际的口头爱国者，他认为应当将那种刚刚觉醒的崭新而又火热的情感尽力引导到可以使孟加拉民族真正复兴发展的实际事业之中去；他觉得在异国殖民统治下长达数百年之后的祖国，百废待兴。于是，他便在演讲和文章中大声疾呼，提醒印度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们对实际工作的关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复兴民族实业的纲领、计划和设想。可以说，脚踏实地、以质朴感情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渴望以实际行动来使祖国繁荣昌盛的诗人，凭着他睿智的目光、敏感和直觉，在他的这些讲演中几乎预见到了后来成为圣雄甘地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方针。

然而，没过多久，泰戈尔与那些政治家们之间的分歧便显现出来。这些差异的根本起因就在于：在那些倡导爱国与团结的领导者中间，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做出了清醒的判断和合情合理的展望。而且，在那些高呼爱国口号的倡导人里面，泰戈尔也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印度民族教育事业中作过尝试的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以，他似乎总在言行中与别的发起人背道而驰。比如：当别人忙着要毁坏的时候，他却忙碌着去进行重建；当别人狂热地主张着要把外国货统统烧毁的同时，他却一再地强调应当一步一步地去发展复兴本民族的传统技艺；当别人在加尔各答梦想着自治独立，发表激昂的演讲之际，他却不合时宜地宣传要快到印度贫穷的农村中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更让某些人气恼的是，当他们一致声讨英国罪恶的同时，泰戈尔则不遗余力地揭露印度国家中人为的种姓制度的罪恶以及人民的贫弱、愚昧和没完没了的疫病。

正是由于多方面意见的不和，泰戈尔与其他的领导者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距离日见疏远。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日趋尖锐化并逐步走向冲突与暴力的局面，这一切使得泰戈尔的思想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逆转。

1905年发端的自治运动，到了1906年以后，主要演变为政治斗争。当时印度的政治斗争中矛盾异常尖锐，群众性爱国主义的风暴更为激烈，规模也继续壮大。仅1906年一年，孟加拉就先后举行了数百次的群众抗议集会，不仅工人们罢工，学生们罢课，连农民也开始加入到斗争之中，在孟加拉点燃的星火已呈燎原之势，逐渐扩大到全国，汇演成印度全国性的群众爱国运动。

到了1907年，斗争的烽火仍愈演愈烈，加尔各答的群众示威此伏彼起，而且这些示威活动最终往往发展到与警察的正面冲突。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为此逮捕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在殖民当局对这些运动倡导者进行审讯的那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有群众的抗议大会召开。就连当时英国驻印度的总督也在写往伦敦的信中做了这样的比喻：整个孟加拉就像一座火药库。即便是英国本土的政府也开始担心起印度的武装反抗即将发生。

正当民族解放运动即将酝酿成武装斗争的当口，泰戈尔却激流勇退，逃避了将临的革命风暴，止住了前进的步伐。

造成诗人行动突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他渴望印度独立与自由，但他却希望人民不去理会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通过暴力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代价就未免太大。此外，正当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主张将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情绪转至民族建设，从而进入他为印度的未来所设计的以改革实业而复兴民族的轨道上去。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革命运动不会依照他的主观愿望而更改。因此他感到失望和困惑。

思想上的新危机使得泰戈尔退出了斗争洪流，但是，这样的事实不可更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高扬着旗帜前进的旗手之一，他鼓励人们去战斗；可是，当运动的现状超出了他的理想之际，他便放弃了举在手中的大旗，置紧张的斗争形势于不顾。因此，他的退却遭到了来自各

方的严厉批判：激进的运动领导人谴责他虎头蛇尾；广大的公众咒骂他是在背叛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更认为他是个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的人物，所以一面暗地里监视他，一面偷偷地下达秘密文件，勒令那些印度的亲英分子以及在印度殖民政府中任职的工作人员，不得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泰戈尔的学校读书，更严禁以任何形式对桑地尼克坦学校进行支持和援助。

泰戈尔被彻底孤立了。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的心中全都是解不开的困惑和疑团。作为一个感情真诚、行事率真的人，迷茫之时，他选择了后退与隐居，结果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不满和对他的孤立。他在感情上无疑受到了重创。但是不管怎么样，泰戈尔选中的道路是别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改和左右的。他是倔强的，而且永远不会妥协。

即便是在泰戈尔去世很久以后，人们提到他与革命分道扬镳的举动时仍会发生争议。其实，我们倒是以为，这个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绝不是——一个借斗争之机取得个人私利的政治投机者，也证明他在斗争波澜壮阔、席卷全国之际，还保持着自己的清醒的头脑，以自己的眼和脑在认真地观察着，努力地思索着，并且一旦作出抉择之后，任何责难也不可能使他回头。

远离了烽火四起的民族运动斗争之地，背负苦闷与孤独的感伤，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桑地尼克坦学校的教育工作和自己所热爱的文学创作中去。

他不知疲倦地写作着。自1906年起到1911年五年间，泰戈尔撰写了许多关于社会、政治、教育、哲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语言学及民间文学等多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语调轻快优美，分析层次有致，其内容几乎涵盖了祖国文学的全部。正因为如此，不少评论家都满怀敬意地指出，泰戈尔在印度民间文学的开掘中，做出了意义深远、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所有这些文章里，还有四册文学评论集，它们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学及一般文学评价》。即使今天的读者读来，仍会受到莫大的教益。

第十六章 迷茫岁月与《戈拉》

孤独与愁闷并未遏止住诗人生命中的创作之泉。相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种种情感渴望表达出来的催化剂。在离开斗争与运动的日子里，他提笔写下不少充满着讽刺和幽默气息的随笔文章，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又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集——《渡河》。

正如诗集标题所表示的那样，诗人泰戈尔那时心中迫切地盼望着的，便是希望从有限的领域过渡到遥远的无限的彼岸世界，渡到神灵们的境界之中去。

几乎所有那些具有神秘气质的诗人，在目的将临的时刻都会拥有一种共同的体验：那就是深感彷徨，甚至沮丧。泰戈尔也有类似的体会。如果说在《奉献集》中，泰戈尔已用严谨的诗行，带着宗教的虔敬拜倒在不可见到的至尊之神的威严之下，那么在 1906 年出版的这部《渡河》中，神的行踪已不再迷茫而不可知，而且，诗人还更加热烈地感觉到：与神的距离虽然遥远，但当自己渡过河水，很快就会拜临神的面前。

由于满怀过渡到彼岸的热切心情，诗人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期待感和等候神之召唤的感觉。等待会产生焦躁不安，而焦躁不安的情绪就会迅速地直接导致郁郁不乐。在《渡河》中的诗篇里，诗人想到自己可能已无法继续坚持下去的软弱，他对同伴说道：“原谅我，兄弟们”，“我的体力正在衰退，我已跟不上你们的步伐。我想在这荫凉的树林下喘一喘气。请不要等候我。请不要召唤我这个掉队的人吧。”

《渡河》中绝大部分的诗篇（包括一些歌曲），带有象征色彩和朦胧的意味。在这些诗行中，诗人或是把自己比作深夜等候情人的少女，或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四处求乞的乞讨女孩。他以这种种方式来表达和抒发自己希冀与至尊之神相会的迫切愿望，以及由此而萌生的夹杂着欢乐、悲愁、追悔与期盼在内的纷繁复杂的思绪。他曾在诗中自况做一个乞丐女孩儿，不期然与娱乐中的君王相遇：

我在村路上沿门乞讨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地施予，等待那散落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手来

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非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

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奉献给你。

正如同那个渴望把一切都献给君王的人一样，泰戈尔也渴望着把自己的所有都呈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什么也不给自己留下。

后来，《渡河》这部诗集中的 11 首诗被选入英文诗集《吉檀迦利》，

还有一些被分别收入《园丁集》《采思集》和《爱人之赠品》之中。

正当泰戈尔陷于自己的思想苦闷之中，同时又受到外部社会孤立和打击的时候，又一个家庭生活中的不幸与他遭遇了。

1907年11月，泰戈尔最小的儿子萨明德拉，突然被流行的霍乱症传染，很快就死去了。当时，小男孩才只有13岁。这个迎头痛击使泰戈尔感到了最深重的凄楚。萨明德拉是个聪颖活泼、可爱而又有天分的孩子，诗人盼望他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成就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所有殷殷的愿望都随着小儿子的一去不回而灰飞烟灭了。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萨明德拉是在母亲的忌日那天去世的。这使得泰戈尔肝胆欲裂。

从1902年到1907年的这5年之间，死神似乎住在了泰戈尔的家庭之中。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他的家已被死亡冲击得几乎要毁灭殆尽了。先是相伴20余年的爱妻撒手人寰，接着是13岁的次女，然后是泰戈尔敬重的父亲，现在最小的儿子也离他而去。泰戈尔心中那无限的伤悲怎能用语言表达，又如何能倾诉得尽呢？

如今的泰戈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儿女是他最亲的人了，可是他们却又都不在他的身边。大女儿在孟加拉邦丈夫的家中居住；长子于一年之前被他自己派往美国钻研农业科学，远隔万水千山；三女儿米拉也在几个月前出嫁。所以此际幼子的突然夭折，使得诗人在熙熙攘攘的众人之间只剩下了形单影只、孑然一身。

悲痛与孤单愈发加重了诗人精神上的沉郁和苦闷，给他以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伤痛，泰戈尔决定住到自己什拉依德赫的庄园中去，在那静默无言的自然风景中安安静静地独自住上一段日子，以慢慢地弥补心灵上的创伤。

然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并不能把泰戈尔打倒，也并未使他沉沦下去。相反，深沉的感情反倒使得他的创作更具崇高、纯洁的艺术气质。

泰戈尔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捧出了他丰硕的创作成果：长篇小说《戈拉》。

《戈拉》这部小说首先是于1907年到1909年连载在印度的《布拉巴希》杂志上，后在1910年正式出版。它的出版证明泰戈尔作为现代印度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之地位已毋庸置疑。

《戈拉》是一部展现印度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许多泰戈尔作品的评论家们都声称，小说是描写印度现代历史向最后的决定时代进行过渡的史诗。而且他们还纷纷称赞，说是正像《战争与和平》深刻揭示出俄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问题，从而在俄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样，《戈拉》也因分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复杂矛盾的印度社会生活，而成为印度小说史上光辉的一页。

虽说《戈拉》这部小说颇具重大的时代意义，但它并非充塞了形形色色的论证和说教，而有着一部文学名著所应具备的韵味与魅力。作品人物刻画得优美动人，笔法的酣畅灵活，景物描绘的诗情画意，再加上那栩栩如生地剖析出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及人物内心的纷繁变化，使得整部小说在多方面都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戈拉》所展示的是19世纪70至80年代民族复兴时代的孟加拉的

社会生活。当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已蔚然成风，可是以何种方式来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却各有不同：一派主张吸取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的精髓，通过改良使落后的印度走向先进与文明，在不超出英国殖民体系的圈子内谋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这一派后来分裂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泰戈尔的父亲即是前一团体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态度是对印度古老文化传统吸取精华、扬弃糟粕。后一团体则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另外的一派是激进派，在提出以暴力推翻殖民政府的同时，提倡完全的复古主义，要求遵守印度教的所有传统。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新印度教即归属于这一派别。

泰戈尔是属于“元始梵社”的。作为一个真挚地爱恋着自己祖国的诗人，他希望将新旧传统中一切好的东西统统地汲取过来，以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处事公正的爱国者。

《戈拉》的创作起因，与一位外国女子不无关系：爱尔兰 104 妇女妮凡迪塔因为笃信印度教教义，成为该教大师韦伽难德的信徒，并于 1898 年来到印度，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女子学校，著书立说向全世界介绍印度文化与印度教。与她相见时，泰戈尔赞赏她的执著信念与无畏的勇气，却因为她那比印度教徒还印度教徒的言谈而不禁微笑。一天，来泰戈尔家中做客的妮凡迪塔留住于什拉依德赫的庄园，晚上，两人对坐在船中，在妮凡迪塔的要求之下，泰戈尔给她讲了一个“戈拉”的故事：

和妮凡迪塔一样，戈拉是一个爱尔兰人。他的生身父母在 1857 年印度独立战争中阵亡后，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家庭收留了这个孤儿，富有爱心、文静娴雅的安南达摩依对待他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长大后的戈拉热情开朗、英俊倜傥，并且严格恪守印度教所有的教义，维护着种姓制度的纯洁，成了印度教的保守主义者。戈拉对印度教极为虔诚，认定印度教是惟一优秀的宗教，只要坚持印度教的崇高原则，那么印度昔日的尊严与繁荣将再次复兴。他不喜欢意见不同的梵社，为此他决心和追求梵社中一个女孩的惟一好友断交，也苦苦压抑着自己对梵社里另一个姑娘的爱。

正在这时，戈拉的养父病重，临终时他透露了戈拉身世的秘密。戈拉顿时感到自己似乎从噩梦中惊醒，因为他是外国人，依照他自己的理论，他比野蛮人还要坏。他没有父母，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连所信仰的神也欺骗了他。正当他的信念土崩瓦解之际，戈拉猛悟到以往坚持的思想完全是谬误和谎言，他彻底清醒了，领会到了宗教的真正意义：在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并没有任何对立，印度的种姓制度也绝不人道。

戈拉以自己崭新的形象，在已焚毁的旧传统、旧事物的烈火 105 焰中获得了新生，正宛如火中涅槃后再生的凤凰，他无限振奋地剖白了自己的心灵：

“——我用那一成不变和不加分析的想法塑造了一个印度，为了把我的信仰完整无缺地保存在那稳如磐石的堡垒里，我一直在跟周围的一切搏斗！今天我所创造的这座堡垒，转眼就像梦一般幻灭了，而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以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广大的真实之中！印度的一切善恶，印度的一切悲欢，印度的一切智慧和愚昧，都毫厘不差地亲切地呈现在我心里。现在我真的有权利为她效劳了，因为真正的劳动

园地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

思想上重获新生的戈拉，终于克服了偏见，成长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心向往为民族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戈拉》这部小说也因为有力地证明了民族运动的出路，在当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可以说，《戈拉》这部小说是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激进派的功与过，给了印度广大人民，尤其是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启发。因为当时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千头万绪，面临许多矛盾，派别也有三种之多。如何才能更冷静、更客观因而也更正确地处理好传统遗产，以及暴力与和平等问题，确实关系到当时那举国上下都参与的民族运动的生死存亡。

第十七章 印度国歌的创作者

痛苦和孤寂的深渊往往最终能给人以深刻的颖悟。在死亡的阴影过后，活着的人们才更能体会生命本身的美好与可贵，因此格外地热爱蓝天、大地，以及那无比广阔而又活跃的生活。

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反而使泰戈尔这段时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心爱的创作活动之中去，并在戏剧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 1908 年至 1911 年间，在他笔下先后诞生了一系列的戏剧佳作——《秋节》《赎罪》《暗室之王》《邮局》和《顽固堡垒》。

1907 年痛失爱子之后，泰戈尔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里的那些孩子们身上似乎又找到了父子之间的快乐与深情。孩子们的童稚纯真的欢愉感染着他那颗诗人的心，给他以欢乐和力量，使得他的心灵创伤渐渐地平复。1908 年他为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写作了剧本《秋节》。这部作品完全是对生活欢乐的颂歌，表达出生命的单纯质朴与相聚的喜悦。

而第二年问世的《赎罪》则拥有一番迥然不同的风采，其间充满着利害冲突与矛盾斗争。《赎罪》是根据泰戈尔最早创作的长篇小说《年轻公主的市场》改编而成的。剧中新增的一个角色，很明显是以圣雄甘地为创作原型的。最感人的是此剧的最后一幕，剧中人解释象征圣雄的那个人之所以退出斗争，绝非对斗争的背弃，而是因为运动的现实背离了他非暴力、不抵抗的初衷。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剧本理解为剧作家对那些非难他退出运动洪流的人的回答。

1911 年，泰戈尔写下了他所有戏剧中最富象征意义，也最具哲理意味的一部——《暗室之王》。而且还应当说，这部剧作也反映了泰戈尔本人在生活中最强烈的一种人生体验，即对那种神的追寻与合一的独特感受。

剧中的国王象征着无限境界里的神灵，而王后则代表向往无限之境的有限中的灵魂。至于王后对国王态度的转变，则蕴含着人们对神灵由不理解到理解的精神历程。

国王生活在一间暗室里，作为神他是无形的，于是别的人虽然可以和他交谈，却不能目睹到他的容颜。暗室之王的面容绝不能以凡俗社会中的美丑标准加以衡量，他是“超于一切的比较之外的”。他坚毅、热情，像一个丈夫般地追求着王后所代表的人类灵魂。然而他又是冷酷的，他不肯走近人们，而是等待人们前来寻找他。

当王后在无灯的卧室里等待着与暗室之王相会时，作为一个凡间的女人，她热烈地渴望着不仅在茫茫的黑暗中，而且在光明之中见到国王的真实面容。最后国王答应现身，他对王后说：“在月圆节期间来找我吧。”

王后在期盼着自己的夙愿得以实现的那一个伟大时刻。然而人类灵魂的净化注定要经历差错与苦难，王后也正是在被这对未知无限世界的强烈向往折磨得坐立不安时，铸成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她真假不辨，由于虚荣和高傲，她错把那“像乳油一般地柔软，与樱花一般的娇弱，如蝴蝶一般的美丽”的假王当做真王了，并把自己的花环交给了他，甚至毫不醒悟地离开了暗室，从而给国家引来了灾难和战争。

当王后最后醒悟时，她的经历使她懂得，她不应被动地等待国王寻

找自己，而应主动地去追寻国王，她不应是国王的王后，而应是他谦逊的奴婢。惟有如此，她才能达到与国王所代表的无限境界的相互合一。所以，她最后对国王说出了这样的告白：

“您的爱生活在我里面——您在这爱里反映了出来，您在我里面看到您面容的反映：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它却是您的，呵，主人！”

《暗室之王》涉及到了有限灵魂与无限境界之间的关系，透过王后的经历，泰戈尔所要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思想——作为人类，为了最终达到与神结合的无限境界，就必须做到谦卑与服从，必须去主动地追寻，而且应当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1911年，泰戈尔又一鼓作气地创作了两个剧本——《邮局》和《顽固堡垒》。虽然两剧的中心人物都是儿童，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邮局》是泰戈尔所有戏剧中最受欢迎的作品，曾经被成功地译介到许多欧洲国家，可以称得上是他最优秀的剧本之一。

小孩子阿马尔是这部剧作的主角。他生了病，可无知的养父却听信了村里庸医的话，认为外面的风、潮气和秋天的太阳对这个病孩有害，于是便将他关在一间小屋里。苦闷而又孤独的阿马尔，只得倚着小屋的小窗子望着那外面的天地，那里挤奶人、更夫来来往往地忙碌着，孩子们快乐地嬉戏着，阿马尔和更夫、挤奶人、老爷爷和卖花小女孩苏塔交谈着，在他们单调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浪漫的诗意。他羡慕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以他纯真的欢乐感染着周围的人们。

然而有一天，更夫告诉他，从阿马尔的窗即可望得见的那栋白色的新楼房是邮局，说不定邮局的人哪天会来看他，并交给他一封国王写给他的信。从此以后，阿马尔便不再幻想偷跑出家门去四处游玩，而是日夜盼望着邮递员带着国王写的信来找他。病体沉重的阿马尔虽然无法走到窗前，但仍在病床上期待邮递员的到来。

一位善良的老人安慰阿马尔，信大约已在路上了，小阿马尔希望自己养好病，下床去迎接邮递员，但是可怜的小男孩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进入了长眠之乡。这时他的好朋友、卖花的小女孩苏塔来看他，以为他是睡着了，于是便告诉医生，等阿马尔醒来之后把自己的一句悄悄话转告给他，好心的女孩这样说：“告诉他，苏塔没有忘记他。”

对于《邮局》这部剧作的深层寓意，人们曾作出了多种推测，有人以为泰戈尔是借它传达了人在精神上对自由的渴望。而且，幼年时泰戈尔那深受禁锢的体验在阿马尔身上也有着清晰的影子。

正是出于这对自由的希冀，使得阿马尔梦想着飘泊在宽广的空间里。他的心向往宽阔的草原、蟋蟀鸣叫的小路，有着只歌唱却不飞翔的鸚鵡的荒无人烟的鸚鵡岛。阿马尔对遥远世界的热爱，说明他希望了解未曾见到的广阔世界，而这个支撑着阿马尔的自由之梦，却以一种恬静安宁的心境表现出来。即使是说起他翘首以盼望收到的国王的信时，他仍如此描绘着自己的感受：

“自从国王的邮局设在那里以后，我就越来越喜欢在屋子里呆着了。我一想到有一天我会接到一封信，心里就觉得很快乐，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也不在乎了。”

泰戈尔曾这样理解过阿马尔这个形象：他认为阿马尔代表那个灵魂

接受了宽阔道路召唤的人，因此他渴望从习惯势力和僵死观念的围墙中寻找自由。

在《邮局》中对自由的热烈追求最终表现为宁静和平的情感，而语言朴实无华又自然有致的韵味，更给全剧以动人的艺术美。还有一位评论家曾赞扬《邮局》的成就是连莎士比亚和迦梨陀娑都做不到的，因为它成功地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既不卖乖弄巧又不愚昧无知的儿童形象。

与《邮局》同年写成的第二个剧本是《顽固堡垒》，这是一部喜剧。它以辛辣的讽刺笔调嘲笑了那些自高自大、拒绝变革的顽固的保守主义者。

剧中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名叫般查克的幼童。他听从以正统派自居的大哥的安排，被关在一座奉行保守主义的学院（那“顽固堡垒”）里，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责备天生好奇、爱好唱歌而又喜欢快乐的小般查克。为此，小孩子常寻机逃跑到附近的农民、工人和低种姓的人们那儿去，与纯朴、辛劳而又热爱生活的人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后来，一位大师来了，他领着一批低种姓的贱民们踏平了这座顽固堡垒的高墙，小孩子般查克的愿望最终实现了。

如果说在 20 世纪初期，泰戈尔的戏剧创作是繁花盛开的景况，那么，泰戈尔也始终没有忘情于他的抒情诗写作，就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部极为美妙的诗集——《吉檀迦利》。

新世纪开始的前 10 年中，诗人承受了来自家庭和外界的许多悲苦、死别与侮蔑、责难，在孤寂与郁闷侵袭着他的时候，他的心灵对神与宗教的洞察更多也更投入；而且，他往往将宗教的各种感受融入到他的抒情诗那绝美的诗句之中。

1909 年到 1910 年的泰戈尔写下了一大批有着浓厚神秘与宗教气息的抒情诗，共有 157 首，于 1910 年以《吉檀迦利》为题名出版。后来，泰戈尔从这 157 首诗中又摘出 51 首，辑入他的英译诗集《吉檀迦利》中，并且诗人也就是以这部蜚声海内外的作品，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获得了人类文学的最高奖——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这部译为英文的诗集，我们下一章再作探讨。

在孟加拉文原作中，《吉檀迦利》的第一首诗歌就表达了诗人的心声。诗人不愿用自己的业绩赞美自己，而是盼望神主以神自身的心愿来充实他的生活：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就是说我所看过的是单纯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花的莲花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都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

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了——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

应当说，对神与人类的爱，使得诗人在痛苦和死亡来临时也觉得是快乐的。这首诗所体现的思想也恰恰是《吉檀迦利》这部诗集的总体精神。由于诗人经过长期的思索，又将对神和对尘世天真无邪的感情，以

动人心扉的言辞表达得优美而崇高，因此，这一切都使得诗集中的篇章具备了最平凡、最感人，也最永恒的艺术魅力。

小说、戏剧和诗歌的丰收，并不能证明泰戈尔已然放弃了对民族解放的支持与关注，他仍然热烈地期待着印度的人民能够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一同致力于祖国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的事业。1911年，他依照这一精神谱写了一首名为《印度命运的创造者》的歌，并将它献给那一年圣雄甘地召开的国大党第二十六次会议，号召印度各民族、各教派的人们早日觉醒，为祖国的统一而团结一致，共同战斗。

你是一切人心的统治者，
你印度命运的付与者。
你的名字激起了
旁遮普，辛德，古古拉特和马拉塔，
达罗毗荼，奥利萨和孟加拉人的心。
它在文底耶和喜马拉雅山中起着回响，
掺杂在朱木拿河和恒河的音乐中，
被印度洋的波涛歌颂着。
他们祈求你的祝福，歌唱你的赞颂，
你印度命运的付与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在歌曲的末一节中，诗人以更深沉的感情吟咏道：

夜渐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群鸟歌唱，晨风带来了新生的兴奋。
承受了你爱的金光的摩抚。
印度苏醒起来，低头伏在你的脚前。
你万王之王，
你印度命运的付与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这首歌曲是那么激动人心，又是那么坚强有力，所以它很快就传唱开来，并且在印度独立之后，这首歌就被定为印度神圣的国歌。

1911年这年，泰戈尔已走进了他生命中的第五十个年头。回顾过去那多姿多彩的创作生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展望未来的图景，他抚今追昔，写下了记载他童年到少年成长历程的《回忆录》。

该书共有八个部分，但并非全按时间顺序记述。泰戈尔自己曾这样说，回忆录更像是艺术家最原始的创作，因为随着时光流逝，以往的图景的线条已经模糊，而许多的颜色也由一种心灵的冲动所浸染。因此，作者刻在自我心扉上的画面，虽与原初的生活有颇多的联系，但也绝非往日实际生活事件原封不动的再现。

《回忆录》充满意趣盎然的童年情怀，从中亦可以见出诗人的思想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轨迹。文笔非常风趣，而且情真意切，捧读时常令人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并会引起我们会心的微笑。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

作！

第十八章 诺贝尔文学奖

当泰戈尔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之际，他创作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开始使得孟加拉人逐渐地意识到：他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于是，孟加拉文学界为弥补以往对这位诗人的忽视，于 1911 年的 5 月 28 日，在孟加拉文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孟加拉知识界为泰戈尔的 50 寿辰举行了热烈而又隆重的庆祝会。

这是一次空前的祝寿宴会。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位印度的文学家获得如此的殊荣和如此广泛的赞誉。泰戈尔本人所坚持创办的桑地尼克坦学校和该校高尚、人道的教育制度，也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热情赞许和高度评价。

在此之前，泰戈尔决定去欧洲，将他在桑地尼克坦办学的理想告诉那里的人们，同时顺便学习丹麦农业中的联合耕耘技术。他还准备接受英国一些朋友们的邀请，想去英国会见罗森斯坦等人，因为他们对他的艺术作品很感兴趣。1912 年 3 月，他做好了旅行的一切准备工作，却因突然病倒，未能成行。

为了休养，泰戈尔来到帕德玛河边名叫西来达的家族领地。那里有着明媚的阳光和柔和的轻风，芒果花苞的芳香沁人心脾，鸟儿终日的啼啭令人心醉，在他恢复体力的那段日子里，美好的大自然唤醒了他心中欢愉的情绪，他在那些日子里写下了许多诗歌。

这些诗中，有的表达出他因旅行意外中断而感到的郁闷沮丧，其中还有一首离别诗：

我已获得了假期。
弟兄们，高兴地祝愿我一帆风顺！
今天我向你们鞠躬启程。

不过，诗作中更多的则是唱给他心中的神灵的，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你已经使我永生，
这样做是你的欢乐。
这脆薄的杯儿，
你不断地把它倒空，
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
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
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按抚下，
我的小小的心，

威廉·罗森斯坦爵士，英国画家，1910 年曾访问印度，他是最早在欧洲宣传泰戈尔的人，著有《人们和回忆》（1900—1922）等作品。

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
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
时代过去了，
你还在倾注，
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诗人将这些诗歌定名为《歌之花环》，于 1914 年出版，后来还将其中的 17 首抒情诗收入了英译的《吉檀迦利》诗集。在创作新诗的同时，泰戈尔又将自己的某些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了英文，着手编辑一部英文诗集，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吉檀迦利》。

健康恢复了之后，同年 5 月，他和儿子、儿媳同行前往英国。抵达伦敦之后，泰戈尔给自己的英国朋友、当时任伦敦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的威廉·罗森斯坦，看了一些自己翻译的诗稿。罗森斯坦当晚展读诗文时，被深深吸引住了，于是请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安德鲁·布拉德过目，二人一致认为：“看来一位伟大的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兴奋不已的罗森斯坦又写信将泰戈尔的诗稿寄给了当时英国的大诗人叶芝，叶芝也同样禁不住对诗篇的清新魅力、柔和色彩以及新颖的韵律赞不绝口。

随后，热情的罗森斯坦在自己的家中举办了泰戈尔的诗歌朗诵会，邀请一些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参加。泰戈尔展现的质朴纯净而又宁和的东方美震撼了每个人的心。也是在这次小型晚会上，泰戈尔与安德鲁斯相识了。安德鲁斯不久也参加了桑地尼克坦的工作，并成为诗人终生的朋友。

《吉檀迦利》得到了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学者、诗人、评论家们的赞誉，美国的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也成了它的热爱者。英国最大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1911 年 11 月，《吉檀迦利》在伦敦出版，先由“印度学会”付印，后来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又出版了一个普及本。诗集的出版在印度和英国引起轰动，西方的读者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位在无限的宇宙前，有着素朴无华的姿态、孩童般的纯真和圣者般高洁的形象的东方诗人。

“吉檀迦利”的意思是奉献，因此这部诗集又名《献诗》。就主题而言，《吉檀迦利》是《渡河》的继续，诗人仍在追求神的境界，奉献自己的敬意和虔诚，并且把自己在《奉献集》中表现的谦卑忍让的心情表达得更深刻。他希望自己涤净虚荣、骄傲、卑鄙之心，渴望达到神的境界：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 7 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

的生命，启程到它永久的故乡。

泰戈尔心目中的神，是宇宙的原初存在，这个无限的精神无所不在，没有形迹，它存在于有限的万物之上。作为人，能够在体验中像感觉光一样感觉到神的存在。而人的一生就是超越有限，对无限的寻求的过程，只有人与无限的神合二为一，才能获得最终的美满与喜悦。

凭着顽强的意志，泰戈尔热烈地盼望与神合一。有时，他似乎感到神已离他近在咫尺，甚至透过他的目光、耳朵与心灵来观察和感觉这个世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它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尽管《吉檀迦利》表达了要求与神统一的热切愿望，尽管诗集中不乏多样的艺术形式与丰富的内容，但是它最终给人的印象仍是一种和谐安宁的美好的静谧气氛，诗人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充盈着美与爱：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丽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着安宁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

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正是由于这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富于想象的优美境界以及天然去雕饰的风格，使得久已生活在生存的烦恼、城市的喧嚣、商品化的人际关系和粗糙的文学作品之中的西方人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为他们带来了轻柔含蕴的东方古国的清新之气，这无疑也是这部诗集获得世界性声誉的重要原因。

像泰戈尔家族中的所有男子一样，泰戈尔的身材也十分高大，而且相貌堂堂。英国画家罗森斯坦曾赞美他有着十分漂亮的身材。泰戈尔身着洁白的衬衣和长裤，带着印度人的头巾，异常俊美的仪表和他巨大的内在精神美互相映衬，可以说一当他出现在伦敦这个欧洲城市，人们便认为他本人就是东方智慧的化身。

在英国伦敦停留的四个月中，泰戈尔先后会见了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高尔斯华绥和诗人梅斯菲尔德、布里吉斯等文艺界名人。他那庄严而又潇洒迷人的风采，安详的言谈中流露出睿智的哲理，给所有与他相处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2年10月，泰戈尔和儿子儿媳共同赴美，为了让儿子写好伊利诺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他先后在阿本纳小住了数月。此间，泰戈尔第一次尝试用英文来写作论文，并以此为依据在哈佛大学等处演讲。不久《吉

檀迦利》在英国的出版引起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士们广泛的关注，于是各种请帖纷沓而至。1913年1月，诗人来到了芝加哥，作了题为《印度古代文明之理想》和《恶的问题》的讲演；后又抵达洛兹斯坦，在宗教自由大会上做了《种族冲突》的演讲；最后访问了纽约。泰戈尔在美国所写的讲演稿后来集为《生活的实现》（或译《实践》）出版。

1913年4月，泰戈尔自美国返回伦敦，并做了一系列的报告。

1912年到1913年，是泰戈尔真正走向世界的一年。以往默默无闻的他，现在已成为声名遐迩的诗人。1913年9月，他载誉而归。然而最高的荣誉还未来临。两个月之后，即同年11月13日，泰戈尔以《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了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诺贝尔文学奖是全世界最高的文学奖，泰戈尔的获奖，标志着他的作品已得到了世界性的声誉。亚洲人获得这项文学巨奖，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然而泰戈尔的获奖也有一番来历。率先提名的是英国作家穆尔。他以英国皇家文学协会成员的身份，建议授予泰戈尔这项全球最高的文学奖。这件事在瑞典科学院评选委员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由于几名热情的支持者的宣传，使泰戈尔在委员会的全票15票中以13票获选。这充分证明了泰戈尔已创造了一个令西方社会万众瞩目的东方奇迹。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至桑地尼克坦时，学校的孩童们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泰戈尔自己无疑也非常激动。但是在印度全国兴奋的反响中也夹杂着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比如惊讶，比如并非发自内心的赞扬等。

应当承认，泰戈尔的文学天才和文学成就很久以来一直在印度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语言与纯正的孟加拉文相去甚远。然而一当西方人将文学最高奖授予泰戈尔之后，不少崇洋媚外的人却一反常态，无耻地狂热地对诗人加以奉承，很多不认识他也未读过他作品的人，也高声赞美泰戈尔对孟加拉语言文学的贡献。

泰戈尔感到自己的心被这些真实的谎言蒙上了耻辱，他在那些雪片般飞来并非出自真心的贺信与贺电中，只发现了不真实的爱。因此获奖5天之后，他在写给罗森斯坦的信中将此次获奖比作一场更加艰巨的考验。而公众兴奋的汹涌浪潮对他来说，是那样的不幸。在那真情的欣赏中也夹杂着许多起哄的嘈杂，泰戈尔为这些嘈杂与不真实的举止而感到异常震骇，他痛苦地看到：许多人不是为他本身的创作成就，而是因为他所获得的荣誉而尊敬他。

也正因为如此，11月下旬，当不同职业的500名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从加尔各答乘坐特别快车来到和平之乡向诗人致以全国性的祝贺时，泰戈尔这位诗人以诗的语言予以严峻的回答，拒绝接受他们的礼赞。

面对荣誉、奖励、鲜花和欢呼，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依然以真诚的心、清醒的头脑保持着自己的理智，他没有被掌声冲昏头脑，而是不卑不亢、温和而执拗地只接受来自自己真心朋友们的爱和赞扬。

1913年的年底，加尔各答大学在一个特别的仪式中，授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名誉文学博士的称号。

第十九章 《园丁集》和《新月集》

1913年是泰戈尔获得世界声誉的一年，他的作品从此几乎走向了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频繁的社会活动使他的创作精力减少了，因此这一年也是他十年来没有出版过一部孟加拉语作品的一年。

不过，伦敦却在这一年出版了泰戈尔的英文译作——《园丁集》和《新月集》，这两部作品如同《吉檀迦利》一样，也为他带来了荣誉。

《园丁集》一共收有85首诗，除了从《渡河》集中收入一些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诗作外，多数选自泰戈尔早年的《刚与柔》、《收获节》和《心中的向往》等作品集。而且诗篇的内容多是有关人生与爱情的，故而整部诗集的情调既轻快又欢愉。

《园丁集》中的爱情诗将人间这种美好的感情，做了种种细腻动人的描述。有一首这样惟妙惟肖地抒写一个单恋的人儿的心理：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深的话语，
我不敢，我怕你哂笑。
因此我嘲笑自己，把我的秘密在玩笑中打碎。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轻松，因为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真的话语，
我不敢，我怕你不信。
因此我弄真成假，说出和我的真心相反的话。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可笑，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用最宝贵的名词来形容你，我不敢，我怕得不到相当的酬报。
因此我给你安上苛刻的名字，而夸示我的硬骨。
我伤害你，因为怕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渴望静默地坐在你的身旁，我不敢，怕我的心会跳到我的唇上。
因此我轻松地说东道西，把我的心藏在语言的后面。
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渴望从你身边走开，我不敢，怕你看出我的怯懦。
因此我随随便便地昂首走到你的面前。
从你的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使我的痛苦永远新鲜。

有的诗篇中泰戈尔以女人自况，描写她们欲爱还羞的微妙心理，如：

他低声说，“我爱，抬起眼睛吧。”
我严厉地责骂他，说，“走！”但是他不动。
他站在我面前拉住我的双手。我说：“躲开我！”但是他没有走。

他把脸靠近我的耳边。我瞪他一眼说：“不要脸！”但是他没有动。
他的嘴唇触到我的腮颊。我震颤了说：“你太大胆了！”但是他不怕丑。
他把一朵花插在我发上。我说：“这也没有用处！”但是他站着不动。
他取下我的颈上的花环就走开了。我哭了，问我的心说：“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诗中还描绘了诗人在梦境中对爱的寻求，带着些许感伤的色彩：

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我去寻找我前生的爱。

她的房子是在冷静的街尾。

在晚风中，她爱养的孔雀在架上昏睡，

鸽子在自己的角落里沉默着。

她把灯放在门边，站在我的面前。

她抬起一双大眼睛望着我的脸，无言地问说：“你好么，我的朋友？”

我想回答，但是我们的语言迷失而又忘却了。

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我们叫什么名字。

眼泪在她眼中闪光，她向我伸出右手。我把握住她的手静默地站着。

我们的灯在晚风中颤摇着熄灭了。

虽然诗集中有些篇章涉及了爱的分离，还描写了“死亡”的游戏，以及诗人将自己比作死亡的新嫁娘等。但是总的来说，《园丁集》里反映了诗人及时行乐，感受人间的主张。其中有一篇作品酷似民歌风味，情调明朗而愉悦，一唱三叹，令人击节称妙：

黄鸟在自己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喜舞。

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林子里，这是我们的一份快乐。

她心爱的一对小羊，到我的园林的树荫下吃草。

它们若走进我的麦地，我就把它们抱在臂里。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块田地。

在我们树里做窝的蜜蜂，飞到他们村中采蜜。

从他们渡头阶上流来的落花，漂到我们洗澡的池塘里。

一筐一筐的红花干从他们地里送到我们的集市上。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到她家去的那条曲巷，春天充满了芒果的花香。

他们亚麻子收获的时候，我们地里的蓖麻正在开放。

在他们房上微笑的星辰，送给我们以同样的闪亮。

在他们水槽里满溢的雨水，也使我们迎春树林喜乐。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园丁集》中，除开温柔悱恻的爱情诗之外，还有对大地母亲和广大劳动者们的礼赞诗，发人深省的哲理诗等，而且风格各异，有的妙趣横生，有的奔放热烈，有的沉静平和，有的缠绵婉约，但无一不情真意

切，令人回味悠长。

《园丁集》是爱的颂歌，而《新月集》则是献给孩子们的深情的小夜曲。同是 1913 年出版的《新月集》共收录了 37 首儿童诗，其中大半择自 10 年前的孟加拉文集《孩子们》，小部分是在编译之时诗人刚刚创作的新作。

泰戈尔终生热爱儿童，关心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童年是人生的一个美妙的时期，西方的一位著名的诗人曾意味深长地追忆道：童年，犹在天堂。泰戈尔以他一颗童稚的心描绘了印度儿童的天真烂漫。

在《新月集》几首优美的诗篇中，诗人试图揭示婴孩到达人世的奇异与神秘。那篇《开始》即以别具一格的诗意的想象和对女性心理的深刻把握而著称于世：

我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把我捡起来的？”孩子问他的妈妈说。

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半哭半笑地答道——

你曾被当作我的心愿藏在我心里，我的宝贝。

你曾存在于我孩童时代玩的泥娃娃身上，每天早晨，我用泥土塑造我的神像，那时我反复地塑了又捏碎了的就是你。

你曾和我们的家庭的守护神一同受到祀奉，我崇拜家神时也就崇拜了你。

你曾活在我所有的希望和爱情里，活在我的生命里，我母亲的生命里。

在主宰着我们的家庭的不死的精灵的膝上，你已经被抚育了好多代了。

在我做女孩子的时候，我的心的花瓣儿张开，你就像一股花香似的散发出来。

你的软软的温柔，在我青春的肢体上开花了，像太阳出来之前的天空的一片曙光。

上天的第一宠儿，晨曦的孪生兄弟，你从世界的生命的溪流浮泛而下，终于停泊在我的心头。

当我凝视你的脸蛋儿的时候，神秘之感湮没了我；你这属于一切人的，竟成了我的。

为了怕失掉你，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是什么魔术把这世界的宝贝吸引到我这双纤小的手臂里来呢？

而那纯洁无瑕的幼儿的降生，使得诗人的胸中涌出珍贵的祝福了：

祝福这个小心灵，这个洁白的灵魂，他为我们的大地，赢得了天的接吻。

他爱日光，他爱见他妈妈的脸。

他没有学会厌恶尘土而渴求黄金。

紧抱他在你心里，并且祝福他。

……

不要辜负他的信任，引导他到正路，并且祝福他。

把你的手按在我的头上，祈求着：底下的波涛虽然险恶，然而从上面来的风，会鼓起他的船帆，送他到和平的港口上的。

不要在忙碌中把他忘了，让他来到你的心里，并且祝福他。

儿童的依恋母亲，天性如此。母爱的宝贵胜于世间的一切。这种幼儿恋母的感情在《孩童之道》这首诗中表现得那么美妙：

只要孩子愿意，他此刻便可以飞上天去。
他所以不离开我们，并不是没有原故。
他爱把他的头倚在妈妈的胸前，他即使一刻不见她，也是不行的。

孩子知道各式各样的聪明话，虽然世间的人很少懂得这些话的意义。
他所以永不想说，并不是没有原故。
他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学习从妈妈的嘴唇里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所以看来这样天真的原故。

孩子有成堆的黄金和珠子，但是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像一个乞丐。
他所以这样假装了来，并不是没有原故。
这个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便是想要乞求妈妈的爱的财富。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
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并不是没有原故。
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的一隅里，被妈妈的亲爱的手臂所拥抱，其甜美远胜自由。

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他所以要流泪，并不是没有原故。

在《恶邮差》这首诗中，幼小的孩子热爱着他的母亲，当看到妈妈因为没有接到爸爸的信而伤心时，他决心替爸爸来写信，而且不经过那个“恶邮差”，径直把信送到妈妈的手里去。他还要幻想做一个卫护母亲的英雄，以无穷的神力把一伙坏人打得落花流水。

孩子是单纯的，他想象与大自然结为奇特的伙伴，他想变为一朵金色花去与母亲捉迷藏。诗中童趣盎然：

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哈哈地在风中摇摆，又在树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

她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

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树荫，走到祷告的小庭院时，你嗅到了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我身上来的。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的小孩子的小影子么？

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个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童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因为孩子们还不熟悉生活，故而对生活有神秘和奇异的感觉，所以孩子们的催眠曲中就常有关于神仙鬼怪的故事，也常有那遥远明亮而又亲切迷人的新月。在读过《神仙世界》和《纸船》之后，我们就会更清楚地感受到：孩子的美之所以是那样动人，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梦幻仙女所创造的。

孩子们的世界与成人世界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并不在乎利害得失，也不理会世俗的种种欲望。在《玩具》一诗中，诗人就真诚地羡慕着孩童们的这种快乐。

在《新月集》其他的一些诗篇中，有着许多儿童所特有的情趣。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和笼中的鹦鹉、向妈妈乞食的顽皮的小狗看作同一类生命。《著作家》一诗中，小孩子认为爸爸写了又写，实在没有趣味。他天真地以为，自己的胡涂乱写跟爸爸的写作是一回事，因此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用了纸做小船，妈妈便说自己讨厌，而爸爸却可以任意地用墨点涂满许多纸的两面。

长大后的孩子不情愿去读书也不愿受到拘束，他希望自己是个小贩，或是园丁，或是更夫，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人来阻挡自己（《职业》）；《小大人》一诗中，儿童盼望自己早日长大，好像爸爸一样可以不去读功课，可以独自一个人到市场里去，也可以随便地把钱给自己所喜欢的人。小孩子还希望自己成为注意的焦点，成为有尊严的大人。可是在《长者》中，他想教妹妹读书，书页却被她撕掉，他想冒充老师和父亲的权威，却只被妹妹当做可以放肆地与她讲话的哥哥。

孩童的心是那样拙朴、稚嫩而又纯洁、高贵，所以诗人泰戈尔在《最后的买卖》一诗中，决心为着使自己成为自由之人，而决不肯被皇帝的权力、老人的金钱与美人的微笑所雇用，却心甘情愿地为一无所有的玩贝壳的孩子所雇用。

在《赠品》的开篇，诗人这样深情地写道：

我要送些东西给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同是漂泊在世界的溪流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也将被忘记。
但我却没有那样傻，希望能用我的赠品来买你的心。
你的生命已是青春，你的道路也长着呢，你一口气饮尽了我们带给你的爱，便回身离开我们跑了。

……

的确，在为孩子们献上的诗歌中间，泰戈尔的《新月集》将永远是一份异常美丽的赠品。

受着日本短诗俳句的影响，泰戈尔还创作了一些诗行极少的短诗，后来集成一册《飞鸟集》。其中一些是他所作孟加拉短诗的英译，一些则以英文写成，《飞鸟集》的诞生再次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

《飞鸟集》中仅三两行的短诗无不闪现着哲理、情感、体验的光彩，可以说，几乎每一首小诗都给人以独特的、引人入胜的感觉。

在诗人的眼中，许多本无生命的大自然景象也有了生命，诗人将人性注入了自然：

群树如表示大地的愿望似的，踮起脚来向天空窥望。（第 41 首）

阴影戴上她的面幕，秘密地、温顺地，用她的沉默的爱的脚步，跟在“光”后边。（第 47 首）

绿草求她地上的伴侣。

树木求他天空的寂寞。（第 78 首）

有的诗以对话的形式出现：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是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第 86 首）

权势对世界说道：“你是我的。”

世界便把权势囚禁在她的宝座下面。

爱情对世界道：“我是你的。”

世界便给予爱情以在她的屋内来往的自由。（第 93 首）

小花问道：“我要怎样地对你唱，怎样地崇拜你呢，太阳呀？”

太阳答道：“只要用你的纯洁的素朴的沉默。”（第 247 首）

有的赞颂着神：

那些有一切东西而没有您的人，我的上帝，在讥笑着那些没有别的东西而只有您的人呢。（第 226 首）

神的巨大的威权是在柔和的微风里，而不在狂风暴雨之中。（第 151 首）

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带来信息说：神对人并未灰心失望。（第 77 首）

泰戈尔以他诗人的慧眼，在大自然中那些表面看似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中发现着隐密的意义，并且由于这些意义是源于人类的生命，这便使得或明或隐的感受美妙地结合起来，给人以强烈而独特的印象：

今天晚上棕叶在嚶嚶地作响，海上有大浪，满月呵，就像世界在心脉悸跳。从什么不可知的天空，您在您的沉默里带来了爱的痛苦的秘密？（第 302 首）

道旁的青草爱那天上的星吧，你的梦境便可以在花朵里实现了。（第 260 首）

白云谦逊地站在天之一隅，

晨光给它戴上了霞彩。（第 100 首）

创造的秘密，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不过如晨间之

雾。（第 14 首）

诗人观察着鲜花，昆虫、小鸟与浮云，在它们身上找到了奇异的价值，于是将惊奇的感受凝炼为警句：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第 82 首）

采着花瓣时，得不到花的美丽。（第 154 首）

萤火对天上的星说道：“学者说你的光明，总有一天会消灭的”。

天上的星不回答它。（第 163 首）

杯中的水是光辉的；海中的水却是黑色的。

小理可以用文字来说清楚；大理却只有沉默。（第 176 首）

诗人还对世界和平的终将来临作出了某种预言：

权势以它的恶行自夸，落下的黄叶与浮游云片却 15 首）

人类的历史很忍耐地在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第 316 首）

总的说来，《飞鸟集》是以碎金缀银的形式出现的、溢光流彩的诗之集合。

第二十章 为祖国祈祷

1917年3月，正是生命力蓬勃的春季，泰戈尔结束近一年的国外游访，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此时他看到的是一场新的民族解放运动业已在国内酝酿成熟的景象，青年们正准备为祖国的权力和自由献出鲜血以至生命。

当时，有一位同情印度人民斗争的英国妇女阿尼·贝赞特夫人，勇敢地代表印度发出了自治的高昂呼声，结果她被马德拉斯邦的政府监禁。泰戈尔敬仰她伟大崇高的品德，于是公开发表声明，抗议拘捕这位英国女士，并组织了为营救她而举办的群众抗议运动。从此，他再次步入了政治舞台。

目睹祖国同胞们轰轰烈烈的爱国浪潮，诗人不再保持沉默。在加尔各答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备受公众瞩目的他，用自己刚刚创作的爱国的民族歌曲打动了每位听众的心：

你的召唤正越世上所有的国家
人们都聚集在你的座前。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还是藏起来，拖在后面么？
让她背起她的负担和大家一同前进吧。
传给她，万能的上帝，你的胜利的消息，
呵，永远觉醒的主！

革命的形势激起泰戈尔火一般的创作热情。这年年末，印度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一年一度的国民大会，在开幕那天，泰戈尔登台朗诵了他创作的名为《印度的祈祷》的著名长诗，诗中这样为祖国祈祷着：

让这个作为我们对你们的祈求吧——
给我们力量去反抗逸乐，在它奴役我们的时候。
向你举起我们的忧伤如同夏天把握它的中午的太阳。
使我们坚强，使得我们不去嘲侮那软弱和跌倒的人，
使我们当周围一切都向尘土献媚的时候高举我们的爱。
他们为自爱而争斗杀戮，却把名义归给你，
他们为争吃弟兄的肉而哄斗，
他们和你的义怒争战到死。
但是让我们牢稳地站住坚强地忍受，
为着真，为着善，为着人的永存性，
为着你的在人心合一中的天国，
为着那灵魂的自由。

这铿锵有力的诗句和内蕴的坚强的信念，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所有政界领袖向他致敬，欢呼。

1918年，俄国十月的胜利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大潮推动着印度民

族解放运动的展开，印度再次出现了紧张局势。本已转入地下的孟加拉青年爱国者们采取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而此时的英国，由于美国的参战，在欧洲战场上势如破竹，信心正旺，于是英国驻印度政府便对印度爱国者进行了严酷的镇压。

泰戈尔坚持认为，即便是为着合理的爱国的目的，也不应采取过激的暴力主义与恐怖主义。因为为镇压暴力需要倚仗暴力，而为平息仇恨会导致更多的仇恨，他痛恨以刀斧去开启野蛮之锁，于是公开表示反对暴力。因此，诗人与爱国者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尽管如此，对遭到英国政府镇压的勇敢青年们经受的惨无人道的折磨，泰戈尔绝不会无动于衷，置之不管。满怀人道主义精神的他，在自己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仍旧想尽了方法力图营救被捕的爱国志士。不过，与革命者们主张的不同使他的心情紧张而且烦闷，以至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身心的疲乏增添了他的重负，而他最宠爱的大女儿贝拉又于当年5月不幸病重而亡，更使他的情绪极其低落。巨大的痛苦又促使他拿起心爱的笔继续进行创作。

虽然教育和政治活动使得泰戈尔十分忙碌，但他在这段时间里写出了一部重要的孟加拉文学作品——故事诗集《难获之物》。

以诗文写就的故事《难获之物》，以朴素、自由又坦率的诗风和起伏跌宕的情节引人入胜。故事尽是生活中的悲剧，主人公多与拘束在闺阁中的女子相关。

一个婚后任劳任怨20余年，却不幸未及中年就病重的临终妇女的独白，构成了《解脱》的内容，此外还有一则打动人心的故事《欺骗》：23岁时就身染绝症的妻子，听从医生易地休养的建议，与丈夫一同外出旅游。常年累月身系闺阁的她，在途中的一个车站上，为搬运工人妻子讲述的悲惨际遇所打动，请求自己的丈夫赠给那女人25个卢比。丈夫答应了，然而实际上他只给了两卢比。两月之后，妻子弥留之际，为丈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是曾为满足她的请求，慷慨地赠钱给那陌生的女子的事，十分感激他。妻子去世了，丈夫的良心却极为不安，于是归途之中，他又来到了那个车站，想弥补这个过错，却发现搬运工人的妻子早已无处可寻。他只有带着心上永久的遗憾离开了那里。

1919年3月，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通过了所谓的“维持治安法案”，即臭名远扬的“罗拉特法案”，它规定政府拥有不经起诉即可逮捕人的权力，还规定警察有权制止公众集会。法案的颁布引起了印度全国上下一片抗议之声。阿姆利则群众集会、示威与罢工此伏彼起。4月13日，正当群众在查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抗议集会之际，军队向两万名手无寸铁的参加者开枪射击达10分钟之久，人们无处逃生。大屠杀中死亡1000多人，受伤2000余人。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殖民当局严格禁止新闻报道，妄图掩盖事实真相。几周之后，惨案的消息才得以传出。泰戈尔惊悉之后，万分不安，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赶到加尔各答，希望能约请各界人士举行抗议集会。然而，人们慑于新颁布的“罗拉特法案”的威胁，无人敢起来响应。万般无奈的他毅然单独采取了行动。

1919年5月29日深夜，他事前未向任何人透露，甚至连自己的儿子

也没有告诉，就写信给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声明放弃英国政府于 1911 年授予他的爵位。信中沉痛而恳切地写道：

……我为我的国家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自己把这一切结果全部承担起来，把数百万吓得目瞪口呆的同胞的抗议表达出来。已经是时候了，荣誉奖章使所受的屈辱摆在一起就会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因此，我要去掉一切特殊荣誉，站在我的同胞一边。他们据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应该接受那种同人类这个称呼不相称的待遇。由于上述理由，我不得不遗憾地请求阁下取消我的爵士称号……

这封信于几天之后得以发表。泰戈尔在当时高压政策下的这一英勇举动给了同胞们极大的精神鼓励与声援，并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在英国统治者看来，这种行为不能原谅，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一个人敢于拒绝英王陛下所授予的荣誉称号，故而英国官方感到极其愤慨。

为了建立一所国际性的大学，泰戈尔本来打算 1919 年前往日本和美国以期筹款，后来未能成行。于是他开始在祖国各地旅行：先在南印度广泛游历，并在其中的一些城市宣讲他的教育理想；随后他又前往印度西部漫游，而且曾在阿赫姆巴德担任古甲拉特文学大会的主席；并且他还在他新建的别墅里，与圣雄甘地会见，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

1919 年 6 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 作为和平运动领导者，认为泰戈尔是他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于是便寄信给诗人，邀请他在《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这一宣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罗曼·罗兰代表欧洲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起草的，旨在号召各国的知识界人士团结起来，为着消除各种形式的偏见而努力，并呼吁世界各国知名人士签名。一向坚持为保卫和平与自由而大声疾呼的泰戈尔，在这份宣言书上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1919 年泰戈尔创作了孟加拉文的《小品文》，这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作品均以散文体裁写就，然而因为出自诗人之手，便充盈了优美的诗意。不过文章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有些是描绘式的，有的则侧重叙事；有些表达了哲理，有的则偏于讽刺，其间更有回忆性的美文。

小品《鸚鵡的故事》别具一格，它借鸟喻人，揭露了呆板教育制度对学生的伤害：生性喜欢唱歌和游戏的鸚鵡，被大臣们关进鸟笼，不给水 and 米，只给它从书中撕下的成堆的纸片。可怜的鸟儿最终郁郁而死，肚子里盛满了腐烂的纸片。这篇讽刺的小品文实在写得精彩，它栩栩如生地传达出作者尊重儿童天性的的心声。另一篇《马儿的灾难》亦是意蕴深长：陷入自私泥淖的人类想让所有的生物都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神明警告人类释放马儿，威胁说不然就要赋予马儿以老虎般的牙齿和爪子。人则依靠雄辩说服了梵天，而且声明是为着那些马儿自身的利益，人类才不得已发明了棍子。这则故事实际上也是通过对马儿考验的描述，揭示出对人的考验。除此之外，《老人的幽灵》则讽刺那些骑在现代的肩膀上，却一味迷恋往昔，并对于民族文明的变化生出无可名状的恐惧的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杰出作家，著有《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作品，1915 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人们。

1920年5月15日，泰戈尔与儿子和儿媳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抵达英国之后，他受到新老朋友的欢迎。这次他所遇到的老朋友中有肖伯纳，两人相见十分高兴。他还为结交了新的友人感到兴奋。虽然在英国泰戈尔并没有遭遇到公开的敌意。但是显而易见，以前对他所怀有的热情已经淡漠。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无数变故发生：他对战争的谴责，他曾写的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短评，最重要的是他对“爵士”称号的放弃，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种意味深长的冷淡。而英国某些知识分子以为欧洲文明比印度的更崇高，反对褒扬这位东方诗人，亦是造成这不愉快的阴影的原因之一。

离开英国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国。巴黎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他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在巴黎举行了欢迎他的集会，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些哲学家、诗人和著名学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曾作为和平之乡国际大学的第一批客座教授来到桑地尼克坦。同时，泰戈尔还获悉，在战争期间，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法文版的《吉檀迦利》中寻求到了安慰和希望。

法国之行结束后，泰戈尔对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了短期访问，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返回伦敦后，他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感到美国需要东方的信息。

在美国，泰戈尔受到的接待与反响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热情的赞扬，许多听众蜂拥而至，前来倾听这位东方著名作家的演说《诗人的宗教》，因为过分拥挤，几百人不得不失望而归；也有激烈的反宣传，有些报纸指责他的反英亲德。因此，泰戈尔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返回了伦敦。在美国之行中，最有意义的是他会见了埃尔赫斯特和他未来的妻子。这两位朋友所具备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他们真诚慷慨的经济援助，帮助泰戈尔在1922年开创了什利尼克坦的农村建设工作。

在伦敦停留了约3个星期之后，泰戈尔第一次领略了空中飞行的感受，他乘飞机去巴黎，与渴望已久的罗曼·罗兰会晤，并应约到新建的法兰西大学发表了题为《森林通信》的演讲。随后他前往瑞士的日内瓦，作了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当他在卢塞恩美丽的自然风光中休憩之时，他无比欣喜地接到了由德国著名作家与学者自发组成的委员会发来的庆贺他60岁寿诞的礼物——这个委员会决定向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受到鼓舞的泰戈尔，专程访问德国的汉堡和丹麦的哥本哈根，作了演讲。随后他应瑞典科学院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作了演讲，还观看了他自己的作品《邮局》的演出，并受到了瑞典国王的接见。离开瑞典抵达德国之后，他又在柏林大学作了演讲。在德国的首都慕尼黑，泰戈尔会见了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其他许多文学界、学术界的人士。战争之后的德国正面临着物资匮乏，泰戈尔将演讲所得资金，赠与了慕尼黑饥饿的孩子们。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中部城市达姆斯塔斯，在那儿逗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人民对他热诚朴素的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欧洲之行的最后两个城市是维也纳和布拉格，在那里他也作了演说。十四个月的旅行结束了，他的行迹遍布美国及欧洲各地。之后，泰戈尔于1921年7月回到了他眷恋着的故乡——印度。

第二十一章 诗圣与圣雄

当泰戈尔回到印度以后，他发觉印度全国正处于不合作运动之中。甘地是不合作运动的倡导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印度的自治。不合作运动包含的内容包括印度人不应在英国驻印政府中任职，不应接受英国授予的荣誉官职与官爵，不应在英国人开设的学校中读书。而且假如英国驻印政府不让步，印度人民还要拒绝纳税。此外，还号召人们抵制英货。

当不合作运动的浪潮汹涌全国之际，印度各个大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一些邦的农民运动也开始高涨。全印度充溢着不满的情绪。目睹不合作运动的景况，泰戈尔的心情十分矛盾。他赞成圣雄甘地主张以非暴力的形式使印度获得自治，但是面对运动中带来的苦难，他的内心非常忧虑。当他看到在焚毁外国衣服布匹的火堆旁那情绪激昂的人群，他感到这番举止过于冲动；当他目睹学生们离开官办学校，丢弃了学业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时，他分外痛苦；与此同时，他也不能接受放弃先进的机器，却崇拜手工纺纱的论调。

由于深感不合作运动中某些方面存在着偏差，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发表了题为《文化之汇合》的公开演讲。他赞扬了西方人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认为那种精神不是出于蛮力，而是源自勇敢、坚忍和客观面对现实的能力。他认为，印度与西方应当在知识文化以及精神上合作。他的讲演招来了众多反对的声音，当时孟加拉的著名小说家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为了回答泰戈尔的讲演，撰写了《文化之对立》一文。泰戈尔还在加尔各答所作的另一次名为《真理的呼声》的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群众的盲从将导致自由名义下的灵魂的真正不自由。为此，甘地专门著文反驳，认为诗人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

不久，甘地亲自来到加尔各答，在泰戈尔家中同诗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存在着分歧，但见解不同并未动摇他们之间真诚的友谊。在两人单独会谈之时，支持甘地的群众聚集在泰戈尔的住宅外面，狂热的人们从附近商店弄来的一捆捆外国布匹，然后置于露天的院子里焚烧，以表示对泰戈尔的不满。因此，当甘地强调整个不合作运动是建立在非暴力的原则之上时，泰戈尔反问道：“甘地先生，你的非暴力追随者正在干什么？他们从商店里抱来布匹，放在我家的庭院里焚烧，就像狂热的教徒一样，在火堆的四周狂呼乱舞，难道这就是非暴力么？”

泰戈尔一向尊敬甘地的个人品质，于是他放弃了与甘地及其追随者进行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争论，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从加尔各答退居到桑地尼克坦这个自己喜爱的孤寂之方，退居并不是因为憎恨，而是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执。回到和平之乡的他在孤独的时候，似乎看到了一个微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的位置是在世界的岸边游戏着的孩子们的天地里，在那儿，我和你在一起。”

于是，他继续拿起笔来，创作出一系列优美的儿童诗，并于第二年以《小湿婆天》为题出版。其中的诗歌对儿童内心的引人入胜的探索和优美、活泼的抒情格调，不由使人回想起他20年前所创作的《新月集》。诗人曾在写给甥女的信中提起，之所以写这些诗，是为使因成年人的责

任变得疲惫的身心得以解脱和休憩。他盼望自己能像孩童一样，在世界这个广大的游戏乐园中愉悦忘情地嬉戏。

《小湿婆天》这首诗是最能体现这部诗集特色的作品，这是献给一个永恒神圣的孩子——湿婆的赞歌。诗篇文笔优美，富于哲理，现摘录如下：

呵，我的孩子，我的小湿婆天，
忘我的，
在你狂舞的每一步伐中万物动摇而崩陷，
你聚敛的东西都散掷了，
一阵破坏的旋风，
把你踩碎的玩具的屑片扬到空中。
从荒凉到荒凉
你的世界得到它的解脱；
你的游戏的泉水永远流穿你的玩具的裂缝；
在缺陷中欢乐，
你用零件建造出你的创作，
紧接着只为一个任性又把它忘掉；
以天空为你的衣袍，
你从身上抛掉了一切的衣服。
在你身中隐藏着财富
你住在一个完全没有耻辱、卖弄和自私的世界里，
在永不会使你困穷的贫乏中，
尘埃也不会玷污你的纯洁，
你自己舞蹈的飞掠
永远把自己拂拭得雪白。
呵，湿婆天，这婴孩，
你认我为你的情人，
你的舞蹈的生徒，
请教我以不羁的智慧，
和破坏玩具的游戏，
教我怎样引导我的步伐
来应赴你的脚拍，
怎样撕裂我们织成的网束来自由地活动。

作品流露出诗人那对童真和随心所欲的游戏的渴望之情。1921年12月23日，国际大学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正式成立了。这是泰戈尔多年来教育梦想的实现，亦是他从青年时代就艰辛创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结晶。早在1916年，泰戈尔出访日本和美国时，他就对将来桑地尼克坦学校发展的宗旨有了明晰的构想。他希望能将自己的学校拓展成一所国际型的学校，既向别国人民奉献印度最优秀的文化，同时也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精粹。和平之院的口号就是：让全世界成为一家。早在1912年12月在桑地尼克坦召开的一个专门座谈会上，泰戈尔即提出了这一设想并加以阐述。他在多次演讲和多篇文章中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思想：世

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教派应当团结起来。应该创办一所机构以便让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的人们汇集在一起。在国际大学中，有泰戈尔从其他国家请来的客籍教师，他们都是著名的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而且他在印度率先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系。泰戈尔希望和平之院不去摹仿欧美的名牌大学，而是广采它们的长处，然后按照自身情况加以综合利用。泰戈尔为使理想变为现实，不惜把自己桑地尼克坦的土地、房屋和财产，通过一个信托公司交付给和平之院，并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和以往所创作的孟加拉文著作的出版权，以为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全部慷慨地献给了国际大学。

尽管泰戈尔为着和平之院的工作而忙碌不已，但他仍然关注和思虑着自己祖国的政局。在 1921 年底到 1923 年初，因为不合作运动的狂澜已越来越猛烈，所以当时的印度政治形势相当严峻，除了甘地以外，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差不多都已被捕，有 3 万名政治犯入狱。作为关心祖国前途的印度子民，泰戈尔思绪万千，于是将自己心中的想法，通过一个象征性的戏剧《摩克多塔拉》戏剧性地表达出来。

该剧创作于 1922 年 1 月，作品可以说是对甘地的个人品质和他所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的赞颂。剧情是如此展开的：摩克多塔拉瀑布（意为“自由的瀑布”）给西布特拉伊的人民带来了富裕。巫多尔古特国王为了自己控制这使人们富裕的水源，花 25 年修筑起水坝，妄想截住水流，完全不顾失去水源后人民的生活。王太子同情人们，决心使自由的瀑布重新奔腾而下，于是他想方设法摧毁了水坝，而他自己则被浪涛卷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这部剧作中，泰戈尔塑造了一个具有超凡人格的修道士——塔南乔耶的形象，他是甘地的化身；面对暴力，既勇敢无畏，又不主张以暴力抵抗；面对民众，既激励他们，又不让他们一味盲目地依附自己。这个人物早在泰戈尔 1909 年出版的戏剧《赎罪》中就曾出现过，并且连台词都未更改，可见作者对他的喜爱。

《摩克多塔拉》的背景是机器和强权的威力。剧中人物众多，有暴君和献媚者，也有理想主义者和伪君子，更有朴实而又机智、幽默的无名百姓。舞台上来来往往的这些角色，使我们从中也看到生活多姿多彩的真实，同时也令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自由精神与强权、机器的冲突。

这部剧结构单纯，线索单一，没有过多的枝蔓。不过《摩克多塔拉》只是由诗人在朋友集会上朗读过，而未能演出，因为就在那一年的 3 月，泰戈尔获悉甘地被捕。并被判处 6 年监禁。于是演出的筹备工作即告中断。

1922 年 2 月，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的和平之院举办了纪念莫里哀诞辰 300 周年的活动；7 月，他又担任了在加尔各答举行的纪念雪莱诞辰 100 周年大会的主席。这年的 8 月和 9 月，他的一部新作——音乐剧《雨季节》和一部早期作品的修改本——音乐剧《秋节》在加尔各答的舞台上演出。这两部音乐剧是融诗歌、戏剧、音乐和舞蹈特点于一体的作品。它们歌咏了季节的变换以及欢庆的人们，其中弥漫着纯朴的感情和自由的气息。

1922 年的 9 月，泰戈尔前往印度和南印度，做了漫长的旅行。一路上他在孟买、马德拉斯及其他城市停留，最后抵达了锡兰。每个地方都

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那前来听他演讲的人们如潮水涌来，归途中，他专程来到位于阿默达巴德的甘地建立的“坚持真理运动院”。圣雄甘地那时正被关于狱中。泰戈尔给运动院的居民和学生们作了演讲，细致地阐释了甘地的思想以及他牺牲精神的真实意义。泰戈尔的行动和言辞都表明了他对甘地深刻的理解和支持。

回到和平之乡休息了大约两个月之后，泰戈尔又启程到北印度和西印度去旅行。在西印度他还去采访了甘地的诞生之地，并于1923年的4月返回桑地尼克坦这个和平之乡。之后，为了避开酷暑，他又来到了位于阿萨姆山区的西隆。在这宁静凉爽的自然环境中，泰戈尔创作了又一优秀剧作——《红夹竹桃》。

《红夹竹桃》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雅克夏城，在那里，国王在一道有孔眼的屏风后面统治着全城。人民在金矿中做苦工，而国王占有了金子，并且还借助警察和宗教奴役着公众。国民们就在这样的强权统治之下一年又一年延续着贫穷悲惨的生活。

这时，一位名叫南狄妮的美丽姑娘来到了雅克夏城，她就像一道“震人心弦的光”使城里的一切事情都突然有了改变。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也没有人晓得她从哪里来。她“不但有美，也有令人恐惧的魅力”。她的魅力使人人为之倾倒。南狄妮几乎吸引了雅克夏城的所有人，无论是埋头于书堆中的教授，还是开采金矿的工人，抑或人性尽失的副总督，都对她着迷。南狄妮不明白为什么学者不关心人民生活的痛苦，于是她向一个敢于抨击君王的青年蓝震请教，两人的友谊后来发展成爱情。因为她的双臂和颈上都有用红夹竹桃结成的花环，蓝震就管她叫“红夹竹桃”。

为了斥责国王，并使他改变统治方式，南狄妮觐见了国王。屏风后的国王也被南狄妮迷住了。南狄妮讲出了与蓝震的爱情，愤怒的国王想中止会见。正在这时，工人们来到王宫门口，以诗歌形式倾诉了他们悲惨的生活。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正直勇敢的蓝震在与国王格斗后重伤而牺牲。

蓝震的死使国王意识到自己杀害了青春，因而内心发生了剧变，他折断圣旗杆，扯碎旗帜，不顾卫队的倒戈，请求南狄妮让他去死。

《红夹竹桃》这部剧作的内容比较繁杂，思想也比较令人费解。这与诗人创作中采用的现实主义及寓言式手法相关，而且剧中许多辩论和神秘主义相融合，使之具有象征意义的内涵。有的评论家认为南狄妮所代表的是生活中的自由精神，而作者本人则对该剧的意义做过如下的阐释：南狄妮代表生命的感触，她是生命欢乐的化身，而蓝震则象征着工作欢乐，两者的结合将爱的精神具体化了。结合中的爱，爱中的结合，这种和谐使不和谐的贪婪在它面前，如同被符咒镇住一样而崩塌了。

1924年4月，泰戈尔接受了当时中国大学演讲协会会长梁启超先生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中印两国一直是友好的邻邦，1000年以前佛教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而且两国都有着古老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东方文明的发祥地。泰戈尔此行，意在恢复长久以来中断的中印两国古老文化传统的交流。他的愿望实现了。离开中国后，泰戈尔从日本取道回到印度。在日本逗留的六个星期中，泰戈尔做了几次演讲。7月，他返回了祖国。

两个月以后，他再次启程，踏上了前往南美洲的旅程。他应秘鲁共和国的邀请，前去参加秘鲁独立 100 周年纪念大会。初秋时节，泰戈尔开始了他横渡大西洋的行程。海上旅行时他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散文，作品无一不表露出他那颗依然年轻的诗心。当船航行到南美的阿根廷附近海面时，泰戈尔突然病倒，只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登陆，经过检查之后，医生建议他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举目无亲的泰戈尔，幸运地遇到了气质美好、热情聪敏的维卡多丽娅·奥坎鲍，并得到了她真诚、周到的照顾。虽然因为健康的缘故，他不得不取消了对秘鲁进行访问的安排，但是住在风景幽雅宜人的普拉特河畔圣依丝德洛的一座别墅中，接受女主人盛情而又无微不至的关照，令他十分感动。在充满阳光和温馨的关怀中，诗人的创作灵感再次显现。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明朗、柔美的抒情诗，第二年结集为《阴暗的旋律》出版。在印度的古典音乐中，所谓阴暗的旋律，是黄昏中演奏的一种优美曲调。泰戈尔以诗的形式这样描述与维卡多丽娅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

女人，你曾用美使我漂泊的日子甜柔，
也曾用纯朴的恩慈接受我到你近边，
就像那不相识的星星用微笑欢迎了我，
当我在凉台上独立凝望着南方夜晚的时候。

从上面传来了一个声音：“我们认得你，
因为你像我们的从无限的黑暗里来的客人，光明的客人。”
在这个伟大的声音中你还向我呼唤：“我认得你。”
即使我听不懂你的语言，女人，我却曾在音乐中悟出——
“在这世上你永远是我们的客人，诗人，爱的客人。”

16 年以后，在泰戈尔临近死神门前之时，他依然怀念这段难忘的生活经历，并且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创作的一些诗歌中，追忆美好的往事和往昔的幸福。其中有一首即以女主人送给他的躺椅为题材，诗的第一节如下：

日光炎灼，
这个孤寂的中午。
我望着这张空椅，
在那上面找不到一丝慰安的痕迹。
在它的心中
塞满了绝望的言词
仿佛要在哀恸中说出。
空虚的声音
充满了慈怜
那最深的意义是把握不到的。

1924 年的 1 月 4 日，泰戈尔怀着遗憾的心情告别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热情的女主人，经过意大利的热那亚，从威尼斯返回了印度。

第二十二章 风格迥异的姊妹长篇

回到印度之后不久，罗宾·泰戈尔一直十分尊敬的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与世长辞了。乔迪楞德拉纳特是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罗宾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以后，给罗宾以颇为中肯的建议和指点，是罗宾志同道合的亲人。兄长的去世给了罗宾以沉重的打击。他只是将悲痛的感情和颤抖的心灵掩在外表的沉默平和之中。迄今为止，罗宾早已多次与死亡会面，历经多次生离死别的凄楚之后，他总是这样说：通过死亡和悲痛，平静寓居在永恒的心灵里。

同一年，即1925年5月，圣雄甘地来到桑地尼克坦。当时，随着1912到1922年不合作运动浪潮的消退，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值低潮时期。于是，在1924年底召开的印度国大党的年会上，圣雄甘地根据时局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纲领，并将其作为国大党在当前的领导宗旨。这一宗旨包含着推广手工纺纱和织布、禁止饮酒、吸食鸦片和提高低等种族人民地位等几项内容。其中，采用手工进行纺纱织布这一项，甘地坚持认为它是赢得印度自治的重要而且有力的途径。

在和平之乡此行中，甘地希望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成为自己革命宗旨的支持者。甘地努力强调手摇纺车的重要性，而泰戈尔则认为，用原始纺车手工纺纱对印度自治没有任何必要意义，不应当蔑视科学。甘地想说服泰戈尔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尽管见解不同，两位伟大人物仍然彼此尊敬和热爱。

后来，泰戈尔在《现代评论》上写了《纺车的道路》一文，阐述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印度的贫困问题是不能倚仗手工劳动来解决的。甘地也在自己办的周刊《青年印度》上著文《诗人和纺车》作为答复。泰戈尔在随后写给甘地的私人信函中这样申明两人的友谊：虽然你为着自认为是真理的见解而猛烈地打击了我，但是我们建立在互相敬爱的感情基础上的个人关系将经受得住这一严峻考验。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尽管甘地和泰戈尔两人在性格气质、思想见解上有种种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那深厚的相互信任、尊重的亲切感却始终将这两位品格高尚的人紧密地联系着。

同年年底，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主持召开了印度哲学会的第一次大会，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印度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哲学意蕴的演讲。1926年初，泰戈尔又去勒克瑙参加印度全国的音乐会议。之后，他接受达卡大学的邀请，在那儿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还参观游览了东孟加拉邦的几个城镇，然后回到了桑地尼克坦。

尽管有许多繁忙公务在身，泰戈尔的文学写作却并未止歇。他是一个天生的才思泉涌的人。除了将以前的两篇小说改为剧本之外，在这一时期，他的重要收获是创作了歌舞剧《舞女的膜拜》。

这部剧作是在一个佛教故事的基础上构思的：国王信奉佛教，他的大儿子不信仰佛教，一心盼望早日得到王位，于是国王弃位出走，国王的小儿子也追随父亲，做了僧人。在印度，宫殿中舞女的地位十分低微。舞女师利摩蒂景仰佛陀，决心去膜拜佛陀的圣坛，新王以死威逼她，不许她信佛，师利摩蒂不屈而死。而新王的母后虽本来信奉佛，后来因为觉得是佛教抢走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于是转而开始反对佛教。

剧情发生在春天里佛陀的誕生日。舞女师利摩蒂承担了向祭台膜拜的使命。公主觉得让地位卑贱的舞女担当这一神圣的使命太出格了，为了让师利摩蒂出丑，便决定让她改膜拜为跳舞，以亵渎祭台。深夜，舞女起舞，卸下自己豪华的衣饰，并虔诚地诵读膜拜的经文，她的奉献与无畏令公主感动得向她下跪，并乞求宽恕。

舞女师利摩蒂以虔敬证实了自己心灵的崇高圣洁，也表明人为划分贵贱地位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亦是该剧的人道主义精神之所在。除此而外，剧中还真实细腻地展现了老王后的心理矛盾——真心地信仰佛陀与因丈夫和儿子主张佛教的非暴力而出走，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之间的冲突。

泰戈尔坚信，印度教一旦与佛教相融合，将获得新生。在剧中，他呼唤具有高尚品格的佛陀和佛教主张的怜悯、非暴力精神：

世界今天为仇恨的昏聩而疯狂，
冲突是惨酷而苦痛无边的，
它的道路弯曲，它的贪心的束缚是纠缠的。
一切生物都呼吁着你的新生，
呵，无穷生命的你，
拯救他们，发出你希望的永在的声音，
让含着无限的蜜的财富的爱莲花
在你的光明中展开花瓣吧。
……
人的心因着不安的烦热，
因着自私自利的鸩毒，
因着不知终止的饥渴而痛苦。
广大的国家都在他们额上
点上鲜红的仇恨的记号。
……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这正是泰戈尔作为诗人，对这个世界正义、和平与宽容的呼唤。

《舞女的膜拜》在角色的安排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即剧中人全为女性。在印度社会中，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抑或是印度教教徒，都信奉着一个传统的偏见，即女人不能登台演出。泰戈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充分证明了他可贵的勇气。剧本完成后的第二年，准备在加尔各答演出，当时泰戈尔从国际大学的女学生和名门闺秀中挑选演员，并亲自帮助她们彩排，这一切莫不是对当时世俗偏见的尖锐挑战。

1926年5月，泰戈尔接受了来自意大利的邀请，启程来到了那不勒斯。当时，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的法西斯主义者——意大利的统治者墨索里尼正被鼓吹为伟大的人物，泰戈尔也产生了错觉。抵达那不勒斯时，泰戈尔受到了热情欢迎，官员代表墨索里尼致了欢迎辞。后来在罗马，泰戈尔受到了由罗马总督主持的市长欢迎大会的款待并发表了题为《艺

术的意义》的公开演讲，会见了墨索里尼。意大利的国王也接见了泰戈尔。泰戈尔还在热心朋友们的秘密协助下，见到了被法西斯分子软禁的哲学家伯奈代托·卡罗契。

泰戈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墨索里尼的邀请和报界的宣传都是企图借他这位世界诗人的名义，扩大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因此当诗人离开意大利，抵达瑞士之后，才从罗曼·罗兰的来信中惊悉自己被欺骗、被愚弄的事实。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宣传机构将他的讲演内容作了极大的歪曲，以便为法西斯思想寻找有力的托辞。

满心疑惑的泰戈尔为着了解事实的真相，又在欧洲继续旅行。在瑞士的苏黎世，沙尔多利夫人将耳闻目睹的法西斯暴行告诉了他；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莫迪格利尼亚先生讲述了意大利众议院中一名因反对法西斯的议员横遭杀害的凄惨真相。骇人听闻的事实使得泰戈尔震惊了。他随即写信给《曼彻斯特卫报》，详细地说明了自己之所以访问意大利的原委和行程，并且以愤怒的措辞严厉谴责了法西斯主义。这样一来，意大利报界又群起倒戈，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泰戈尔。

接着诗人又在欧洲作了五个月的旅行。在英国、丹麦等国短暂停留之后，泰戈尔来到了德国，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总统接见了，泰戈尔还与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建立了友好的情谊。在布拉格，他观看了以捷克语演出的自己的剧作——《邮局》，然后从维也纳前往布达佩斯，途中因为旅途劳顿造成身体的不适，于是在巴拉顿湖畔作了一段时间的疗养。随后他先后抵达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布加勒斯特和雅典。最后，泰戈尔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为了迎接他，埃及的议会中止了议事日程，埃及国王还特地赠送给国际大学一套阿拉伯文的书籍。1926年4月，泰戈尔回到了印度。

令人欢愉激动的旅行也给他带来了身心的疲倦，回到宁静安谧的和平之乡后，泰戈尔创作的舞剧《波多拉交季节的舞台》于1927年2月在桑地尼克坦演出。这一年的3月，泰戈尔踏上了西印度的土地，而且在此期间主持了印度文学会议。随后的酷暑时节，他抵临阿萨姆邦美丽凉爽的山城西隆。在那儿，他开始构思、写作长篇小说《三代记》。

1927年7月，泰戈尔再次启程访问东南亚的诸国，这已经是他年过六旬的生命里第九次的出国旅行了。他所到之处，无论是新加坡、马六甲和吉隆坡，还是怡保、太平和槟榔屿，无处不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船上他写下了一篇赞美爪哇岛的长诗。在对爪哇岛和巴厘岛进行访问时，那里迷人的歌舞剧和动人的传统文化艺术也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泰戈尔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使得两国之间中断了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得以恢复，而且两国之间的留学生交换也由此开始。此外，爪哇的蜡染技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旅行而首次输送到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并逐渐传至印度的其他地方。对那里的陵庙建筑、群岛风光、居民的热情，以及那里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文化亲缘，都使泰戈尔难以忘怀这次印尼之行。离开印度尼西亚这个岛国不久，他又将访问的欢愉写在了动人的诗篇《萨格利卡》中。归途中，他还在泰国作了几天的访问，所到之处都进行了演讲，也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在曼谷大学，他还作了以教育为题的演讲。这一年年底，由于泰戈尔要在12月里主持和平

之乡一年一度的庆祝例会，所以他结束了这次东南亚的宜人旅行。

1928年，泰戈尔收到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函，请他前去演讲，于是他准备再次踏上出国访问的旅途。不巧的是，诗人在马德拉斯就病倒了，在当地休养了一段时日后他乘船来到锡兰，希望在那里恢复健康再前往欧洲。然而在科伦坡休养的10天里，他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所以他决定暂时放弃这次访英旅行，又返回了印度。

应老朋友的邀请，泰戈尔来到班加罗尔继续休养，在这3周短暂的时间里，诗人的创作从未停止。他不仅续完了去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交流》，还创作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最终的诗篇》。令人惊异的是，这两部风格迥异的长篇力作，是泰戈尔在同一时期创作的。《交流》是1927年泰戈尔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他本想写一部家族小说巨著，但小说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改变。在他完成第一部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决定放弃创作这个宏伟巨著的计划，所以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交流》，只是这本未能完成的宏篇巨制中的第一部。

小说的情节围绕库姆蒂妮和她的丈夫摩多休顿展开。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库姆蒂妮，自幼受到旧式家庭的熏染，珍视名誉、自尊和教养胜于重视财富甚至生命本身。她美丽善良，又温柔隐忍，但是外表的柔和沉静并不能掩盖住她内心的尊严与自重。她的丈夫摩多休顿则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作为新兴的实业家和拥有百万家财的企业巨头，他精力充沛，极富开拓进取，但性格粗鲁而专横，视金钱为万能之物。

性格与教养的不同使这对夫妻之间渐渐起了冲突：冷漠无礼的摩多休顿，把自己可爱的小新娘仅仅当做一件自己以金钱、武力夺取的附属品，认为她就像自己开的一家商号似的，理所应当该归自己控制。而库姆蒂妮因为沿袭家族观念以及受印度教传统的影响，努力让自己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但是一次次的争执过后，库姆蒂妮心中的叛逆精神觉醒了。而摩多休顿也逐渐困惑地发现，他可以控制妻子的肉体，却无法控制她的自由心灵和不羁的个性。

《交流》这部小说中，那些细腻生动而又趣味无穷的心理描写是最引人注目的。而这种心理刻画在丈夫对妻子态度的微妙变化之中展现得最为动人。开始，丈夫对妻子的无礼、几近冷漠与粗鄙，然而后来这个常为小事就发怒、折磨别人的摩多休顿，却由于妻子坚决维护自己独立人格的抗拒渐渐对自己丧失信心。后来，倒是他对妻子生出柔顺之情和敬畏之意，而这些令他困窘，因为这些可是他从来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的，他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交流》这部小说也有着时代的特征和印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近代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即宁可失去财富，也要维护尊严、教养和传统旧式望族与追逐金钱、权力、利己的新贵之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激烈冲突。

泰戈尔以多年的处世经历形成的冷静从容而又细致周详的目光观察着生活，孕育出一部反映变化纷坛时代的《交流》；与此同时，他心中的诗情依然蓬勃旺盛，又创作出一部其中约有一半是诗的长篇小说——《最终的诗篇》。

这部有关青年人的小说立即成为孟加拉的畅销书。毫无疑问，它是一部极富抒情意味的作品。印度的评论家都认为《最终的诗篇》是一部

无与伦比的杰作。由于它那诙谐而又妙趣横生的对话、富有诗意的场景、快速变换的节奏，令当时的孟加拉青年为之倾倒。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孟加拉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他生长于加尔各答一个高度欧化的家庭，曾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接受了现代教育，归国之后专心一意地从事着律师工作，前程远大。牛津大学的教育也给了他种种与众不同之处：他喜欢奇想；他渴望改善国家目前不太遂自己心愿的状况；渴望独创。但是，他突然遇到了一位与自己性格迥然相异的姑娘。使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姿容秀丽的姑娘是大学校长的女儿，她虽也受过极好的教育，却从不嘲弄别人的无知。她仪态优雅，感情深沉细腻，充满爱心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一向惯于在社交界中与小姐们做爱情游戏的他，无比倾慕这个女孩，并且在两人开始恋爱之后，他竟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身上原来也隐藏着真诚美好的情感。

可是，这种真诚的内心体验和他多年来形成的种种习惯截然相反。她与他水火不容，以至于他在感到惊喜与幸福的同时，却又无比惶惑和感伤，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个性。善良敏感的姑娘也意识到，他爱的人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他塑造出来心中的偶像。于是，为着避免悲剧的发生，她决定毁掉两人的婚约，给他自由。姑娘最后只给他留下一首感情深沉、动人心扉的诗，然后便像脚步声一样，永远从他的生活中失去了踪迹。

《最终的诗篇》的叙事散文中织入了美妙的诗篇，泰戈尔圆熟、新颖的创作技巧，再加之长盛不衰的爱情主题和小说机智、抒情的笔触，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动人的魅力。

第二十三章 诗与画

《最终的诗篇》这部小说在 1929 年出版，使泰戈尔众多的同时代人 为之赞叹不已，他们请求诗人编写一部他自己的爱情诗集。勤奋不息的诗人于是在当年就创作出版了爱情诗集《摩福阿》，那些充满真诚的感 情与青春活力的爱情诗篇，给读者以无上的感动与享受。

摩福阿，又译玛花，是一种于暮春时节开放的印度花朵，它生长在 森林中某类质地坚实、枝干参天的大树之上，香气非常浓郁甜美。在孟 加拉的农村中，这种花儿还常用来酿酒。初尝此酒时还以为是柔和的甜 酒，然而它却能让饮者很快醉倒。这部诗集与泰戈尔早年的爱情诗相比， 已有很大不同。它不同于《刚与柔》和《齐德拉》中对肉体的描写，亦 异于《渡河》中的诗篇那种被拘束着的情感。《摩福阿》中的爱情诗热 烈动人，语言也分外清新有力，体现出了成熟爱情的特质。

在这些诗作中，印度女性一改往昔顺从忍受的柔弱形象，成长为坚 强独立的新女性。在《告别》中，爱情坚信自己拥有能够战胜死亡的强 大力量；在《挑战》一诗里，妻子向丈夫表白自己绝不会是他前进中的 负担，而是可以与他共同分忧、共同负重的旅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无 畏》这首诗，它昭示着人间爱情的真谛——以乐观精神去战胜命运：

心上的人儿，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制作一个玩具叫做天国。
我们不会一边低声哼唱，一边叹息流泪。
我们不要用丘比特那又苦又甜的礼物
来修建我们的卧房。
我们不要软弱，我们也不要
跪在命运之神底脚下祈求恩赐。
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因为我们知道
你和我同在，而我也和你同在。

我们决心高举爱情的大旗
大步踏着山崖小路
去迎接那千难万险。
如果艰难的日子给我们带来痛苦，
我们不去寻找慰藉，我们也不求安宁。
在我们横渡凶险的大河时，
假如船桨折断或船帆撕破，
我们将在死亡面前傲然屹立，
并且深信不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和我同在，而我也和你同在。

自幼就与大自然无比亲近、而且十分热爱森林的泰戈尔，还奉献出 了一部新颖别致的诗作——《森林之声》。这部佳作写于 1928 至 1929 年间，于 1931 年出版。

泰戈尔一向亲善自然，这是他作为诗人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个性。在

1928年的雨季时分，他为桑地尼克坦以及农业基地什利尼克坦分别开创了崭新的节日：植树节和开犁节。节日期间有音乐、歌舞和诵咏吠陀经的仪式，它们简朴而又充满艺术气息。四乡邻里及加尔各答城里的人们总是纷纷如潮水般涌来。

在《森林之声》这部诗集中，泰戈尔描写了树木、鲜花、灌木林和藤萝等等五光十色的森林景色，并且满怀深情地咏叹一年之中百态千姿的季节风光和季节交替。整部集子就是一首对绿色大地的赞美诗。

开篇的那首诗题为《向大树致敬》，诗人以为大树代表着原初的精神，它从地底的幽暗中挺身而出，将地球“从梦中惊醒，并使她认识了自己的神圣祖先”。泰戈尔还将大树拟作“土地的勇敢的子孙”，他是向蛮荒之恶魔展开战斗并且“在他的王国中建立起草木葱葱的绿原”的英雄。作为诗人，泰戈尔将无数的礼品赠给大树，并且赞叹着：

呵，大树，人类的手足！我向你走来
作为人类的使者——受到你的精神的激励，
享受过你的浓荫的凉意——得到了你的力量的鼓舞。
我作为诗人向你走来——你那绿色的旋律使我心醉，
我向你致以殷切的问候，同时
献上这不成敬意的几首小诗。

与大自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诗人在感情上早已与他居住四周的美好环境息息相通了。在《森林之声》所收入的作品之中，他对神奇自然界的独有景象逐一地进行展示、刻画与咏叹，并且让这些独特景物与人们之间形成亲密无间的联系，他把婆罗双树拟作陷于沉思之中的圣人，庄严与和平的体现者，他还写到了外国朋友送给他的会开花的藤萝类植物、茉莉花架、椰子树和可爱的芒果林，以及水、光、天空、风和地平线。作为诗人的他，总是以交织着崇敬、感激与爱恋的心情去同大自然进行感情的交流。如在《芒果林》中，他这样写道：

呵，芒果林，使我心中感动不已的
对未知的向往，也同样激动着你的心。
你那盛开的花说出了与我同样的语言：
既有痛苦又有欢乐的语言。

1928年，除了继续小说、诗歌的创作之外，泰戈尔在一个对他来说完全是崭新的艺术领域内开始了辛勤的耕耘，这就是绘画领域。童年时代的罗宾就对绘画有着深厚的兴趣，看到乔迪楞德拉纳特哥哥提笔作画，他也曾努力地试图摹仿那神秘的游戏，但是他一直没有正式地练习过。而在1928年，他年过六十七岁却开始了绘画创作，并且在接下来的13年从未止歇。这之中的毅力和勇气实在令人赞叹。

泰戈尔一向以书写得整齐美观为快事，所以有的评论家将他的绘画与书法联系起来。诗人自己曾将自己的画称作是“绘画中的诗歌创作”。他的画面起初是以简单的线条和图案开始的，而且他喜用凝炼直捷的手法，也从不调色，因此，实际上，绘画这个新形式正是提供给罗宾一个

崭新的创作园地，使他心中种种纷繁复杂而又深藏不露的思绪通过这一渠道和方式有力地表现出来。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他有意识的自觉的情感和思想活动的表现，那么绘画则是他潜意识里诸种情绪、直觉的真实流露。

1929年的3月1日，泰戈尔应加拿大全国教育委员会之邀，乘海轮启程前往那里，开始了他的又一次海外旅行。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两地，泰戈尔作了两次演讲。前来听演讲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并且为他渊博的知识而敬重他。泰戈尔还收到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于是决定去那里访问。然而由于遗失了护照，他受到洛杉矶当地移民局无礼的待遇。深感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而受到侮辱的诗人，愤而中止了美国之旅，乘船抵达日本，在那里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日。

泰戈尔热爱讲究礼貌、纪律、天性勇敢的日本人民，也正是由于这种爱，他对法西斯势力拼命煽动起人民狂热的爱国热情更加感到痛心。他曾在日本的公开演讲中，指出日本正在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劣行将使得日本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理想的魔鬼”，表现出了诗人的正气和非凡的勇气。

自日本归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受到了热情真挚的欢迎。7月里，他终于回到了印度。

1930年1月，泰戈尔启程到西印度去，并在古吉拉特邦的巴罗达城作了题为《艺术家的人格》的演讲。3月初，他去欧洲作访问旅行。5月初，在巴黎的皮加勒长廊，泰戈尔的个人画展揭幕了。泰戈尔的绘画中，有奇形怪状的鸟儿、花儿、人物和风景，有的人从他的画中看到了“原始主义”的影子；有的人品出了现代主义的味道；还有人则认为他的画反映了不和谐、嘲弄、冷酷、严峻和荒诞不经，与他诗人的朴素、宁静、幽居的形象完全相左。然而实际上，正如一个人会有和谐平静的一面，亦会有忧伤、冷峻的另一面一样，印度著名的泰戈尔评论家纳拉万教授对此曾发表这样公正而深刻的见解：

正如持久性与变迁、宁静与骚动在罗宾的哲学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力量，正如死亡不是生命的否定，而只是生活交响曲的另一个乐章一样，宽厚与严厉，欢乐与痛苦也不应被看作单纯的对立面，而应该看作是在这一汪洋大海里的不同的波涛。

总之，个人画展在巴黎赢得了当地艺术家及艺术评论家们的赞扬。5月底，泰戈尔在牛津大学作了演讲，演讲稿在次年以《人类的宗教》为题出版。在伯明翰和伦敦进行了个人画展之后，7月间，泰戈尔来到了德国柏林。尽管对纳粹主义颇感愤慨，他却仍对德国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此次德国之行更加深了他对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尊敬，随后他又在柏林举行个人画展，并到慕尼黑及其他几个城市访问。与此同时，在观看了德国的基督受难剧之后，受到启发的泰戈尔几天后就写成了一篇英语诗歌，取名为《御子》。

在日内瓦休息了一个月以后，泰戈尔又接受了苏联政府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访问。关于这次意义重大的旅行中全部情况以及所见所闻所感，泰戈尔在当时写给家中的信里都作了生动细致描述。第二年这些信以《俄国书简》为题出版。

泰戈尔以前听到过许多反对苏联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当诗人准备启程踏上去苏联的旅途之际，还有不少朋友企图劝阻他，说那里人民生活不幸福，社会秩序混乱。然而泰戈尔主意已定，他希望去看一看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革命的国家。此间诗人虽年过七旬，精神却愈来愈年轻、明朗。同他的青年、成年时期相比，晚年的泰戈尔似乎有着更加宽容的心态，更少保守的观念。诗人这样谈及他的心情：

到底到俄国来了，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奇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它相比，从根本上就不同。

泰戈尔在苏联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看到被压迫者如今成了真正的人。在短暂的时日，纯朴的人民成为充分解放与发展的人——自由、平等、按劳取酬、受到文明教育。身为一个教育家，他对苏联的教育状况也十分感兴趣：

我到俄国去，为的是去看看他们的教育制度。看到以后我感到非常惊奇。仅仅在8年的时间内，教育的力量就把人的心灵面貌都改变了。

……

这样多的人这样迅速的变化着，这是很难想象的事。许多世代以来开拓了的河床里涌起了教育的洪流——我看到了这一点，真是心花怒放。全国各地，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普遍觉醒了，他们的一条新的希望的大道好像已经迈越了地平线——生活的浪潮到处都极其充分地激荡着。

泰戈尔看到苏联的教育正以惊人的速度普及着，他也意识到苏联发生的变化背后所蕴蓄的伟大的创造力。与此同时，诗人还看到了在革命中也有强制和惩罚手段的运用，他认为专制是严重的灾难。虽然有的地方并不尽如人意，但他感到正如明月之上的阴影一样，这些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泰戈尔对少年公社、孤儿们作了访问，与著名人士相会，并举办了画展，之后他从苏联来到德国，再次启程去美国访问。与前两次不同，泰戈尔这一次受到了隆重的礼遇。11月25日，纽约几百位知名人士举办盛大宴会欢迎他，随即他在纽约历史学会议上作了演讲。美国著名的女舞蹈家为协助国际大学筹募经费，亲自和她的舞蹈团举办了专场演出。诗人同情失业工人的生活，将演出所得捐赠给纽约市失业工人作救济金。泰戈尔的画展还先后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举行。在华盛顿，诗人还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1931年1月，泰戈尔离开美国，取道伦敦回国，在海德公园饭店的午宴席上，他同肖伯纳作了一次长谈。

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旅行给诗人带来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各种新鲜的感觉，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更丰富、全面，而且，苏联整个国家为重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创造性图景更使他难忘。

归国后的泰戈尔发现印度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艰难的时期。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波及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激起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从沉落走向高涨。

1930年，圣雄甘地再次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抵制英货、抵制政府委员。此次运动的规模较以前更为深广，全国城乡的人民群众几乎都被发动。面对斗争激烈的局面，英国驻印政府采用恐怖手段加紧镇压，一年间就逮捕国大党领导人和爱国者共达6万余人。成百上千的勇敢的孟加拉青年，仅仅因为对为自由而战的革命斗争表示同情，就被以嫌疑罪名投入了集中营。泰戈尔曾写诗向被囚禁的青年们表示敬意。后来，在希吉利的监狱中，两名爱国青年还惨遭杀害。消息披露之后，泰戈尔十分愤怒。于是，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上，诗人严正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

除了人为的残暴之外，北孟加拉的大自然也肆虐起来，那里发生了洪灾，人民被迫离乡背井。为了救济灾民，泰戈尔将诗歌《御子》改编为孟加拉戏剧，更名为《御子之圣地》，在加尔各答上演，所得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灾民。

1931年3月，泰戈尔归国之后完成了歌舞剧《新气息》的创作，这部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戏剧后来也在加尔各答的剧院中演出了。

第二年年年初，正当加尔各答市民们为诗人的70寿辰准备之际，泰戈尔突然得知圣雄甘地因为进行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一同被捕的消息。他立即请求中止庆祝准备活动，打电报给英国首相，抗议“盲目的镇压政策”。不久他又准备发表一个声明，却被新闻检查机构无理禁止刊登。一向认为英国人是讲公正的绅士典范的诗人，心灵和感情都受到了重创，加之欧洲之行时对法西斯暴行的耳闻目睹，他一改以往顺从忍耐的谦恭态度，不再祈求自我牺牲才可以换来的和平，当时创作的《问》这首诗则表露出他态度的转变：

我的神，一次又一次，你曾派遣使者来到这无情的世界；
他们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他们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从心底拔掉仇恨的毒根。”
他们值得崇拜，值得怀念，
但是在这不幸的日子里，
我却把他们赶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敬礼给他们。

难道我不曾亲眼看见
在强者横冲直撞的侵略面前
正义的声音被扼杀
独自在暗中哭泣？
难道我不曾看见
热心的青年们在奋勇前进中
头颅撞着石墙遭到痛苦的死亡？

今天，我的声音窒息，
我的笛子吹不出歌曲。
我的整个世界消失在
漆黑的夜的噩梦里。

因此我问你，含着泪，一个问题——
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
那些扑死了你的光明的
你能饶恕他们？
你能爱他们？

甘地的被捕，千百万爱国者的遭际，这无情的现实，使诗人泰戈尔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在这首感人肺腑的诗篇中陈述了自己对镇压手段的极端愤慨和对现实的无比失望之情。

第二十四章 新体散文诗

愤慨而又失望的泰戈尔在恒河畔的一所安静的别墅中居住了一段时间。在那儿，受自己和其他印度画家作品的熏染而来的灵感的支配，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后来集成《千姿百态》于翌年出版，这本诗集是题献给孟加拉的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的。

此时的泰戈尔在岁月的冲击下，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然而他仍旧推却不了伊朗国王的盛情的邀请。1932年他启程前往伊朗，在那里他受到了来自政府和人民的挚诚的欢迎。在设拉子，泰戈尔参观了著名波斯人哈菲兹和萨迪的墓园。接着，伊朗首都德黑兰为诗人而举办的群众欢迎大会，令罗宾感动不已。在返回印度途中，泰戈尔又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做了短暂停留，伊拉克国王接见了。泰戈尔还在阿拉伯的沙漠中游牧民族贝督因人的帐篷中渡过了美好而难忘的一日，实现了数十年来的夙愿。这一次两伊之行是泰戈尔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自玫瑰之乡返国后的泰戈尔，再度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打击：他十分疼爱的惟一的外孙因患严重的肺炎而去世了。泰戈尔非常喜欢这个懂事而又有才华的孩子，他的死使得泰戈尔再一次经受了悲哀的折磨和伤感的考验。

这一年，诗人出版了他的又一部诗集《终了》。他在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痛苦之后，想以此来象征他的创作生涯的终结。《终了》集中的作品风格各异，喜怒忧悲，五味俱全。

1932年诗人又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创作，他以自己神奇瑰丽、变化无穷的诗才开创了有节奏的散文诗的天地。这一年他写了第一部令人倾倒的散文诗集《再者》，此后直至生命的最后，他还写有三部散文诗集。

《再者》是一部让人惊叹的全新的作品。泰戈尔放弃了格律诗的传统写法，以勇敢无畏的开创精神和无穷的革新力量使散文走入了诗歌的领域，将诗的表现力大大扩展。在《再者》中，诗人发掘出孟加拉语言的优美韵律，抒写了许多描绘日常事物与情景的美好诗篇，其中名篇有《一个普通的少女》《山茶花》《男孩子》等。

青年时代的泰戈尔曾住在家族的庄园中，他沿帕德玛河巡视时的感受依旧深留在记忆里，《再者》的开篇诗《古巴伊河》（中译本为《莲花河》）则记载了他对帕德玛河威严高傲姿态的回顾：

我的心悠悠然地随着在远空下的莲花河一同曲折流走。在她的对岸上伸展着沙滩，与世无关地，在它庄严的荒芜中目空一切。

在这边丛生着竹子，芒果树，老榕；倾颓的茅舍；巨干的莲叶桐；池坡上的芥园；沟径边的甘蔗田；依恋着静寂时光的蓝靛园的断垣，一行行的木麻黄日夜地在废园中低语。

……

又译《附言集》。

即帕德玛河。

她总是冷冷淡淡地。她没有承认而只是容忍了她的两旁的房地；她的威仪中反映着山岳庄严的沉默与海洋广阔的寂寥。

而如今当诗人已临暮年时，他更钟爱和平之乡附近的那宛如淳厚的山达尔族少女的小河：

我有小古巴伊河做我的芳邻。她没有世家的门第。她的质朴的名字是和无数年代的山达尔村妇的喧嚣杂谈混在一起的。

她的谈吐是小家的谈吐，不是学者的语言。她的律调和土地和水是同宗的，她的流水对于大地的黄绿的财富毫不怀妒。

她在光明和阴影中穿掠的体态是苗条翩婉的，她拍着手轻轻跳跃。

在雨天她的手脚就变野了，像村姑们喝醉了美果酒一样，但即使在她放纵的时候，她也从不冲破或是淹没了她的近岸；只在她嬉笑奔走的时候以她裙子戏弄的舞旋扫着岸边。

在中秋她的水变清了，她的水流变瘦了，显露出水底沙粒的苍白的闪光。她的贫乏，并没有使她羞愧，因为她的财富不是自大，她的贫困也并不小气。

在不安的心情中，她们带着自己的美德，就像一个女孩子有时珠围翠绕的舞蹈着，有时静坐着眼含倦意，唇含慵笑。

《再者》中还收有一些富于哲理的诗作，并有艾略特《香客》这首诗的孟加拉译文。

此时，英国当局通过印度立法协会颁布“宗教团体决议”草案，规定了宗教团体和种姓在未来的中央各邦立法机关中的席位分配，给所谓的“不可接触”者以更多法律权益。圣雄甘地认为，这是将印度分割为高贵和低卑种姓的分裂阴谋。于是，在1932年9月20日，甘地决心在狱中绝食至死，除非对决议作出修改。绝食的前一天，甘地写信给泰戈尔，请求他的支持，泰戈尔在复电中赞扬了甘地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献出宝贵的生命是崇高的行为：“我们悲痛的心满怀虔诚和爱戴之情，关切着你崇高的苦修。”

泰戈尔于9月24日跋涉到浦那的叶勒沃达监狱探望甘地。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同意了甘地的主要请求和全国各政党团体提出的解决方案。于是在26日，甘地停止了绝食，正在甘地身边的泰戈尔曾在此之前为甘地诵唱了一曲孟加拉的赞神歌，即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吉檀迦利》的第39首诗作。

随后，泰戈尔接受了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的教授头衔，并作了一系列演讲。他在桑地尼克坦欢迎波斯国王派来的客籍教授，还带领和平之乡的学生及文艺工作者去到孟买参加“泰戈尔周的活动”，在安得拉大学发表一组题为《人类》的演讲。之后诗人还访问了海得拉巴邦，并在加尔各答会堂发表了《印度的巡礼者拉贾·莫罕》的著名演讲，盛赞了这位印度伟大的改革家。

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间隙，泰戈尔仍不忘情于创作，他于百忙中

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著作有诗歌《荒原》、《四个四重奏》等，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抽暇写作了两部新剧。

1933年出版的《纸牌王国》是泰戈尔根据自己早年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幽默剧。作者的寓意是通过这则童话故事抨击现实。故事梗概是这样的：纸牌国里种族界限分明，每个人都只是按照规定的安排去工作，他们不说话，不思考，平静得有些过分，而且没有激情和欢乐，王子和他的属下们来到这个到处死气沉沉的国家之后，决心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他们倡导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生活原则，当地人们纷纷仿效。摒弃那些条文律令之后，纸牌国充满了盎然生机和爱情。

《贱民之女》（又译《首陀罗女郎》），则是根据佛教故事改编而成的。原来的情节是佛陀通过法力将自己的门生从低种姓的首陀罗女子的诱惑下解救出来。泰戈尔改编之后，贱民之女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这部剧中共有三个人物，主要人物只有两个。

首陀罗是印度所有种姓中最低贱的一个，剧中的首陀罗女子自生下来那天起，就不得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人歧视，生活贫苦。炎热的一天，年轻的姑娘拎着水罐走路时，遇到了面容清秀的高僧阿南德。口渴的僧人向她讨水喝，姑娘犹豫不决，因为根据习俗，经她手接触的水会损害高种姓的人的。阿南德安慰她说，作为人类的一员，人的价值只在于拥有爱与牺牲的品格，而不在于种姓。随后他喝了姑娘献上的水。

阿南德朴素的言辞震撼了姑娘的心，平生以来因为社会不公正的待遇而造成的自卑的阴霾不见了，她第一次感到有了自尊，是的，作为一个人，她有爱的权利，也有奉献的权利。渴望获得爱情的她决心把自己奉献给那位高僧。

再次遇到阿南德时，僧人早已不认得她了。羞愧的姑娘心灵受到了伤害。她狂热地祈望骄傲的阿南德受到自己感情的摆布，她请求妈妈发出有魔力的咒语，将高僧引入自己的家中。

当被魔法牵制的阿南德来到首陀罗女子的房门前时，姑娘看到他的脸上现出情欲和羞耻的痛苦，她希望献身的是被真理光辉映照得光彩夺目的阿南德，绝不是面前的堕落之人。她也因自己的自私和罪恶感到畏惧，于是她乞求母亲收回咒语，阿南德获得自由，母亲却因精疲力尽而死。

贱民之女伏身在阿南德的脚下，做出忏悔。应当说与阿南德的第二次相遇给姑娘带来了真正的超度。第一次的偶遇，阿南德使贱民之女意识到了自身的尊严，有了自由的思想；第二次的到来则使她的虚荣与骄傲在苦难的磨砺中消除了，贱民之女终于懂得自由的获取要依靠真诚的心愿。

《纸牌国》和《贱民之女》不久在舞台上演出。到1933年年底，泰戈尔又有两部小说和一部散文剧问世。

中篇小说《两姐妹》以加尔各答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为背景，刻画了两姐妹与同一个男子之间的微妙感情。小说的心理描写十分细致，作品开篇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

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母亲式的，一种是情人式的——我听到过几个有学问的人这样说。如果可以用季节来作比，那么，母亲便是雨季。她赠给我们清水和鲜果，

调节酷热，又从天上洒下雨水，驱走干旱。她使人富足。情人式的女人却像春天。她非常神秘，充满了甜蜜的魅力。她从来不肯安分，她在血液里掀起浪涛，又窜进心灵的宝库，去拨动它里面的金七弦琴上的寂寞无声的丝弦，使肉体 and 心灵都弹奏出无字的音乐。

姐姐沙密拉婚后对丈夫萨山加处处关怀备至，通情达理的她使丈夫把家业越办越红火，可是母亲般爱护自己丈夫的她却没得到丈夫多少关心，病倒之后，她便请妹妹前来协助家务。妹妹乌密玛拉则有着火一样热烈的情感。与姐姐的个性迥然不同，她虽不擅长做家务，却以自己快乐的天性、“假日”的情绪，使萨山加为她迷恋倾倒，甚至放弃了日常的事务。

姐姐病好了，萨山加的事业也濒临破产。面对复杂的感情纠葛，三个人的心理都十分复杂。是对婚姻爱情忠诚还是对自由爱情忠诚？姐姐建议姐妹两人嫁给萨山加，共同辅佐家业。可是妹妹乌密玛拉却决定离开姐姐和姐夫，一个人到英国去，并写信忏悔，请求姐姐的宽恕。

长篇小说《花园》也写了两个女人和一个男子的故事。男主人公是一个园丁，10余年来，他与妻子共享莳花爱花的乐趣，过着幸福的生活，不幸的是妻子突然得了病，她建议请来丈夫年轻的表妹做帮手。然而一段日子过后，当卧病在床的妻子看到丈夫与他温柔的表妹一同干活的时候，她开始猜疑、嫉妒了。病痛使她的性情变得乖张，她逼着丈夫打发走了年轻的姑娘，自己也因妒忌和悔恨不久即死去。

散文剧《邦肖利》刻画的是加尔各答上流社会虚伪、尔虞我诈的生活图景，那里绅士们装腔作势，知识分子则卖弄才华。整部散文剧中充满了诙谐机智的对话。这部剧作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上演。

1934年1月，印度北部发生了强烈地震，比哈尔邦一些城镇遭受重大损失。圣雄甘地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认为这一灾难是神明对不合理的贱民制度的报应。虽然诗人泰戈尔赞同甘地的政治主张，但对他利用大自然灾难的手段来印证革命表示了不满和惊讶。

此时，由于经济拮据，国际大学迅速的发展受到影响，使得泰戈尔深感必须另谋出路，以筹措资金。他成立了演出剧团，排练自己的剧作和歌舞，到全国巡回演出。在当时，舞蹈还被视为低贱的职业，泰戈尔的这一举动可谓是十分勇敢的。募款固然是一个目的，但是诗人还希望人们摆脱对印度古老艺术的种种偏见。

1934年5月和6月，巡回剧团来到了美丽的岛屿——锡兰。在那里逗留期间，泰戈尔写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四个故事》。

《四个故事》的主题又回到了政治信念与道德价值这一冲突上来了。故事背景是孟加拉的民族革命运动。激进派的领袖忠于事业却残酷无情，一个聪明而向往正义的姑娘加入了这一组织，并让自己的男友也一起参加，男青年出于爱她发誓加入了这个派别并准备参加他们的恐怖活动。然而，很快他就觉得斗争的方式与领袖们倡导的自由和爱国毫不相干，他觉得愚昧的英勇只会使人的本性更加残忍。最后，这对恋人的理想受挫，双双惨死。小说注重刻画人物内心活动，语言优美动人。但由于作者否定了爱国者们的作为，于是招致了一场巨大的争论，一些进步人士为此严厉地谴责了诗人。

1935年,泰戈尔创作了两部新诗集,一部是散文诗集《最后的演奏》,另一部是《路程》。

在散文诗集《最后的演奏》里,对爱的回忆,又在年迈的泰戈尔胸中不时升起,回顾已走过的生命旅程,他只看到荣华和自尊的废墟。卷首诗是献给一位女子的:

我忽略了对你的价值的颂赞,
因为我盲目地肯定了我的财产。
白日黑夜不断地把你的贡献送到我的脚边。
我从眼角里望着它们被送到我的仓库里。
4月的忍冬花在你的献礼上添上芳馨,
秋夜的满月的清光也向它们映射。
你常把你波浪般的黑发,倒泻在我的膝上,
你眼泪盈眶地说:
我对你的献礼,我的王,是可怜的微薄;
我无法再多给你,因为我没有可给的了。
日日夜夜的过去了
今天你却不再在这里。
至终我来打开了我的仓库,
拿起那串你亲手给我戴在颈上的
珠宝的链环。
我从前那漠不关心的骄傲
吻了尘土里你的遗留的足迹。
今天我真正赢得了你
因为我以我的忧伤偿抵了
你的爱情的价值。

《最后的演奏》中还收录了他在生日里写的一些诗。生日的来临与匆匆逝去,被泰戈尔比作在时间的长河将其淹没之前能够享受到几分钟阳光照射的岛屿。诗人还将自己的一个个生日形容为一条不停地朝向伟大的未知走去的长长队列,宛如江河最终归入大海。

诗集《路程》多为爱情诗,诗人曾这样写道:“爱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因此,也没有爱的重荷。人没有爱情也要生活。爱情的价值也就在那里。”

当时年迈的诗人因为不能随意旅行,于是便常改变住所,他在住宅房前修了一间茅屋,每天眺望着前来帮他盖房的山达尔族女人劳碌的身影,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这个山达尔女人在木棉树下的沙径上忙忙地走上走下;一块粗糙的灰色的纱丽紧紧地缠裹住她的黑而结实的苗条的身躯;纱丽的红边和妙烟花的火红魔咒一样在风中飘扬。

……

几只漆镯围在她模塑得绝美的臂腕上,一筐的散沙顶在她头上,她在木棉树下飞掠过红沙的小径。

.....

我坐在凉台上看着这年轻的女人一小时一小时地不断地劳作。当我觉得这女人的服务是神圣的注定为她所爱的人们的，而它的庄严被市价污损了，竟被我借着几个铜钱的帮忙把它掠夺了，我的心感到深深的羞愧。

1935 年底，在桑地尼克坦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秋节》，在加尔各答则上演了泰戈尔根据《暗室之王》改编的剧本《看不见的宝物》，酷爱演戏的诗人泰戈尔也亲自参加了这两部剧的演出。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日子

1936年2月，泰戈尔在加尔各答作了三次有关教育问题的讲演之后，就着手把自己早年的剧本《齐德拉》改编为歌剧，并亲自指导排练。此剧在加尔各答的上演赢得了赞誉。诗人接着带领剧团访问北印度，作巡回演出。当剧团抵达首都德里时，市政府提出为泰戈尔举行市民欢迎大会，可是英帝国的行政长官竟然驳回了该项建议。恰巧此时也在德里的圣雄甘地，目睹年老体弱的诗人为给自己的大学筹款如此艰辛地巡回演出，感到万分不安，于是他捐款6万卢比给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对此泰戈尔非常感激。

从德里归来之后，泰戈尔担任了加尔各答群众大会主席，在10月2日，为庆祝圣雄甘地的誕生日，他组织桑地尼克坦神庙的特别祈祷。这之后，他埋头将以前的一首诗作《报答》改编为歌舞剧《夏玛》，并在当月下旬亲自参加了该剧在加尔各答的演出。

这一年泰戈尔出版了两部散文诗集——《叶状器皿》和《沙摩里》。前者的题名意即以树叶作为杯盘，后者则指对大地的赞颂。值得一提的是前者之中的《非洲》一诗，在这首诗中，诗人愤怒谴责了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

1937年9月10日傍晚，年已75岁的诗人在椅子上休息时，突然不省人事，昏迷了两昼夜才渐渐苏醒。后来，他把这种知觉的中断和恢复的感受，写成一首诗，后把它收入第二年出版的诗集《边沿集》中。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曾经历过一次大战的诗人，看到人类的悲剧再次上演，感到异常的悲痛。这一年圣诞节，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对战争狂人的愤恨和谴责。

1940年2月，圣雄甘地夫妇来到桑地尼克坦拜访诗人，泰戈尔在和平之乡宜人的芒果林里热烈地欢迎他们。诗人在致辞时向甘地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我把您作为我们自己的人，属于全人类的人来欢迎您。”这是甘地与泰戈尔的最后一次会晤，双方都感到十分愉快。

这年夏天，泰戈尔到喜马拉雅山麓的小镇孟古普避暑，并在这里度过了他79岁的生日。那一天，僻静的小山村沸腾了，尼泊尔老和尚一大早就前来为他焚香、祈祷，傍晚，主人请附近的居民一同参加祝寿的宴会，纯朴的村民采摘了无数鲜花献给诗人。望着这些代表着人民真诚祝福的鲜花，泰戈尔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

9月26日，泰戈尔突然发病，情形与3年前完全一样，也是突然间失去了知觉和意识。他被送回到加尔各答的祖居之地，在那里接受治疗。甘地得知泰戈尔病倒的消息，立即派自己的秘书前去慰问。在医务人员和家属的精心治疗和细心护理之下，泰戈尔终于能坐起来，也能听能说了，只是还不能提笔写字。

当时，由于英国政府想迫使印度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不愿意答应印度国大党成立“国民政府”的要求，于是，圣雄甘地于1940年10月再度发起不合作运动，并倡议国大党成员在公开场合发表反战演说，这便引起英国政府的镇压，几千名国大党党员遭到逮捕。而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人民也处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这些都使病榻上的诗人深为不安和痛苦，他虽不能提笔写作，但作为诗人，他心中的感受却不吐不

快，于是他便请人记录下他口述的诗歌，表达了他对印度解放运动和被战争奴役的人们的同情。

泰戈尔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剧痛折磨着诗人，但他却以顽强的精神与病魔作不息的抗争。他的身体日渐衰弱，每天下午体温都要升高，夜里不能安眠，食量也渐减少。当他听说他的食量与两个月的婴儿相同以后，每逢吃婴儿的乳粥时，他总要问：“今天我是两个月的婴儿吗？”

在加尔各答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后，泰戈尔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于是他又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和平之乡，在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中，在勤劳纯朴的人们身边度过美好的时日。

不能再如以往那样自由走动的诗人，在病榻上依然不断地与文艺女神对话。他不停地追忆往昔，他努力地体验现在，他用他那支依然充满活力的笔，记录下他的情怀。1940年，泰戈尔出版了诗集《在病床上》，1941年初又出版了两部诗集——《恢复集》和《生辰集》。在这些作品中，泰戈尔以谦逊平和的心境表达了自己对工人、农民、渔民等普通劳动者的景仰和赞美之情，他希望能有一位新时代的诗人走进劳动者的生活之中，为人类带去崇高的品质和永恒的福音。

同时，泰戈尔还以重病之身口述了许多民间故事、童话和寓言，并把它们结集为《故事与诗》于当年4月出版。这部集子充溢着奇思异想，闪耀着绚丽的文采。

1941年4月14日，孟加拉的新年即将来临，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发表了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由于身体虚弱，他请人代读了题为《文明的危机——80岁生日述怀》的演讲稿。诗人在文中追忆了自己在青年时代赴英国求学的日子，指责英国政府辜负了他的信任，违背人道主义原则而做出种种压制印度人民的事情，他真诚地祈盼人道主义取得最终的胜利，人类历史焕然一新。

这一年的5月7日，泰戈尔度过了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全世界都在热烈庆贺他的八十寿辰，而面对着生命的黄昏，诗人却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之中，他思考着人生、事业、和平，思考着存在与死亡，他口述过这样一首诗：

在茹卜那伦 的河岸上，
我起来，清醒着：
这个世界，我承认，
不是一个幻梦。
在用血写成的文字里
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存在，
通过重复的毁伤和痛苦
我认识了我自己。
真理是严酷的，
我喜欢这个严酷，
它永不欺骗。
今生是永世炼修的受难，

茹卜那伦河，孟加拉的一条河，它的名字有“神人的形象”之意。

为换得真理的可怕的价值，
在死亡中偿还一切的债负。

在生与死随时都可能相会的那些日子，泰戈尔还口述了另外一些诗歌，一共有 15 首，后来集为《最后的歌》于当年出版。

转眼之间，夏季到来了。酷热侵扰着和平之乡，干燥的空气使得水源干涸、树木凋萎。泰戈尔的病情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也出现了恶化的症状。前来诊治的大夫决定把诗人送到加尔各答去做手术。可泰戈尔不愿意过多地打搅别人，希望自己安静地离开人世。但在亲朋的劝导下，他还是于 7 月 25 日被送到加尔各答的他的祖居之地。在这里，诗人口述了一首充满“询问”的诗：

最初的一天的太阳
问
存在的新知——
你是谁，
得不到回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这天的最后的太阳
在宁静的夜晚
在西方的海岸上
问着最后的问题——
你是谁，
他得不到回答。

在即将抵达生命的彼岸的时候，泰戈尔面对着深广浩瀚的宇宙空间和无尽无垠的时间长河，探询“我是谁”的终极真理，这是他穷尽一生努力追寻的疑问。

7 月 30 日，即将上手术台的诗人口述了他最后的一首诗：

你用不同的诡骗之网把你
创造的道路盖起，
你这狡猾者。
你用灵巧的手
在简单的生活上
安上伪信的圈套。
你用这欺骗
在“伟大”上留下一个印记；
对于他，夜不是秘密的。
你的星辰向他指示的道路，
就是他自己永远清醒的心的道路。
他的单纯的信仰
使它永远照明。
外面弯曲里面正直，

他为此而自豪。
人们说他是无用的人。
他用自己的内心
赢得了真理，
用他自己的明光洗净。
什么都不能骗走
他带进他的仓库中的
最后的报酬。
他这从容地接受你的诡计的人
从你的手中得到了
达到安宁的永远的权利。

然而泰戈尔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细细推敲、修改自己的诗作了，这最后的一首诗就以它原初的样子呈现在我们的眼前。7月30日上午10点半钟，手术开始，中午12点3刻结束。医生宣布手术过程良好。但第二天过后，泰戈尔的病情持续恶化，知觉也逐渐丧失，此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8月7日中午，这位伟大的诗人停止了呼吸，辞别了人世。

泰戈尔的逝世受到全世界的哀悼。在印度，为他送葬的人如潮水一般。诗人曾于1939年12月创作了一首歌曲，希望在他与世长辞之际演唱。1941年8月7日，在和平之乡举行的泰戈尔的追悼会上，成千上万的追悼者唱起了这支歌。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要把这支歌深情地吟唱：

前面是平静的海洋，
放下船去吧，舵手。
你们将是永久的伙伴，
把他抱在你的膝上吧。
在“无穷”的道路上
北极星将要放光。
自由的付与者，你的饶恕，你的仁慈
在这永远的旅程上
将会是无尽的财富。
让尘世的牵累消灭吧，
让广大的宇宙把他抱在臂间，
让他在他无畏的心中
认识到这伟大的无名作者吧。

